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6

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编辑出版

巴林文史丛书



1-8册(全套)定价: 280.00元



#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编辑出版

韩仁信

#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第六辑

辽代城址探源(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林右旗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

内蒙古学研究中心藏书  
韩仁信著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



## 《辽代城址探源》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任：崔 义

副主任：岳金荣、翟金柱、怀凤忠、哈斯牧仁

杨旭东、穆 松

成 员：杨 春、马金升、格日乐、于凤国、

阿拉木斯

## 巴林右旗政协文史民宗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穆 松

副主任：由玉海、丹 巴、张学仓

委 员：宝音朝格拉、杨晓雷、李书坤、郝建伟

花文元、胡钦毕力格、王兴贵、邸国祥

斯钦毕力格、图 亚、额尔敦巴图

说 明

## 说 明

自 1985 年政协巴林右旗第二届委员会出版发行《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一辑以来，经过旗政协各届领导的一贯坚持和几代文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到目前已经编辑出版了蒙汉两种版本的《巴林右旗文史资料》共 16 辑（蒙文版和汉文版各 8 辑），为地方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旗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赞誉，得到了旗党政领导的肯定、关怀和支持。

今年 9 月，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蒙古文联《花的原野》杂志社联合主办《首届中国·巴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因此，根据会议需要和广大读者的殷切期望，旗政协决定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巴林右旗文史资料》进行集中印制。《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二次校印过程中，我们在坚持“保留第一版原貌特征”原则的基础上，对一些错别字和不通顺的语句以及内容上的明显错误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但是，由于编者能力有限、

时间紧迫等原因,虽付出努力,仍不免会有瑕疵,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同时,在印制过程中由于受一些客观因素限制,对史料第四辑中的人物照片未能刊出。

在此,向始终关心支持巴林右旗文史工作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和对文史工作倾注心血与汗水的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9年9月

## 序言

崔义

《辽代城址探源》一书即将出版发行,我闻之不胜欣喜。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本书作者韩仁信先生是我的中学老师,看到这部书稿,三十多年前韩先生孜孜以求的治学作风和倜傥飘逸的神采气度仿佛就在昨天,我对那一段好时光一直十分留恋;二是韩先生曾多年从事文博工作,而今退休赋闲却仍然笔耕不辍,多年的辛劳再一次有了结晶,可庆可贺;三是在韩先生的努力下,古城址研究界又诞生了一部力作,巴林右旗政协文史书丛中又开出了一朵奇葩。

从一定意义上讲,城市本身是一部史学档案,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城市的兴衰,映射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风雨沉浮的脉络。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历史上的城市。韩仁信先

生的这部《辽代城址探源》，正是以古城的兴衰透视出了世事的浮沉，以独特的视角对历史原貌进行了追踪，对于我们这些创造未来历史的人大有裨益。

巴林右旗有史以来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或以牧为主民族繁衍生息之地，是一方积淀着丰厚中华文明的土地。这里已发现许多辽代营建的州城等遗址，虽不能说完全代表契丹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全貌，但至少应该说是其进步和发展的产物，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表现，是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兼收并蓄、水乳交融的象征。对这些辽代城址的探考，不仅对于研究辽史、研究北方民族史、研究北方地方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本地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各族人民奋发向上建设小康社会也将产生激励作用；既可重温以往不应失落的文明，又可锁定不该遗忘的记忆。这正是此书的目的所在。

作者在本书中对一些以往有争议的问题，前人未曾关注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一些文献中的误解或不实之处，也坦诚地提出了看法。书稿的内容，不仅言之有据，而且城址的地理位置以及形制等，均翔实可靠。文稿中的山名、水名、地名均引用于1987年巴林右旗人民政府编写的《地名

志》。

本书作者韩仁信先生，1935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滹沱河畔，1953年8月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为巴林右旗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文化大革命”后到旗文化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馆舍建设和事业开展中。尤其是接管荟福寺后，一边维修和保护这一幸存的文物古建，一边开展文物征集和重点文物调查工作。1981年创建了旗文物馆，后来争得上级主管部门支持，将文物馆改建为自治区内第一个县级博物馆。1985年底，巴林右旗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集体”。此后他积极争取维修辽庆州白塔的立项，并参与主持了维修工作，同时创建了辽庆陵与庆州文物保护管理所。他是巴林右旗博物馆的首任馆长，文博系列的副研究馆员，中国辽金史学会会员、赤峰分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内蒙古钱币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及赤峰钱币学会顾问，还曾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

作者撰写此书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填补了巴林右旗文史研究工作的一项空白。作为研究古城遗址的学术专著，书中多有“一家之言”、“就

教方家”之类的表述,充分反映了这位资深文博工作者恪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作为他的学生,我再一次对韩仁信先生表示由衷的敬佩。

(作者系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主席)

## 目 录

序言	1
辽代城址探源引言	1
一、小城子城址	4
二、布敦花城址	7
三、哈日巴城址	10
四、前进村遗址	13
五、友爱村遗址	18
六、塔班板遗址	23
七、岗根城址	26
八、西花和少城址	33
九、达巴梁城址	36
十、索博日嘎城址	43
十一、必图城址	71
十二、石匠山城址	75
十三、聚落遗址及尾语	80
辽代城址探源附录	84
一、潢水石桥考辨	84
二、从辽代御试进士的相关记述探考辽代怀州西山的位置之所在	105

## 一、辽代城址探源引言

辽代的城址,在《辽史》中已见记载。在长城以南燕云地区的辽代城址,亦可称为辽城,当时即多为旧城,并非都是在辽代时才始建。那里的城址,也经历过战争和改朝换代的洗礼,但是由于农耕文化的内涵所在,以及有关的史志多有记载,所以若要在那里探考辽代的某某城址、今在何地是何城等等,并不困难。

在长城以北,尤其是在西拉沐沦(潢水)以北,要探考辽代的某某城址,其中有一些蹊跷的载录和城址的迷团,并不那么容易开解。

辽朝与五代同始,与北宋同终。耶律阿保机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年)统一契丹八部,建号契丹国并称帝。先后共有九帝,传国二百零九年。这个雄踞在中国北疆的王国史称辽国,其实是有时称辽国,有时又称契丹国<sup>①</sup>。它在历史上的影响,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外,如在亚欧等的一些地区,曾很长时间称“契丹”(剋大宜)为中国的代称。

契丹族生息在辽水的上游,“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

<sup>①</sup> 《辽史·本纪太宗下》59页载:大同元年(947年)二月改国号为大辽。《契丹国志》20页载为会同元年(938年)。此外,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复国号为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改国号为大辽。

定所。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sup>①</sup> 截至阿保机建号称帝,“辽之先世,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毡车为营,硬寨为宫。”<sup>②</sup>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和发展,辽代立国“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大略采用唐制。其间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筑城赐额,谓之“头下州军”;唯节度使朝廷命之,后往往皆归王府。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sup>③</sup> 契丹族在其故土上兴建城郭,草原上开始出现了固定性的聚落。这里不仅是畜牧业,就连手工业、农业以至于商贸业等等,都出现了空前良好地大发展。但是许多城郭的设置虽说多承唐制,但并非是邯郸学步,而是围绕着自身游牧经济和“行国”文化的特色,而因宜而置。其中尤以对在战争中所俘获的移民,设置的城郭,一般采用其原居住地的州县名称,冠名以城郭,且居民的风俗习惯不变。希冀移民能安居创业,生产生活能尽早融于辽代社会。从未追求城郭的坚固高大,并非意在禁锢和强化防御,而是意在移民乐不思归。

西拉沐沦(潢水)以北的契丹故地,有辽一代终为辽“上京道”所辖。《辽史》在记述这里所辖的城址时,非但没有记述城址所在地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四至的确指;而且所“辖军、府、州、城二十五,统县十”<sup>④</sup> 的记载,“按《二十五》与下

① 《辽史·营卫志中》377页。

② 《辽史·百岁志一》697页。

③ 《辽史·百岁志四》812页。

④ 《辽史·地理志一》439页。

文所列军、府、州、城实数不合”<sup>①</sup>。至于每个城址的轮廓、城垣的高矮,除临潢府和祖州城略有记载外,余皆再无记述。此外,还有如有城无载等等不足之处。

当然,这部于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到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只用了十一个月”<sup>②</sup> 而成书的《辽史》,至二十四史中,它格外粗简。但是,如果不是它记录了辽朝的辉煌,使中华五千年多元一体的文明史得以绵亘不断,那么这段历史有可能被湮没,这段记忆有可能被遗忘。

因工作之便,笔者现就巴林右旗所辖境内的辽代城址,沿西拉沐沦(潢水)河,由南向北,以次加以考述。

巴林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南部。为今赤峰市所辖区域中,北五旗县“阿、左、右、林、克”的正中部。地处西拉沐沦(潢水)北岸,大兴安岭山脉,为其北端的界山。

这里自春秋战国始,就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居地。自辽代以来,这里虽为“上京道”所辖,但一直仍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地区。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民族间的不断争战,以及出现了朝代的更替,所以致使这里的老居民要大量的外流。

直到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当朝者在为漠南蒙古诸部落划分和确指驻牧之地时,将这里划归巴林部。清顺治五年(1648年),为强化对这里的统领,开始建立“旗制”,分左右两翼,仍同为“巴林”。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

① 《辽史·地理志一·校勘记》452页。

② 《辽史·出版说明》2页。



清廷的“放垦”政策,将“巴林”一分为三。<sup>①</sup> 巴林的西边,设县制称林西。巴林的东边,仍设旗制称林东。

今巴林右旗境内,已考见的辽代城址,有州五、县五、馆二和城一(见巴林右旗境内辽代城址分布图),现分述如下:



## 辽代城址探源

### 一、小城子城址

小城子城址,位于查干诺尔苏木的境内。

查干诺尔苏木,位于巴林右旗的中南部。其四邻,除正

<sup>①</sup> 参见 1990 年版《巴林右旗志·大事记》。

南依西拉沐沦河为界与翁牛特旗隔河为邻外,其余均与本旗境内的苏木乡镇毗邻。如西北为都希苏木,正北为羊场乡,东北为洪格尔苏木,正东为益和诺尔苏木,西南与巴彦汉苏木以查干沐沦河为界。

小城子的古城址,位于苏木治所东北 6 公里,小城子村村东 200 米处。该村的村名,就是因其临近古城而得名。

古城址近似方形。城墙残高为 1.1 米,基宽为 10 米。城墙南北长为 220 米,东西宽为 195 米,墙体通为土筑,墙体内未见有任何夹杂物。城门仅在西城墙的正中可见,门宽约 20 米。城墙外,未发现有什么瓮城和马面。

城内近正中,有呈东西方向的土丘,似为建筑遗址。在城址内,只采集到属辽代的泥质灰陶陶片和少量的白瓷碗残片。

城址的方向为 345 度。而今这里荒漠化非常严重。除城墙址和建筑址,在大风刮过后,远处还能望见其泛白而显土黄的痕迹外,大多数时间里,为荒漠一片。

该城址,西南大约 7 公里开始直到西拉沐沦河边,均为沙地或是流动和半流动沙丘地带。其余西、北、东均为丘陵地带。北小西距羊场乡南端的“莫拉哈尔山”为 5 公里。南距西拉沐沦河为 16 公里。西北距大板镇 44 公里。西南距巴林桥为 46 公里。查干诺尔苏木至洪格尔苏木的区间段公路,在古城址北的不远处通过。

该城址的规模和形制较小,绝不会是州或节度使以上的城址,也不似头下州的建制。应该是辽代早期,俘获外地人口,迁来至此散居和聚居的县城居址。据《辽史》载“饶

州、匡义军、中，节度。本唐饶乐府地。贞观中置松漠府。太祖完葺故垒。有潢河，长水泺，没打河，青山、大福山、松山。隶延庆宫。统县三，长乐县、临河县、安民县。”<sup>①</sup>

今林西县白音板沟门西拉沐沦河北岸的黄土坑村的古城址，已被认定为辽饶州城址。该城址西侧的小城址(当为附郭)，为长乐县遗址。安民县城遗址，已考定为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北的古城遗址。

小城子古城址，是否为饶州所辖的临河县城址。从饶州所辖地域中的山川河流来看。“青山”和“松山”当为今巴林右旗巴彦汉苏木北的大青山和白音汉诸山为是。“没打河”笔者蠡测，应为今巴林右旗巴彦灯苏木的“克得河”。此外，在小城子古城东约30公里头下州松山州普鲁王牧地条中，亦有“松山”之名录。据“临河县。本永丰县人，太宗分兵伐渤海，迁于潢水之曲。户一千”<sup>②</sup>的记载。小城子古城址，确是处在西拉沐沦河的弯曲之处。再者，距城址较近处，再没有什么旧城遗址。据此推断，该古城址当为临河县县城遗址。

临河县城，既为辽太宗伐渤海迁永丰县人来此居住而置，其建城时间，应在天显元年最晚不能超过天显二年(即公元926年-927年)。<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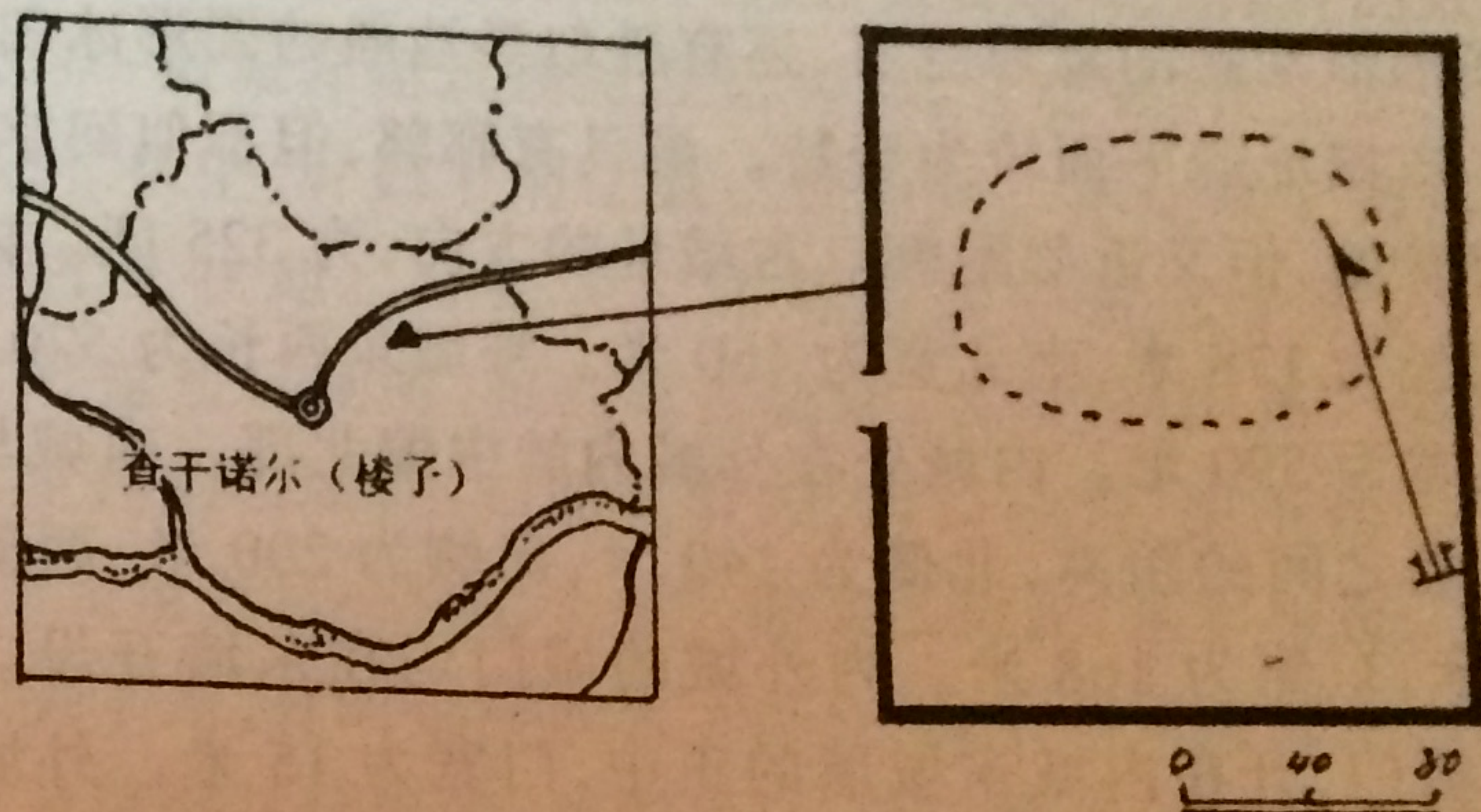
查干诺尔苏木，小城子村的古城遗址，当为辽上京道，饶州所辖临河县县城城址，此为笔者的管窥。

① 《辽史·地理志一》448页。

② 《辽史·地理志一》448页。另《地理志二》在辽阳府仙乡县条下，这里的“丰永”又作“永丰县”。457页。

③ 《辽史·半纪二》23页。

附：小城子城址平面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 二、布敦花城址

布敦花城址，位在益和诺尔苏木境内的西南部。

益和诺尔苏木，位于巴林右旗的东南部，西北距旗政府所在地大板镇为78公里。其四邻是：东与胡日哈苏木、西拉沐沦苏木接壤。西与查干诺尔苏木搭边。西北与宝日勿苏苏木、洪格尔苏木毗邻。南依西拉沐沦河为界，隔河与翁牛特旗相邻。

布敦花古城址，位于该苏木的布敦花嘎查所在地。东距苏木治所所在地茫图花为10公里。东南距建在西拉沐沦河上和在海金山前的“海日苏引水枢纽工程”，为9公里。正南距西拉沐沦河为5公里。西距海拔高度为706.5米的巴彦查干山，为8公里。北距海拔高度为554米的哈布特盖山为3公里。西北直线距辽上京林东镇，为74公里。

古城址所在地的地形较为平坦，多为沙丘平原，季节性河流与湖泽，在这里也较多。此外，还有奇峰怪石山峻嶒

的山景。如在突兀的海金山的山北平地上,耸立着数座拔地而起的山峰,呈悬崖绝壁状。在海金山的南坡即山前,有许多形似动物的象形巨石,还有胜似澡池般的圆形冰臼。

古城址的平面较为奇特。虽具有郭郭,但不似回字;虽没有瓮城,但又近似附郭。古城址的方向,为325度。内城东西长为178米,南北宽为160米。外城东西长为520米,南北宽为590米。内城处在外城内的中偏北部。内城与外城两墙之间的距离,北侧为140米,南侧为290米,西侧为150米,东侧为168米。内外城的城门均在东墙开设。内城的城门,开在内城东城墙的正中,门宽为15米。外城的城门为了与内城的城门对应,设在东城墙的偏北处,且在外城的城门外,又增设一长方形近似附郭的瓮城。瓮城东西长135米,南北宽为248米。这两层门的宽度,均近100米。城墙外,未见有马面和角楼。

古城的城墙,通为土筑。今城墙的基宽可见为3-5米,残高为0-0.5米。弥久的风剥雨蚀,加之畜群的无情践踏,而今有的地段的城墙,只能从土质与颜色上与非城墙加以区别;这里的原生土显黑,城墙土发黄,墙土中,未见有其他遗迹。

该城址内,未有民宅房舍,仅有一小规模的供销合作社的房屋和院落,建在内城西北角跨过城墙和外城城内的西北隅。这里曾出土过,唐代的“海兽葡萄铜镜”。还有一次,供销社在院内施工动土时,在地表往下近一米处,发现有辽代习见的压印沟纹大青条砖和花岗岩条石等建筑遗迹。而今古城址内,很难再见到不同时间段的遗物,偶忽发现时,多

为细碎的辽代的陶瓷片。

布敦花古城址,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好的地方,而又与一般城郭建筑规制显然有别。《辽史》在上京道“头下军州”条中,有如下的记载:“松山州。本辽泽大部落,横帐普古王牧地。有松山。北至上京一百七十里。户五百。”<sup>①</sup>这里已阐明,布敦花古城址,名为“松山州”,是横帐普古王建的私城,不归朝廷管理,所以归为“头下州”之类。至于“北至上京一百七十里”,前文已提及,基本相符。

头下州,有时也写成投下州。“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其节度使朝廷任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sup>②</sup>

关于“横帐”和“普古王”。“横帐”是“辽内四部族”中的“横帐三父房族”的简称。横帐是皇族的显贵,是皇族的近支。

辽太祖,阿保机的后裔,称为“大横帐”。阿保机的大伯父,麻鲁早逝无后。二伯父,岩木的后裔称为“孟父房”。三伯父,释鲁的后裔称为“仲父房”。阿保机诸弟的后裔称为“季父房”。大横帐与横帐三父房,又统称为“皇族四帐”。

普古王为三父房皇族,无可置疑。而《辽史》中,只可见

① 《辽史·地理志一》45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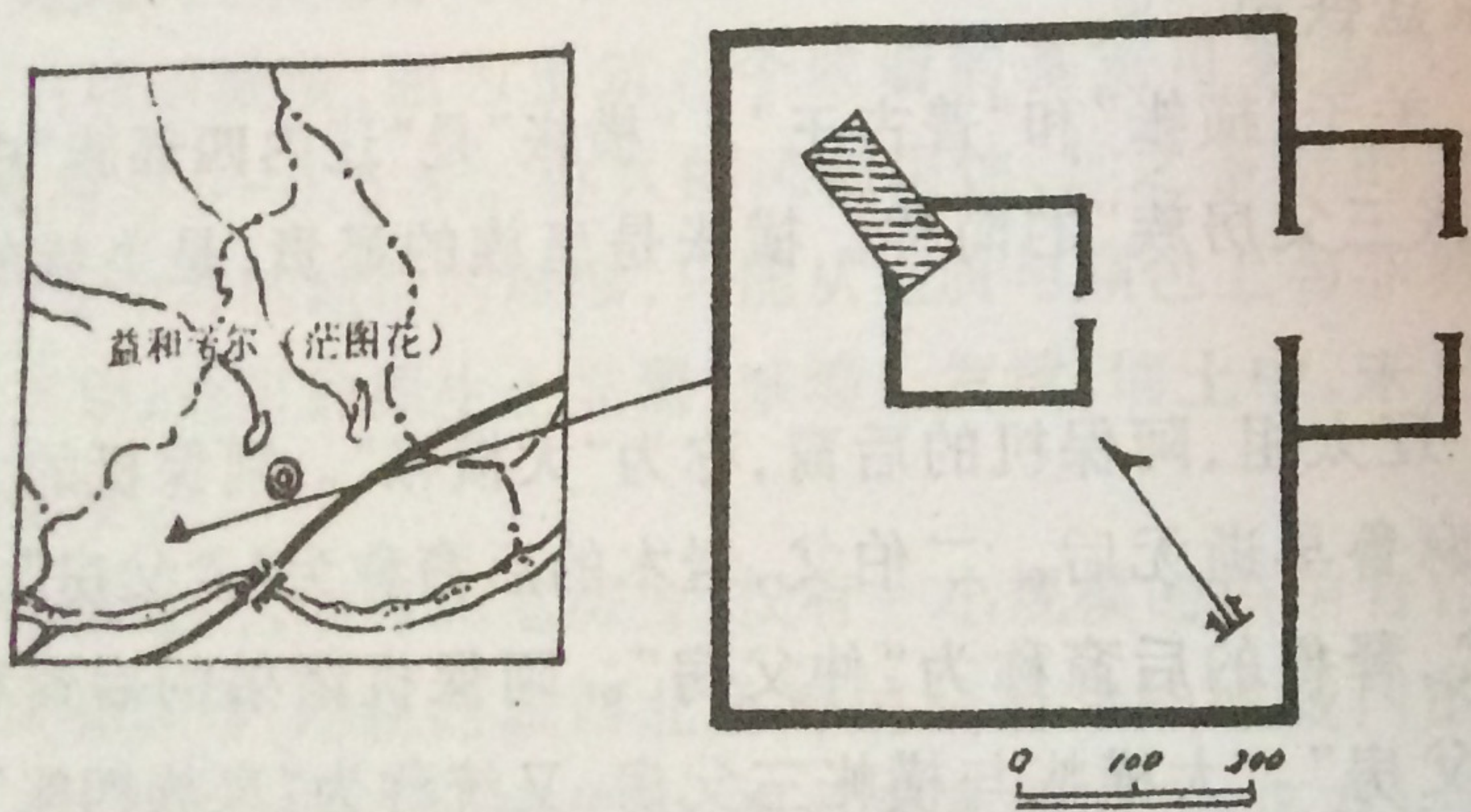
② 《辽史·地理志一》448页。

有“季父房，不知世次。乌古部节度使”<sup>①</sup>等记载。

布敦花古城始建的年代，已知和可考的史料太少，只能依据“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各部大臣以上征伐，俘掠人户，自治郛郭，为头下军州。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唯酒税赴纳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sup>②</sup>的记载，定在统和十五年。

益和诺尔苏木，布敦花古城址，应为辽上京道，头下州松山州州城遗址。以往虽有志书见有记载，但均未确指其具体所在。近些年来，我单位的同志们，曾数次在实地考察，该城址的平面图，就是苗润华和巴图同志提供。今笔者在此，加以确指。

附：布敦花城址平面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 三、哈日巴城址

① 《辽史·表第四·皇族表》1020页。

② 《辽史·食货志》926页。

哈日巴城址，位在胡日哈苏木境内的近北端。

胡日哈苏木，位于巴林右旗的东南部，西北距旗政府所在地大板镇为93公里。该苏木是1984年从益和诺尔苏木划出来后，新建的苏木。其北部和东部，与阿鲁科尔沁旗为邻。西北与宝日勿苏苏木搭边，西部与益和诺尔苏木接壤。南部与西拉沐沦苏木邻接。

哈日巴古城址，位于胡日哈苏木治所所在地，巴润苏吉的正北，11公里处。城址所在地的地形开阔。北部和西部，多为黄土丘陵地带。东部和南部多为沙丘平地。这里的山丘多为浑圆状，起伏缓和坡度不大，且坨甸相间还兼有草甸湖泽。

哈日巴古城址，正北距海拔高度为449.7米的“布敦花”山丘，为0.8公里。东北距“哈尔诺尔”，为5公里。东南距“塔然花”自然村4公里。西南距西马鬃山村5公里。正东距有岩画的东马鬃山，为9公里<sup>①</sup>。古城所在地，直线东南距永州为49公里。今古城址所在地为个人牧场，地名为哈日巴。笔者在寻得古城时，因以冠名。

哈日巴古城的方向，为315度。整个城墙为土筑，因未做试掘夯层不清。城墙残高1-1.8米，残宽8-10米。城墙东西长74米，南北宽100米。城门只在南城墙正中开设，门宽16米。城墙外，未见有马面等建筑。城内较为平坦，仅在城内的西北和城门处，见有略高出地面的土丘。城内未采集到什么象样的遗物，地表可见一些碎小的灰色陶

① 《辽海文物系列》1992年第一期64页。

片,以及一些无序的黑色似炭的残渣。

古城址外,在远近不等的一些地方,亦可见似早有人居住过的痕迹。地表可见一些近现代人的,在这里不使用也不生产的黑色炭渣和似炼铁废渣。

如今这里,不仅干旱且超载过牧,植被破坏严重,有些文化层不仅裸露地表,而且已被践踏殆尽。

哈日巴古城址,是一座什么城址,是什么时候建在这里,以往无人知晓,也从未见有文字等的记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文物普查时,因《辽史》中有如下的记载:“永州,永昌军,观察。承天太后所建。太祖于此置南楼。乾亨三年(981年)置州于皇子韩八墓侧。东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号永州。冬日牙帐多驻此,谓之冬捺钵。有木叶山。又有高淀山,柳林淀,亦曰白马淀。隶彰愍宫。统县三。长宁、义丰、慈仁。义丰县。本铁利府义州。辽兵破之,迁其民于南楼之西北,仍名义州。重熙元年(1032年)废州,改今县。在州西北一百里。又尝改富义县,属泰州。始末不可具考,今两存之。户一千五百。”<sup>①</sup>

其时,有关辽代永州的调查已基本清楚,即永州在今翁牛特旗新苏莫苏木的巴彦诺尔嘎查附近。那么“在州西北一百里的义丰县”是否存在,这应是文物普查工作中,不该漏掉而要解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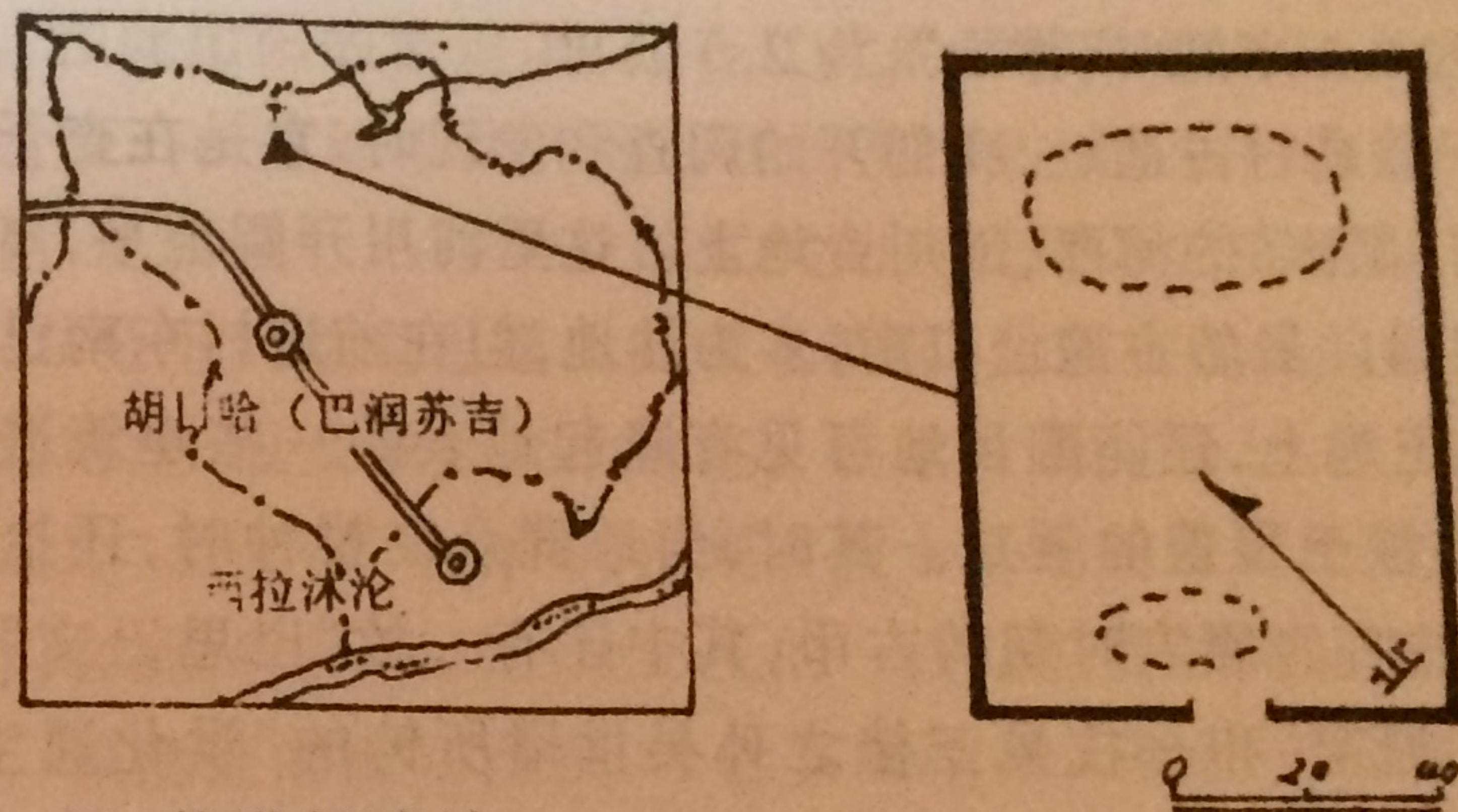
前文已提及,哈日巴古城址,东南直线距永州为49公里。这与《辽史》所记“在州西北一百里”相符。此外,该城

<sup>①</sup> 《辽史·地理志一》446页。另“庆州条”中,富义县属庆州。444页。

址的规模不大,且城外又有许多人们散居的遗迹;同时在其四周再未发现有任何古城址。所以我推断,该古城址是为义丰县城遗址。该城址所建的年代,应在天显元年(公元926年)至二年(公元927年)。

胡日哈苏木,哈日巴古城址,为辽上京道永州所辖的义丰县县城遗址。

附:哈日巴城址平面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 四、前进村遗址

前进村遗址,位于巴彦汉苏木的东北部。

巴彦汉苏木,位于巴林右旗的中南部,北小西距旗政府所在地大板镇为27公里。整个苏木的南端,以西拉沐沦河与翁牛特旗为界。东边又以查干沐沦河与本旗的查干诺尔苏木、都希苏木为界河。北面以大青山、巴彦汉山、查斯台山等大山,与都希苏木相隔。西侧以独腊寒山等大山和坡梁为界,与巴彦尔灯苏木毗邻。

前进村古遗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位于前进村一组

东500米处。遗址在查干沐沦河的西边,东距河床约有200多米。近些年来,这里的荒漠化程度非常严重。沙丘在该村落的前沿,自东向西不断地扩张和蔓延。在沙进人退的形势下,整个村落为免遭沙丘的湮埋,今已全部搬迁至原居住址西北方的坡地上。

现前进村,东南至古遗址约为2公里。查干沐沦河东都希苏木的乌兰格日勒嘎查,西距古遗址亦约为2公里。古遗址,西南直线距巴林石桥为23公里。东南隔河距标高为734.3米的“锅撑山”,为2.5公里。

前进村古遗址,我们开始调查和发现时,它是在查干沐沦河(黑水)的河西,河川台地上。这里河川开阔坦平,离大山较远。虽然古遗址以南,多为沙地,但在前进村东南已耕种的土地上,还能醒目地可见有隆起地表的一些建筑遗址上,被沙土覆盖的缓丘。其时,当地群众在耕种时,还拾到过一些多为唐宋时期的古币,其中还有一枚“巴思巴文”的“大元通宝”和一枚吴三桂之孙吴世璠所铸的“洪化通宝”钱。此外,还常在地中拣出一些残砖碎瓦。我们在调查时,还发现除属辽瓷碎片外,还有应为金、元时期的钧瓷碎片和白釉铁绣花瓷罐残片。

前进村古遗址,不仅因为这里荒漠化程度非常严重,今河西再见不到什么“缓丘”,整个遗址已近完全被沙丘湮没。加之河水泛滥,河床在摆动中又自东向西改道,该古遗址东侧的一些残留遗迹,已暴露在河床;甚至是裸露在河道的东岸边。如被当地群众,称之为“庙台子”的遗迹,就是由有辽一代,常用的沟纹青条砖和石条,砌筑的建筑基址。

对该古遗址,我虽经数次考察,均未发现其有城垣遗迹,以及未被解决其建筑规制与古遗址的范围等问题。而在以该遗址为轴心,半径约在10公里的地区内,除发现有一些辽代的墓葬外,还发现有多处应属辽代,规模大小不等的遗址与遗迹。如在该遗址南约10公里的狐狸井子(乌额根图)小南山前的地表上,有许多辽代陶瓷碎片,以及应为居住址的灰土等遗迹。在遗址东南2.5公里的锅撑子山(图拉嘎)的石壁上,有一些已被漫漶不成文的汉字墨书题记。在此山阳的坡地上,亦有辽代的残碎陶瓷片以及灰土等遗迹。在遗址东北约8公里的莫日古其小山,山阳的坡地上,地表也可见有不少的辽代的陶瓷碎片。在遗址东北近10公里的益逊毛道山的偏东坡前,发现有辽代的烧制陶器的窑址,以及数处灰土遗迹。在遗址西南约10公里处大青山阳“当间沟”小林场,发现有数十平米的辽代民居遗址。我们在此,曾征集到当地出土的一件辽瓷白釉鸡腿瓶。

该遗址的确切面积,今已实难稽考。就已知情况和其所反映出的信息,加之周边的对应情况,该古遗址,应为一重要的建筑群遗址。应始建于辽代,后来金、元时期仍有沿用。

《辽史》在载录北宋遣辽使臣薛映“使辽语录”时,有如下的记载:“度潢水石桥……五十里保和馆,度黑水河,七十里宣化馆……”<sup>①</sup>这里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保和馆是过潢水石桥后,北上的第一个馆驿;二是保和馆距潢水石桥为五

<sup>①</sup> 《辽史·地理志一》442页。

十里。至于保和馆具体在石桥的什么方位,这里并没确指。

北宋时期的大科学家沈括,在他也做为北宋遣辽使臣,于北宋熙宁八年即辽道宗大康元年(1075年),使辽后的《使契丹图抄》中,是这样的记述:“过潢水石桥,循河东南行又二十余里乃北行,稍稍东北十余里,复正北,又三十里至保和馆。<sup>①</sup>这里不但指明了保和馆的方位,而且也标明了过桥北上达保和馆的走向和里程。对照如今的实地情况,这里一直是通达辽上京的便捷大道。我已在拙文“潢水石桥考辨”中做了具体的解说,恕不在此赘述。”<sup>②</sup>

保和馆之名称,在整部的《辽史》中没做明确的记载。这与潢水石桥名称的出现一样,均是由于有北宋遣辽使臣的记录,世人才得以知晓。

《辽史》中有保和县,做如下的记载。“上京道,临潢府所统县十,其中有保和县和宣化县。”(宣化县有文另述)“上京南城谓之汉城……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寺西宣化县,西南定霸县,县西保和县……”

“保和县。本渤海国富利县民,太祖破龙州,尽徙富利县人散居京南。统和八年(990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sup>③</sup>

以上的记载,阐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保和县是属临潢府所统辖的县,县址在上京的南城之内。二是统和八年,由诸宫提辖司人户所置。人户散居在京南,隶属彰愍

① 《永乐大典》

②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一期。

③ 《辽史·地理志一》439页。

宫。如果《辽史》所记不误,似又可这样理解。保和县的衙署在上京的南城之内,其所辖人户均散居在京城之南指定的地址上。保和馆,就是保和县在其管辖和散居人户的地盘上,设置的馆驿之所。

至于“诸宫提辖司人户”,这里所指的“人户”如何理解。

有辽一代,为了对人口户籍加以管理,一般划分为正户、宫分户、蕃汉转户和著帐户。

正户,是指这些人有明确的部族和州县之籍,是普通的民户;在牧区又可说是部落民户。正户,是属于某某道府州县或者又隶属于某某宫的人户。

宫分户,是指这些人没有部族的州县之籍,而只有宫籍的人户。它是因“分州县、析部族”,以及由于争战中俘获和臣下进献的人口,在宫(斡鲁朵)周围构成一个,平时游牧生产兼保卫斡鲁朵的安全,战争时即成为皇帝的扈从军。这些人口,如出脱不了“宫籍”,世代都要随着皇帝的行宫而行。

蕃汉转户,实际上就是诸宫提辖司所管属的人户。这些人,既不属于宫分户,也不属于正户。他们是尚未入任何州县籍,是独立于州县以外,只直属于某某宫(斡鲁朵),有固定的居所,并从事于农牧等业生产劳作的人户。这些人,一旦有了州县户籍,就不再隶属某某宫了;当然这些人,一般是指契丹族以外的民族。如置保和县“尽徙富利县人居京南”。再如“统和八年秋七月,诏东京路诸宫分提辖司,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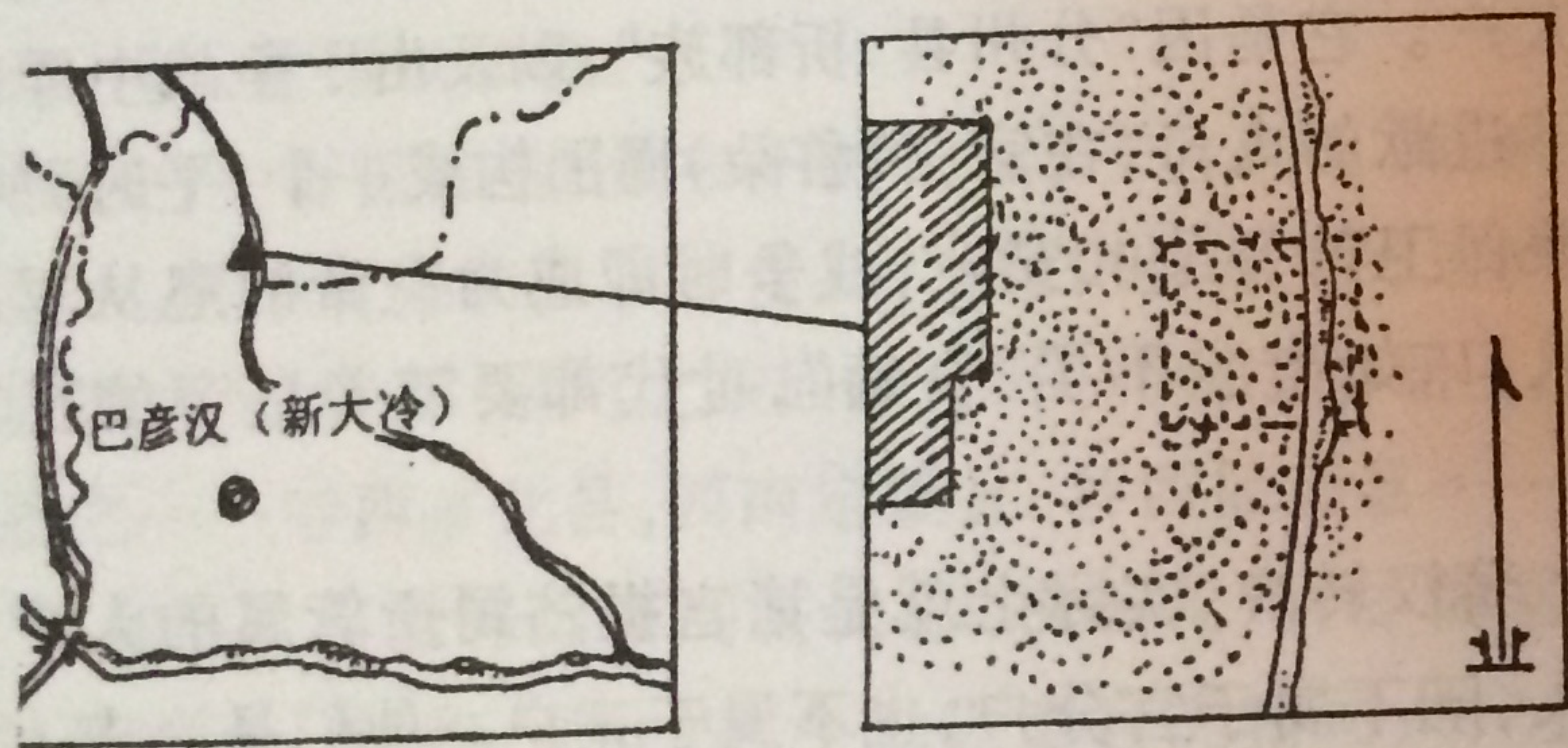
置定霸、保和、宣化三县。”<sup>①</sup>

著帐户，本诸斡鲁朵析出及诸罪没人者。<sup>②</sup>

前进村古遗址应始建于什么时候，依据辽太祖平渤海，徙富利县人的时间，应在太祖天赞五年亦即天显元（926年），这里就应开始有移民居住劳作。统和八年（990年）置县加以管辖，这时开始营建馆驿保和馆，应为水到渠成之事。

巴彦汉苏木，前进村古遗址。为辽上京道临潢府统辖的保和县县所设的保和馆，馆舍驿站建筑群遗址。

附：前进村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 五、友爱村遗址

友爱村遗址，位在都希苏木境内的中略偏西部。

都希苏木，位于巴林右旗偏南部。苏木治所的都希，西北距旗政府所在地大板镇为 16.5 公里。

① 《辽史·圣宗四》140 页。  
② 《辽史·营卫志上》371 页。

该苏木，北与巴彦塔拉苏木接壤。东和羊场乡为邻。东南与查干诺尔苏木搭边。南与巴彦汉苏木以大青山和巴彦汉诸山以及查干沐沦河为界。西与巴彦尔灯苏木毗邻。

友爱村古遗址，紧靠该村村落的西南端。东距苏木治所为 4.5 公里，东南距标高为 804.6 米的凤凰山为 3 公里，南距查干沐沦河为 2 公里，西距“必其格图”小山不足 1 公里。北距乡间公路约 1 公里。

这里的地形，虽然四野多有山地与丘陵，但在遗址所在地实为河漫平川与台地，且自西向东南均较平坦和开阔，北部又有山梁和高坡可遮风和挡寒。友爱村是个半农半牧的村落。1978 年 8 月，当时的社员在村东头的大田里，用犁为谷子中耕时，发现了一批具有唐代遗风的辽代银器。<sup>①</sup>这一发现，为我们发现和探考该古遗址是为先河。

这个村落的东、南、西三面，均已辟为耕地。东面的有些地段似有一些缓丘，其范围已不甚明显。西面尤其是偏北部，显见有高出地表为 0.5 至 1.5 米的直径约为 25 米的近四个土丘。个别的土丘旁边，还有方形柱础石，在地表裸露和半裸露。柱础石的边长约为 80 公分，厚为 45 公分，正面鼓镜的直径约 40 公分、高约 2 公分。在耕种过的地头，还堆有被农民拣出来的残破砖瓦以及陶瓷碎片。南面近河边，又多被沙土覆盖。遗址的具体范围，已不很清楚。

西边的小山“必其格图”的石壁上，有多处已被漫漶不成文的汉字墨书题记。字迹书体，与“锅撑山”的石壁上所

① 《文物》1980 年第 5 期 45 页。



见类同。

该古遗址,就其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来看,应是一处具有一定规模的辽代聚居遗址,然而《辽史》中没有记载。还是沈括在其《使契丹国抄》中,有如下的记载。“自保和馆北行数里,有路北出走上京。稍西又数里济黑水。水广百余步,绝水百余家。塼瓦屋相半,筑垣周之,曰黑河州。”<sup>①</sup> 沈括在这里所记述的路线是:自巴彦汉苏木的前进村出发,先是沿河的西岸北上,随着河道的弯曲,又变为沿河的南岸西行。在今都希苏木的自然村“团结村”、“济黑水”即过查干沐沦河,就到达今友爱村。该古遗址,即沈括当时所见的,用城墙围起来的,辽代州城黑河州的州城遗址所在。

关于“黑河州”,《辽史》中又有如下的记载。“庆州,玄宁军,上,节度。本太保山黑河之地,严谷险峻。穆宗建城,号黑河州,每岁来幸,射虎障鹰,军国之事多委大臣,后遇弑于此。以地苦寒,统和八年(990年)州废。辽国五代祖勃突,貌异常,有武略,力敌百人,众推为王。生于勃突山,因以名,没,葬山下。在州二百里。”<sup>②</sup>

对于上述两个“黑河州”应如何理解,以往有的方家学者曾提出“黑河州废”一说有误。理由是:既然在统和八年(990年)已废,那么到沈括使辽时是辽道宗大康元年(1075)年,中间相隔八十多年,是不应再有黑河州存在;如果存在,那就是没废。

我认为,穆宗所建黑河州并没建在友爱村这个地方,而

<sup>①</sup> 《永乐大典》。

<sup>②</sup> 《辽史·地理志一》444页。

是建在辽庆州属地的“太保山黑河之地”。“统和八年州废”,《辽史》所记无误。笔者对穆宗所建黑河州,将另文考述。

友爱村之黑河州,是北宋遣辽使臣沈括于辽道宗朝,使辽时亲眼所见,并加记录的史实。1981年,在辽代的黑山之阳,发现的应鏐立于辽兴宗至道宗时的“崇善碑”,其碑文中亦有黑河州等地名的记载,<sup>①</sup> 这亦可证沈括记载之正确。

友爱村的黑河州,就在上京道的“眼皮底下”,《辽史》中为什么不见记载,笔者揣测不出为什么。然而《辽史》在记载穆宗所建黑河州后,又载有似与穆宗不相关的“五代祖勃突王”之记,这又是为什么。这条记载,除“在州二百里”的短语中,少了一个方位词“南”字而外,是否在暗示黑河州与勃突王有什么关系。

以往有不少中外的方家学者,认为“勃突山”就是巴彦汉山。我在对此山考察时,确实发现了一些辽代的古墓,但均早已被盗掘破坏。如现今查斯台村的一口饮水井,在井的旁边,就有用古墓中的刻石残块,垒砌在井帮。如果说友爱村的黑河州,是勃突王所建或者说是为勃突王而建,仍感证据匮乏,只能是如是而说。

辽代的五世祖为何人,《辽史》中多见者,最高排列到四世祖(肃祖·耨里思)。辽太祖的始祖,即阿保机的七世祖为“雅里”。(耶律严书中为涅里,陈大任书中的雅里),雅里生

<sup>①</sup>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470页。

毗牒(为六世祖),毗牒生颧领(为五世祖,颧领生耨里思(为四世祖即肃祖),耨里思生萨拉德(为三世祖即懿祖),萨拉德生匀德实(为二世祖即玄祖),匀德实生撒拉的(为一世祖即德祖),撒拉的生阿保机,为辽太祖。<sup>①</sup>

关于“必其格图”山石上的墨书汉字题记,不仅这里有,前文已提到的保和馆河东的锅撑山上有。由此北行,直线为32公里的“山头村”的山石上也有。由山头村再往东北走,距离为6公里的“阿力木图”山上还有。就是在辽庆州的白塔上,1992年前维修白塔时,在塔身上也有发现。这几处的墨记与书体,基本相似。我认为这些黑书题记,可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这些墨记,足可说明,这是辽国自圣宗统和六年(988年),在南京地区“诏开贡举”<sup>②</sup>,到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改为在上京地区“御试进士开始”<sup>③</sup>有关。这应是士子们,在路途中的情感抒发和来过契丹腹地的一种游记。

二是这些墨记还标明,这是过潢水石桥后北上,通达夏捺钵要地的必经之路。有辽一代,尤其是到兴、道二宗朝,夏捺钵一般多在怀州和庆州地区。如重熙七年(1038年),重熙十一年(1042年),重熙十五年(1046年),兴宗均在六月御清凉殿试进士。重熙十九年(1050年)六月幸庆州谒大安殿,御金銮殿试进士。<sup>④</sup> 沈括使辽时,也是夏季。道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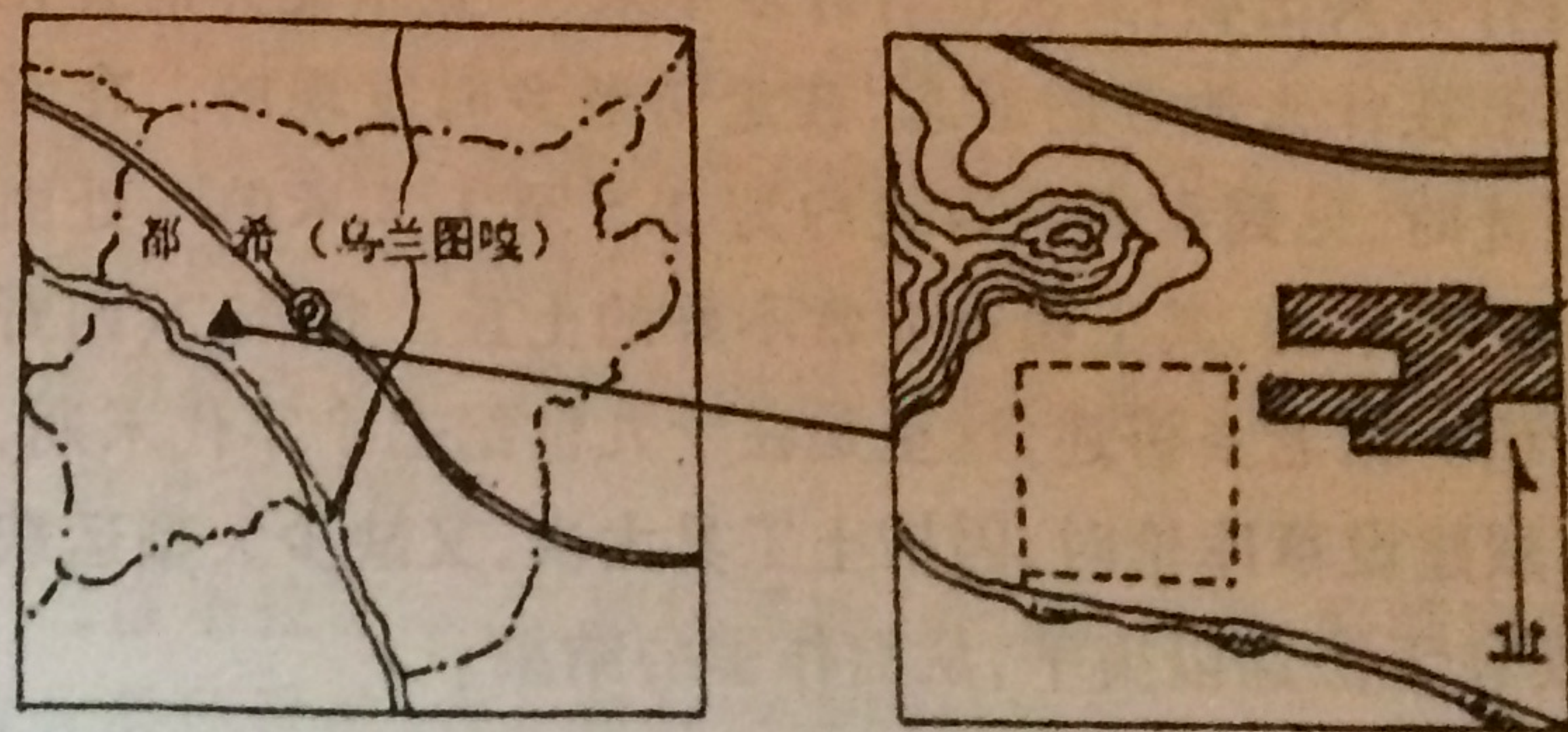
① 《辽史·本纪太祖下》24页。  
 ② 《辽史·本纪圣宗三》133页。  
 ③ 《辽史·本纪兴宗一》218页。  
 ④ 《辽史·本纪兴宗1-3》211-248页。该清凉殿,即怀州西山上所建。就是今幸福之路苏木的阿力木图山上的高台建筑群遗址。

的行宫,其时在今巴林右旗的乌兰坝山阳的平甸上。所以他没去上京,也没去清凉殿。而是北上后经庆州城外的东南,再东北行到“单于庭”即道宗夏捺钵的殿帐。

都希苏木友爱村的古遗址,是辽上京道所辖的又一个黑河州州城遗址。它的始建时间和它应属于头下州还是一般的州城,因《辽史》中没有明确记载,又从未见有刻石等出土文字可证,尚且说不清,且暂在“头下州”条中存此之说,以企教正。

至于建城的时间,我以为其下限,最晚也不可能晚于大康元年的前一年,即沈括使辽时的前一年咸雍十年(1074年)。或许该头下州黑河州,早在重熙七年(1038年)时,这个州城,就该建成。

附:友爱村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 六、塔班板遗址

塔班板遗址,位在巴彦塔拉苏木的中稍偏北部。

巴彦塔拉苏木,位于巴林右旗的中东部,西南距旗政府所在地大板镇为22公里。苏木的西端,与沙巴尔台苏木为邻。南端与大板镇和都希苏木为邻。东南一侧与羊场乡搭边。东北一角与巴林左旗毗邻。正北接连着幸福之路苏木。西北角与巴彦琥硕镇连接。

塔班板古遗址,位于苏木治所东约3.5公里。在“双林线(林东至林西)”公路南约120米处。东南距塔班板嘎查约为1.5公里。东距古日古勒台河约为1公里。东南距标高为919米的巴彦查干山峰为5公里。直线南距保和馆为32公里。

这里的天地视野开阔,大地又较为平坦,所以这里被人们称为“巴彦塔拉草原”。我们发现并考察该遗址时,首先是因该地区的牧民老乡,主动送交旗博物馆一陶壶重为4公斤的古钱币。<sup>①</sup>为了弄清其具体的出土地点,以及是否还有什么共出物;其次也有许多年来,一直未能弄清宣化馆址道底在什么地方悬念,在走访老乡时发现的。在考察该遗址时,见到有高出地表约为0.5至1.5米的一处面积近400平米的,其上植被非常不好的土丘。此外,其四野平坦如毡。据老乡讲述,这里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轰轰烈烈建设草库伦时,因推土工具太次,又缺少大型运载车辆,实在无法加以夷平,从而作罢的结果。

在遗址上,我们采集了一些辽金时期的散碎瓷片,同时还发现应为元代时期的建筑饰件,陶质火候不多,颜色灰中

<sup>①</sup> 重四公斤的装古钱币,已在《内蒙古金融研究》1993年2期26页刊发。

偏黄的扁三角形,压印花草纹滴水两块。当然,多见的还是辽代的残砖碎瓦。此外还有边长近80公分、厚约40公分,已完全暴露在地表,或是部分裸露在地外,方形的素面花岗岩柱础数块。

这里是什么遗址,或者说是什么建筑,当地的老乡也说不清楚;有的告知我们,叫“邦肯苏木”意思是庙址。

该遗址的遗物中,其所载的文化信息多为辽代的遗物,然而在《辽史》中的记载并不清楚。还是北宋遣辽使臣的“使辽语录”,为破解该遗址提供了线索。此前已提及过的薛映和沈括,均为北宋遣辽使臣中,曾渡过潢水石桥而北上的使臣。只是他俩自保和馆往北,因各自要到达的目的地不同,所行路线与里程也互有所别,至此就正式分道扬镳。薛映是“保和馆,度黑水河,七十里宣化馆”一直到达上京。沈括是“自保和馆北行数里,稍西北又数里济黑水”一直到达道宗的夏捺钵之地。(今巴林右旗的乌兰坝山阳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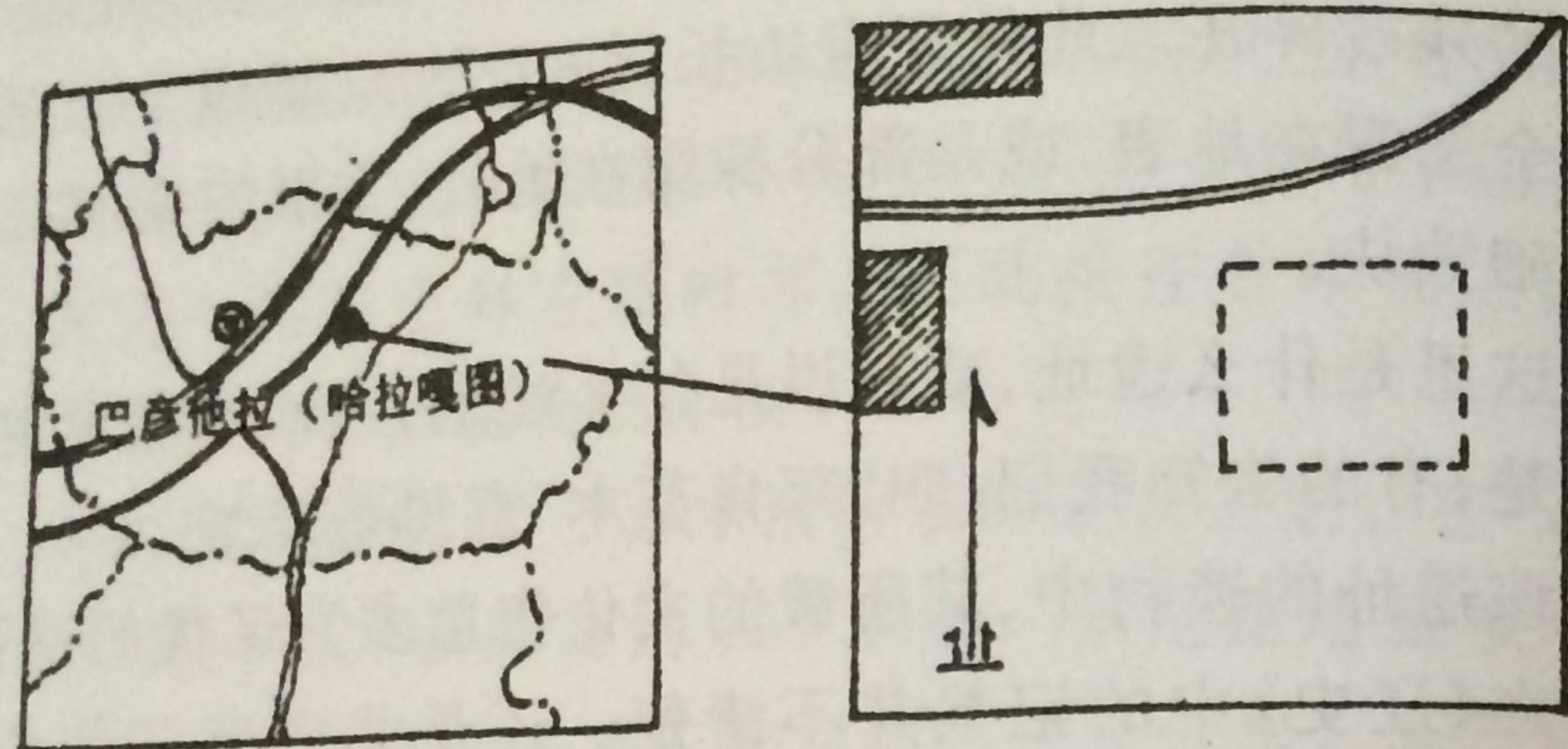
《辽史》载:“宣化县。本辽东神化县民,太祖破鸭绿府,尽徙其民居京南。统和八年(990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sup>①</sup>

塔班板古遗址,营建的时代与性质,应与前进村古遗址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巴彦塔拉苏木,塔理板遗址,是辽上京道,临潢府统辖的宣化县所设的,宣化馆的馆舍驿站遗址。

附:塔班板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sup>①</sup> 《辽史·地理志一》440页。



### 七、岗根城址

岗根古城，位在岗根苏木，苏木治所的所在地。

岗根苏木是 1984 年，才从幸福之路苏木划分出来，重新建制的苏木，因其驻地的古城址内，有过一处名声远播的清代佛寺“岗根庙”，所以新建苏木名曰“岗根苏木”。该苏木的辖境，北与索博日嘎苏木接壤，西与朝阳乡和巴彦琥硕镇为邻，南与幸福之路苏木搭边，东与巴林左旗毗邻。

岗根古城，位于今巴林右旗岗根苏木政府的驻地。苏木政府院落的北墙，距古城的南城墙约 10 米。当地群众称这座古城为“浩特艾勒”，因为古城内有不少牧民定居游牧后居住在城里，所以蒙古语称为浩特艾勒；汉语意即“城营子”或“城村落”。

岗根古城，正东距巴林左旗的林东镇（辽上京临潢府所在地），约 44 公里；东南距巴林左旗的石房子（辽祖州），约 26 公里；西北距索博日嘎苏木（辽庆州），约 35 公里；西南距巴林右旗首府大板镇，约 52 公里。

岗根古城，营建在一处有两条河流流经并在此交汇的山前河川台地上。乌苏伊肯河，自西北向东南而来，流经古城的西侧，再向南流去。床金河，自东北向西南而来，流经古城的东北、正北，在流经古城的西侧时与乌苏伊肯河汇合，成为一条河。这条在此合二而一的河流，自古城的南端起，称为敖日盖河。

岗根古城址的平面呈方形，方向为正南北向。古城城墙的边长，约为 500 米。现在城墙的残高约 2—3 米，基宽约 8—10 米，顶宽约 1—2 米。城墙用土板筑，夯层厚约 8—12 厘米。在夯土内，除在东城墙的夯土层中，发现有少量的新石器时代应属红山文化的“之”字纹夹砂褐陶片和光素的泥质红陶片外，其他地段，均未发现夯土层中，显露有早晚时段的任何遗存。

古城的西墙，已被河水冲刷殆尽，仅在西南端存有一段不足 20 米长的残垣。其余三面城墙，虽均已遭到人为和自然的严重破坏，不过就其走向与規制仍清晰可见。东城墙保存较好，南北通长为 524 米。南城墙保存次之，东西通长为 496 米。北城墙保存较差，其西头已被河水冲毁一小段，今残长为 410 米。古城有南北二门，均设在古城墙的中部。城门外存有不规整的积土封堆，似瓮城遗迹，因遭破坏甚重，且又早已辟为通衢道口，再加无序的畜群日复一日的践踏，在未做发掘工作前，今已很难判定古城是否有瓮城。

古城的四角，应均设有角楼。今仅存东北和东南两处角楼址。角楼略向城墙角外圆突，且略高过城墙。角楼址，东西宽为 14—15 米，南北长约 13—14 米，残高为 3—4 米。

整座城墙的外侧,没有设制马面的遗迹。

古城址内,因为这里是牧业区,并早已成为牧民们定居游牧后的村落。各家各户的房舍,均为就地使土的“干打垒”,即用土板筑。如今有些牧户已改建为砖瓦结构的房屋,但就地使土和泥仍在继续。虽然这里无论纵观还是横看,并不见街井;但是家家的畜棚圈舍,均近房而建,户户的院墙都坚实牢固。这里甬说辽代的遗址,就是文革中破“四旧”时,才被拆毁的清代岗根庙址,也早已是面目全非。

属辽代的建筑遗址,多集中在古城内的中央偏北部。1981年8月,曾在该城内的西南隅,距南城墙121米,距西城墙43米处,发现一辽代陶器窖藏。当时出土时,在被破坏的窖坑内,发现有25件排列有序的大型陶器。陶器均为泥质灰陶、器形有瓮和长颈罐两类,最大者高达90厘米。器物为泥条圈筑接底轮制,表面磨光,有的还饰以篦纹、梳齿纹和编织纹。其中还有一件长颈罐,是用梳齿纹压印出两只鹿头尾相接,栩栩如生的图案。这似与《辽史》中所载,穆宗时期用大酒器来贮酒以祭天的“鹿甬”有关。<sup>①</sup>

古城外往南,即敖日盖河自北向南,虽然在川谷的东西两厢,仍有参差不齐的高山为障,但是川谷已渐见开阔,地形也较城北平坦。尤其是在古城东南的8公里处,走出由东边的“东直门山”(1288.8米)和西边的“海勒斯阿木山”(1165.3米),环抱呈门的川口后,进而出现平展的草甸。山峰在这里也显现出北高南低的走向,且越南越低矮越平

<sup>①</sup> 《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三期 72 页。

缓,同时出现了山脊不连贯的凸峰山和形似大丘的秃顶土山。

城址外的北方和东北方,即床金河的东西两岸及溯河而上。

在紧接古城址的北门外,即西北距床金河不足百米处,今有十几家牧民住户和一些已被废弃的近现代宅墙废墟。这些住户或是废址,有的是建筑在有早期夯土层的台地上的干打垒草苫房;有的则是采自然的山石块垒砌成墙体的泥顶房舍,直接叠压在辽代的建筑遗址上。这里也因遭受人为地破坏和畜群的无情践踏,已无法探考周边原有的残垣断壁。1976年,我们在开始寻觅怀陵时<sup>①</sup>,在已遭破坏但仍裸露的辽代遗址上,在群众的院落里或是家中,见到了不少辽代的青砖、大瓦以及辽宋时期的破碎瓷片。特别是在一户牧民的屋里,发现一块用来铺在地上的辽代方砖,其正面在烧制前,就已刻划好八瓣莲花图案,其气韵很具渤海风格。就这里的地形地貌,以及其大概的面积和遗物的文化信息来推断,这里应是古城的一处附郭。应当为辽怀州所辖二县之一的扶余县,县城遗址。

在城外的北面,在邻近城址而隔着河的“玛尼吐”山嘴的东南端,即床金河西岸的山坡上。有一处靠山营造的辽代建筑址,当地群众称该山为“磴磴山”,磴磴山的建筑址为依山就势,用不规则的块石,垒砌好每层退台的直立面的墙体。每层退台都是铲平山坡,向里叠退而形成平台。从山

<sup>①</sup> 《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三期 67 页。

下地平至山顶上,共有六层退台,今平台上的建筑遗迹,仍清晰可见。<sup>①</sup>

城外溯床金河往北,川窄谷深,东西两侧多有高山叠影。虽然在有的地段,间忽也出现川广谷阔的地方,但是一直没有东西通达的道路。直到临近赛汗乌拉山(黑山)前的乌尔塔哈马尔山峰时,才有可向西出入的小路。此外,在磴磴山往北约1500米处,在床金河的西岸,有一拔地而起的陡峭的山峰直壁,当地群众称它为“给拉德琥硕”,汉语意为凤凰嘴。在该山的正东,隔河与小床金沟门(怀陵区)直对,此山实为一天成的照壁。

怀陵区,西南至岗根古城址,约7公里。

城外西北,即乌苏伊肯河往北。这里除在河东多有高山外,河西和河北虽然也有几座山,但更多的是丘陵和草甸,水草丰美交通便捷,实为良好的放牧之地。

在距古城西南约18公里处,有一座突兀的怪峰“阿力木图山”。山上有多处辽代的建筑遗址和遗迹,这里应为一雄伟的高台建筑址。山坡地表,不乏辽代建筑上的瓦饰构件残块,亦有饰以绿釉的瓦片。今山阳的入山口,尚有一硕大而完整的花岗岩龟趺。(图版附后)上山的盘山道,多用巨石精心垒砌。今山中既有涓涓的泉水,更有许多滴翠的山梨树,因此蒙古语名此山曰“阿力木图”。在临近盘山道的一些山峦石壁上,尚可见有已漫漶不成文的汉字墨书题记。这里应是《辽史》中记述的,“怀州西山有清凉殿,亦为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一期60页。

行幸避暑之所”<sup>①</sup>的“西山”和“清凉殿”的所在。《辽史》所载关于怀陵在“西山”一说,有误。

岗根古城址,应是有辽一代的怀州城城址。《辽史·地理志》载“怀州,奉陵军,上,节度。本唐归诚州。太宗放牧于此。天赞中,从太祖破扶余城,下龙泉府,俘其人,筑寨居之。会同中,掠燕、蓟所俘亦置此。太宗崩葬西山,曰怀陵。大同元年,世宗置州以奉焉……穆宗被害,葬怀陵侧,建凤凰殿以奉焉……隶永兴宫。统县二。”<sup>②</sup>

岗根古城所在地,原是辽太宗耶律德光当皇帝以前,在此行帐放牧的地方,是辽代早期“天赞中”即公元922年—926年,当时太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时,在战争中俘获人口后,遣移至此建筑的居所。

太宗践位后十年,即天显十年(公元935年)春正月,靖安皇后肖氏,小字温,崩于行在。五月“上自制文,始制服行后丧,葬于奉陵……天显十二年,秋七月,幸怀州,谒奉陵。”<sup>③</sup>由此可知,岗根古城,到太宗“会同中,掠燕蓟所俘亦置此”,直到太宗崩,葬怀陵止,这里一直是辽太宗所置的州城。至于怀州的名称,应始于公元935年。此外,我以为“奉陵”,也应葬于“怀陵”陵区之内,当为不误。

太宗死后,葬怀州附近,陵曰怀陵。大同元年(公元947年),辽世宗继位时,特将此城充为奉陵邑,并统县有二。《辽史》中所载“世宗置州以奉焉”,是指将怀州充为奉

① 《辽史·营卫志中》374页。

② 《辽史·地理志一》44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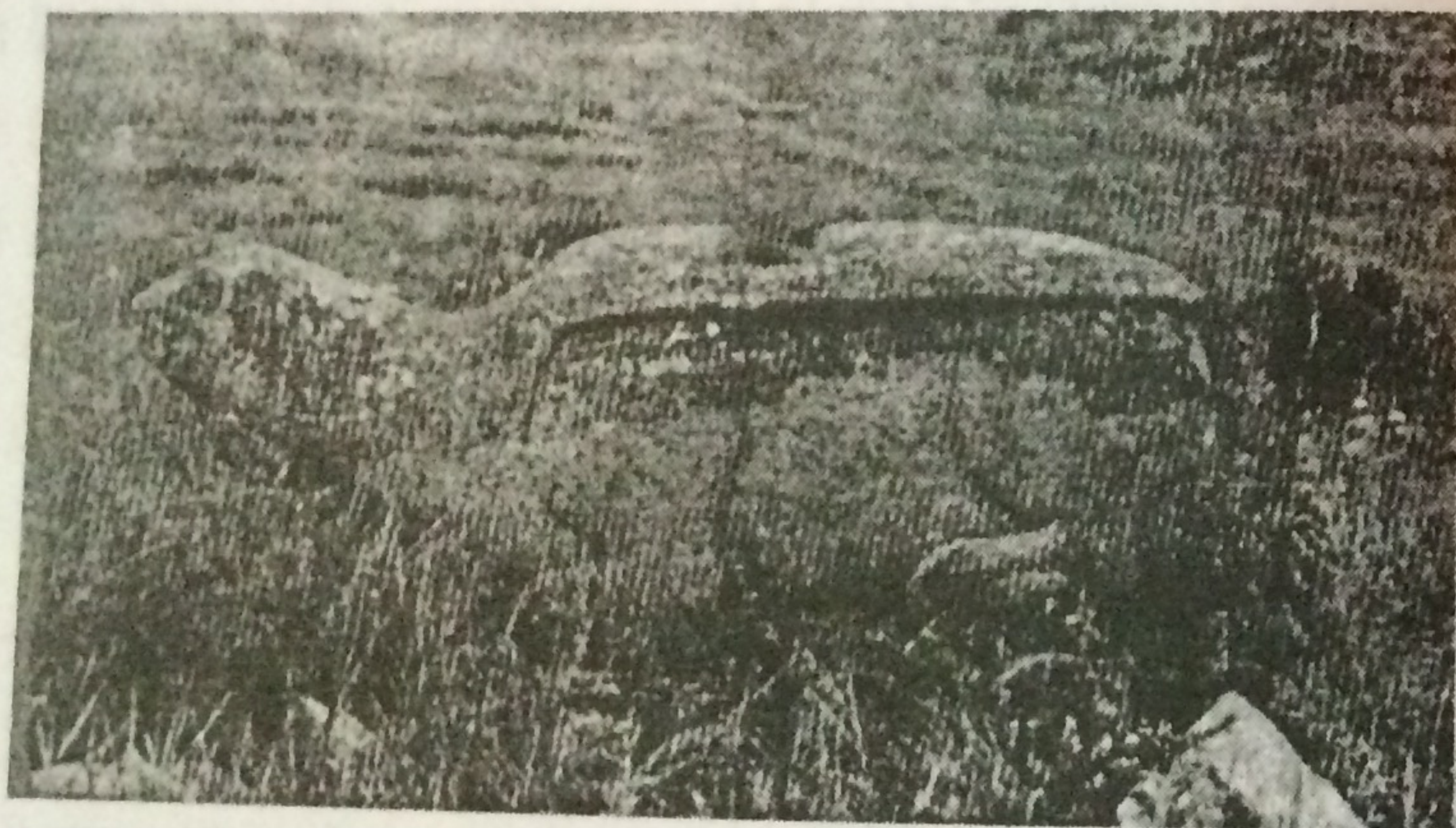
③ 《辽史·本纪第三》41页。

陵邑，怀州之实和怀州之名，并非世宗时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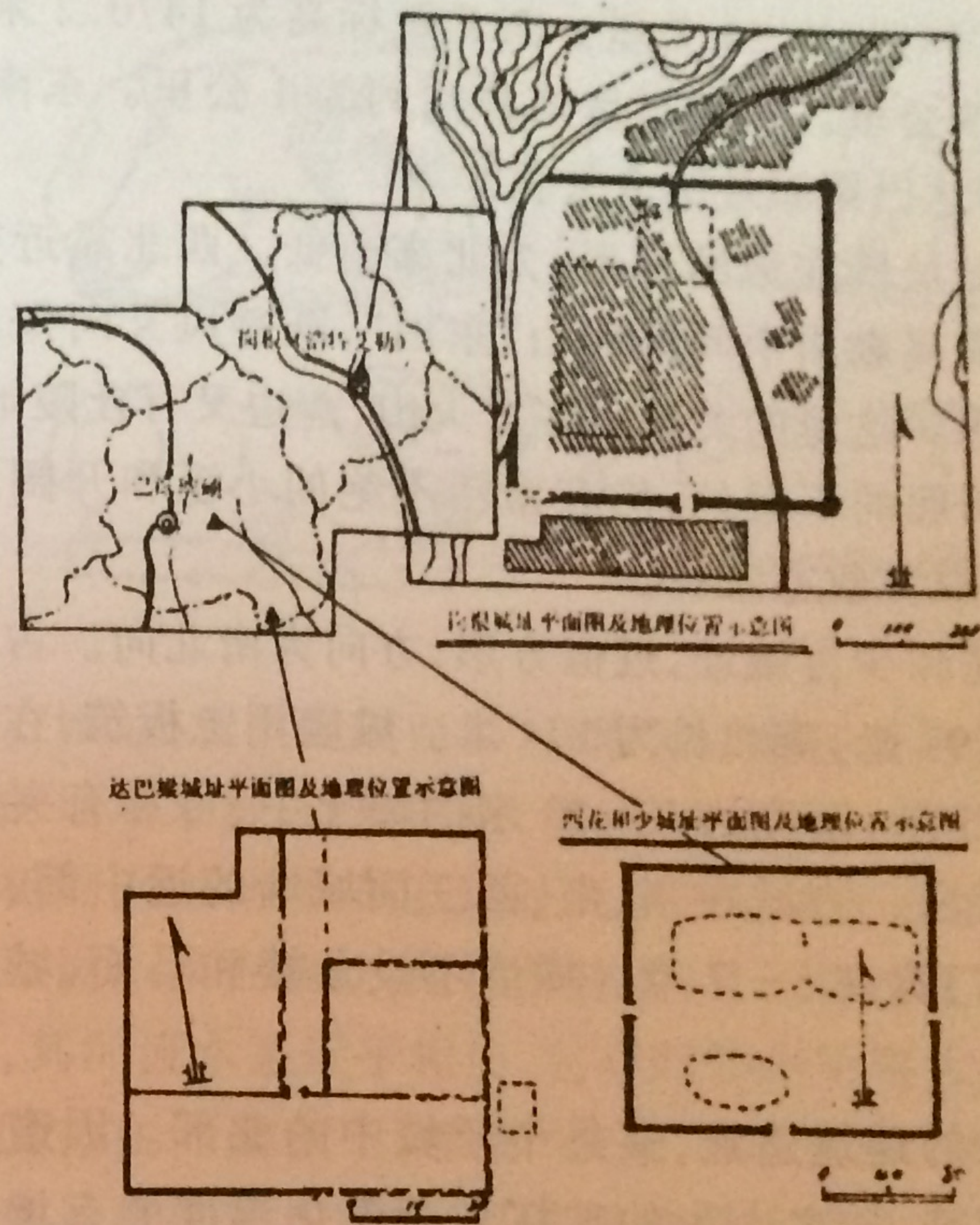
岗根古城北门外的大片辽代遗址，应是怀州所辖二县中的扶余县址，是怀州城的附郭。《辽史》载“扶余县。本龙泉府。太祖迁渤海扶余县降户于此，世宗置县。户一千五百。”<sup>①</sup> 由此可知，城北门外的大片遗址，从怀州的名份中单列出来冠以县名，应始于“大同元年”公元947年。当然这里的移民，最早还是始于“天赞中”筑寨而居之人。

岗根苏木古城址，是辽代上京道的怀州城城址和怀州城的附郭——扶余县城的遗址。

附：河力木图山前龟头图版和岗根古城址平面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sup>①</sup> 《辽史·地理志一》443页。



岗根古城址平面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 八、西花和少城址

西花和少古城址，位在巴彦琥硕镇的中略偏南部。

巴彦琥硕镇，位于巴林右旗的中偏北部。北与朝阳乡为邻，东与岗根苏木和幸福之路苏木相连，东南与巴彦塔拉苏木接壤，南端和西南端与沙巴尔台苏木搭边，西以黄花坝、查干坝、舍尔图坝等山梁与查干沐沦苏木为界。

西花和少古城址，位于巴彦琥硕镇中略偏东南的山谷丘陵坡地上。西距镇政府所在地为6公里。东北距岗根苏

木古城(怀州)约 20 公里。西北距标高为 1470.2 米的“东山”,为 3 公里。东距巴彦塔拉河约为 1 公里。东南距“燕王城”即达巴梁城址为 9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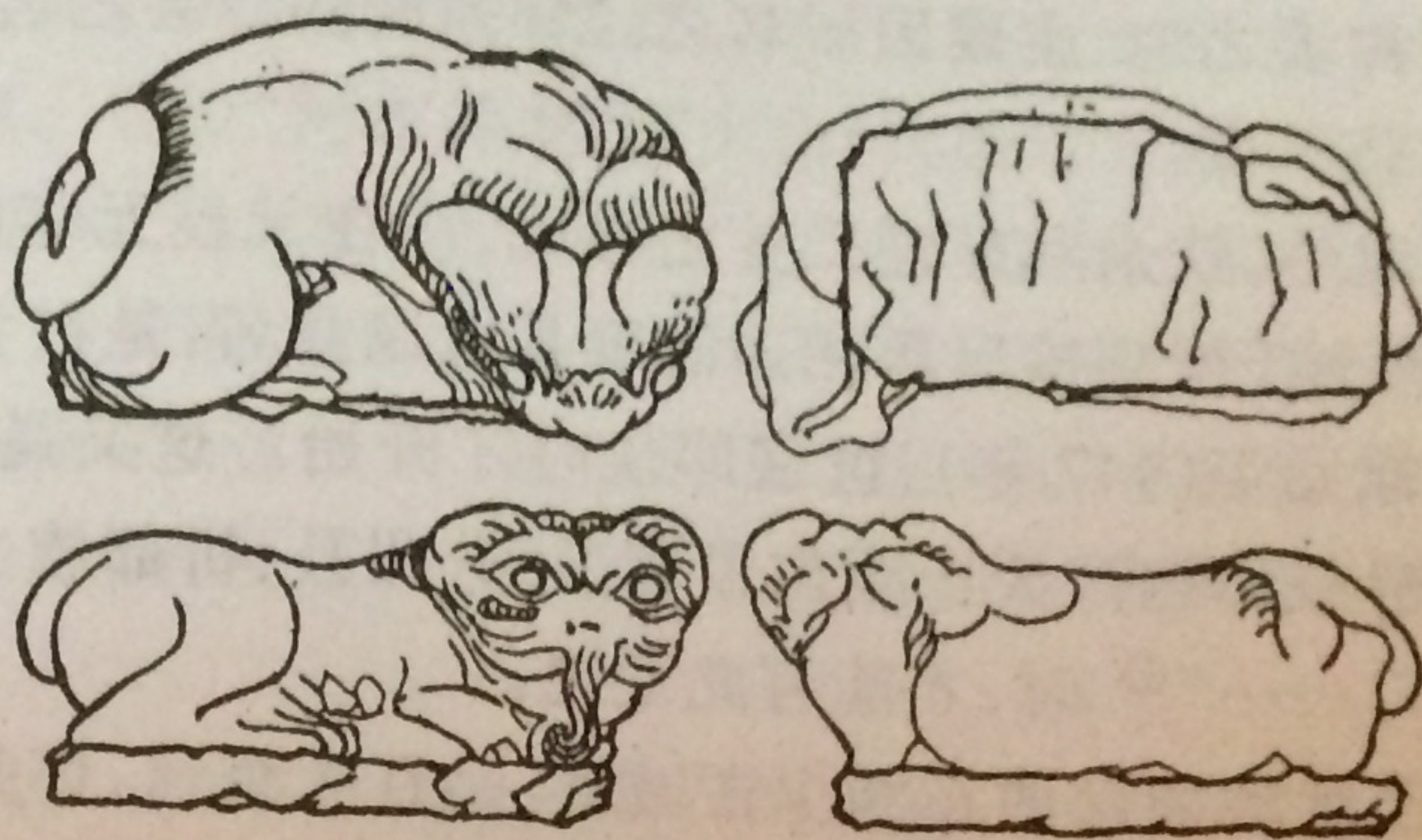
古城址所在地的地形,为北高南低。西北靠近要日吐川和辉腾高勒川中间的大山“东山”,既避风又向阳且没有洪水之患。这里的北境虽多有大山,南边又有丘陵地带,但其东西两厢的不远处,均有常年不绝的小溪和开阔的河川谷地,宜农宜牧亦宜林。

西花和少古城址,近似方形,方向为南北向。古城址东西宽为 197 米,南北长为 174 米。城墙用土板筑,在残高为 0.5-1.5 米,基宽为 7-10 米的墙土中,可见有夹杂山石碎块的现象。古城在东、南、西三面城墙的近中部,均各辟有城门,门宽在 5-7 米。城墙不设角楼和马面,城门也没有瓮城。

城内的建筑遗迹,多集中于城中的北部。因遭受畜群的无情践踏,加之人为的破坏和荒漠化程度的有增无减的蔓延,古城内原来的布局和规制已不易辨认。我们在城址内,未采集到有文字的遗物,散落在地表的陶瓷片,既碎小且量也不多,均为辽宋时期的遗物。

我们在距古城址比较近的胡勒斯台村的村民中调查时,曾征集到数件辽代文物,其中有一件为“镇茵石狻猊”。狻猊的石质为绿沙岩,总长为 21 厘米,高为 10 厘米,上宽为 12 厘米,底宽为 11 厘米,底长为 16.5 厘米。文物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内。

附镇茵石狻猊的俯视、侧视和正反面线图。



该古城址,就其规模而言,只能是一座县级的城址。就其所处的地域来看,辽代的祖、怀、庆州之间,一般均有大山相连又相隔,各州所辖的县城址又多随河流水系相关分布,而选址布设。该古城址,距怀州较近,且与怀州之间未有大山之隔,其河流水系近乎相连,它应归怀州所辖为是。

《辽史》在怀州条下,辖有“扶余”和“显理”两座县城。而这两座县城在置县以前,其移民均是太宗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时,从太祖在破渤海,俘扶余和显理之民,迁来太宗的放牧之地。如“显理县。本显理府人,太祖伐渤海,俘其王大湮 𩚑,迁民于此,世宗置县。户一千。”<sup>①</sup> 其时为“天显元年(926年)秋七月,卫送大湮 𩚑于皇都西,筑城居之。赐湮 𩚑名曰乌鲁古,妻曰阿里旦。”<sup>②</sup> 据此,西花和少古城址,应为辽怀州所辖的显理县县城遗址;当然这是我的管窥之见。

有辽一代,在一些州县的冠名方面,常“又以征伐俘户

① 《辽史·地理志一》443 页。

② 《辽史·本纪太祖下》2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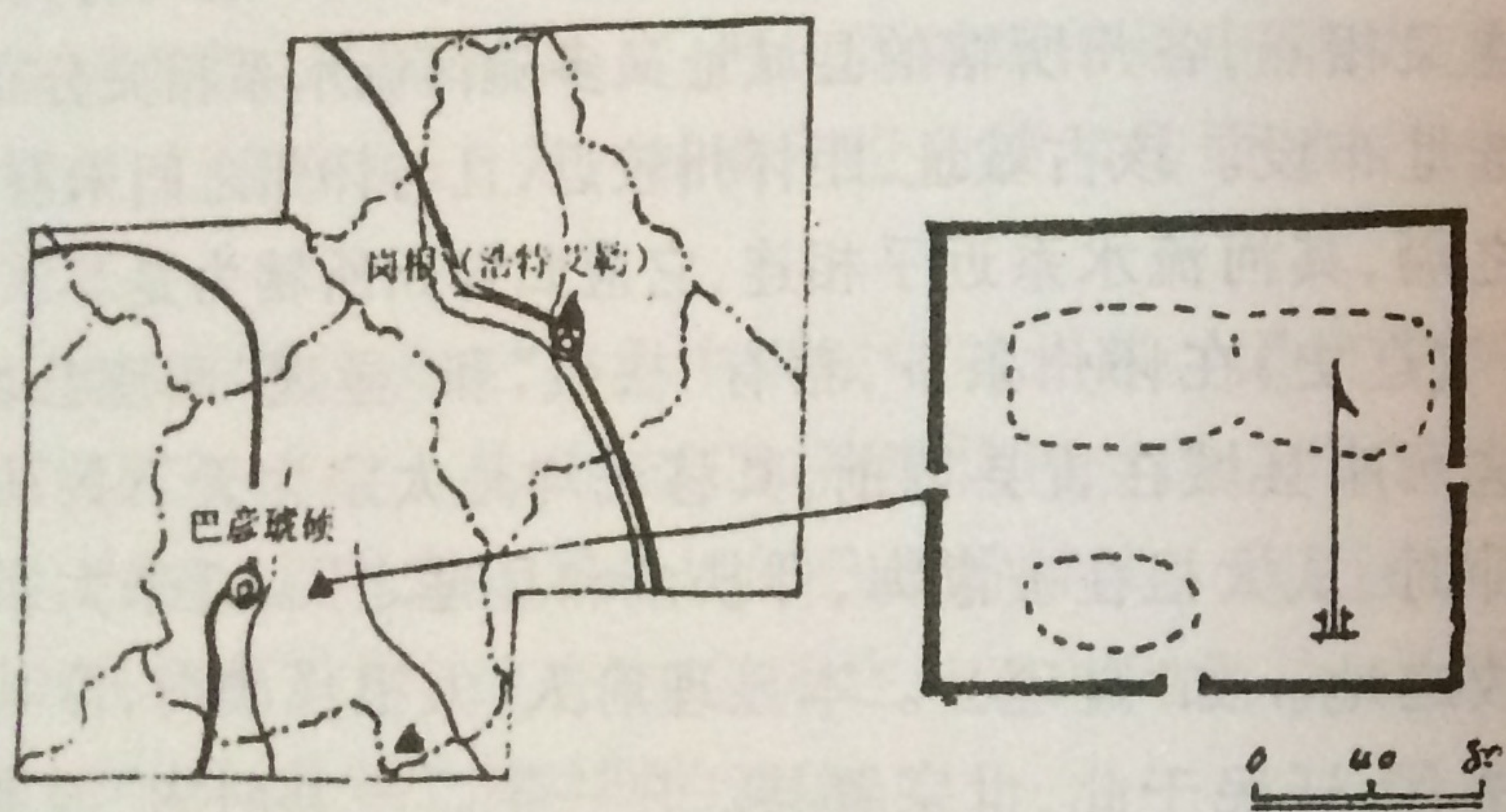


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怀州所辖二县之名，是可证此记载不误。<sup>①</sup>

此外，扶余和显理二县之移民，应在天显元年(926年)时，就已迁徙到这里居住。而置县冠以县名，是在大同元年即天禄元年(947年)，世宗即位时才开始。这又是为什么？《辽史》载：只有“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sup>②</sup>时，才能有此变更。

巴彦琥硕镇西花和少古城址，是辽上京道，怀州所辖的显理县的县城遗址。

附：西花和少城址平面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 九、达巴梁城址

达巴梁古城址，位在巴彦琥硕镇的东南端，在山头村辖区之内的西北部。

<sup>①</sup> 《辽史·地理志一》438页。

<sup>②</sup> 《辽史·营卫志上》362页。

达巴梁古城址，北距“哈日少冷”标高为1281米的山峰为2公里。南距“阿布德龙台”大山(汉语意为箱形山)东北隅的标高为1222米的“虎头山”为3.5公里。东距山头村为4公里。东南距由山头村管辖的自然村，达巴村不足1公里。西南距“达巴梁”豁口为2.5公里。今标高为1053米的豁口处，有便道，可通达沙巴尔台苏木所在地的塔本花煤矿。

古城址，营建在一座东北西南走向，直线长约8公里的达巴梁的近正中，峦峰前山坡上。

古城址所在地的地形为西北高东南低，城址就在山峰下的坡顶上。城址所在地段的山坡，在城址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条山涧与相邻地段分隔，泉水从涧底涌出。这两涧间的距离，直线约为1公里。城址北的山涧，南距城址约100米。

古城址，为一座山城。城墙似均用不规则块石垒砌而成。今残高为1-1.5米，残宽为9-10米。方向为10度，即顺山而建。

城址平面，为缺角而近似方形(西北角可能因山涧之故，内缩呈缺角)。西城墙横山坡而建，因为北有缺角，故分为两段。长段南北长为45米，短段即内缩地段为10米。北城墙亦为西段。西北角内缩地段即短段为17米，其余为长段，东西长为40米。东城墙，南北长为55米。南城墙，东西长为57米。城墙上的城门开设，仅从地表识别已无法确认，似应有东门。

城内建筑遗迹，已不见踪影，只是从地上不规则石块，

仍裸露而醒目的高出地表的痕迹和走向,测得城内的布局如下。

城内的南端,有一条东西通长,南北宽为15米的条形地带。这一条长形地带北端的正中,辟有门道,门道残宽为6米。条形地带往北,正中的南北向,有一条宽约13米的通道。道东似分为两个格区,道西为一个格区。

城址外,在古城的东城墙外。在条形地带略化,距古城墙不足20米的台地上,有一裸露有辽代残砖碎瓦且高出地表约0.5-1米的,面积略小于30平米的建筑遗址。再往前(即往东往山坡下),再未发现什么建筑遗迹,均为山坡地和坡下的山川平谷。

古城的南城墙外。在距离南城墙约60米处,有顺山势的东北西南走向和依照山坡陡缓的比降,自上而下修筑有8道阶梯式的台地工程。台地的阶边,亦是用不规则块石垒砌,台地的宽度为30-50米。台地的长度,今仍可见有百米以上。

在对该城址的考察时,除发现建筑构件中的残砖碎瓦,均为辽代惯用的沟纹砖、布纹瓦以及压印纹的条形滴水外。陶器碎片中,多有磨光并兼有暗弦纹的灰陶片。瓷片中除有辽宋白瓷碎片外,辽三彩器残片,这里并不罕见。此外,还发现辽代小石磨的上扇残块一件。而外,再未发现早于或晚于辽代的遗物。

就该城址的营造形式,在辽代众多的城址中十分罕见,但是就城址中发现的遗物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信息,认定其为辽代城址当为无误。然而《辽史》中,并不见有该城址的

任何蛛丝马迹,同时历年来,也未曾发现有任何碑石铭文或出土文字与该城址有关。还是科学家、北宋遣辽使者沈括,在他的“使契丹图抄”中,记录了该城址的地望和称谓。“黑河州。过州西北行十余里复东北行,出大山之东,又三十余里至中顿、顿西数里,大山之巅有废垒,曰燕王城。”<sup>①</sup>这段记录,或因当时沈括未登临城址视角不同,“大山之巅”一词不确。古城址并不在大山之巅,而是在山峰下的山坡顶上。但是,就其所行里程、方向来验证、沈括记录不误,如从友爱村(黑河州)出发,西北行十余里,从麻斯他拉东的“歪脖子山”西边绕过复东北行,是为了避开吉布吐、乌兰海一带的“阿布德龙台”等大山,而走宝木图、哈日根塔拉到山前之路,所以又三十余里到中顿。“中顿”应是途中息脚打尖的地点,似应在如今的“山前村”。顿西数有废垒,如今已知古城址东距山前村(山头村所在地)为4公里。

达巴梁城址,为辽代的燕王城。顾名思义,该城址是燕王所建或者说是为燕王而建的私城。《辽史》在“百官志”和“地理志”中,关于建私城已有明确的记载,只有“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头下州城”,是“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那么谁是燕王,这是个关键问题。

首先,燕王的称谓,是辽代时期的封爵或者说是一个封号。如果是女性,如公主,其封号就是燕国公主或是某国公主。如是男性,如皇族或国舅族,其封号就是燕国王或是某国王。

<sup>①</sup> 《永乐大典》。

其次,燕王这一封号,在辽代并不是专为一人所封。查《辽史》的表、纪、传中,先后受封为燕王者,计有如下九人之多。

赵延寿。天显十一年(937年)太宗发兵太原时降将。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改幽州为南京,迁留守。天禄二年薨(948年)。

韩匡嗣(韩德让——耶律隆运父)。应历十年(960年),为太祖庙详稳。景宗即位,拜上京留守。顷之王燕,改南京留守。乾亨三年(981年),改为西南面招讨使。卒。

耶律牒蜡。六院夷离菑蒲古只之后。天显中为中台省右相。世宗即位,封燕王,为南京留守。天禄五年(951年)即应历元年。寿安王(穆宗)讨乱,牒蜡不降,陵迟而死。

韩制心(韩德让——耶律隆运侄)。太平中历中京留守、惕隐、南京留守、徙王燕,迁南院大王。年五十三去世,追封陈王。

萧孝穆。淳钦皇后(太祖皇后)第阿古只的五世孙。圣宗元妃、兴宗生母法天皇后之兄。兴宗仁懿皇后之父。开泰元年(1012年)拜北府宰相,太平三年(1023年)封燕王,南京留守兵马都总管。重熙六年(1037年)封吴国王,九年(1040年)徙王楚。重熙十二年(1043年)更王齐,薨。追赠大丞相晋国王。

耶律吴哥。圣宗四子(仆隗氏生)。封燕王。开泰二年(1013年)为惕隐,出为南京留守。薨于南京。

辽道宗耶律洪基。六岁封梁王,重熙十一年(1042年)进封燕国王,总领中丞司事。明年总南北院枢密使事,加尚

书令,进封燕赵国王。

瑰引。燕王。孟父房楚国王之后,不知世次。(皇族表1017页)

耶律挾鲁。天祚帝第三子,燕国王早薨。(皇子表996页)<sup>①</sup>

就如上九位受封为燕王者,并非所有人都是燕王城的建筑者。

其一,不具备建城资格,绝不能在此建城者。如赵延寿、韩匡嗣、韩制心等三人。他们最起码不是辽内四部族的成员,根本不能在此城。他们受封为燕王,这只能说明辽朝对他们的格外器重而已。

其二,有建城资格,但不可能在此建城者。以下四人,均四帐皇族的成员,有资格在此建城;但此燕王城的建筑与他们似无任何关系。如圣宗四子吴哥。因他受封为燕王后,一直留守南京,并薨在南京,是不可能在此建成。牒蜡。从受封为燕王到遭陵迟而死,在职时间共为三年零十一个月,且任职在南京,也不可能在此建城。瑰引。不知世次。挾鲁。不仅出生较晚而又为早薨,他俩也不可能在此建城。

其三,有资格,有可能在此建城者。

辽道宗,在此建城有可能但参数很小。如果说道宗在受封燕王后,在此建城。到沈括使辽时,道宗即位才20年,还远不足他在位的一半时间。一个在位的皇帝,废弃自己所建的私城,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而道宗在此建成亦

<sup>①</sup> 多摘录于《辽史·列传》。

不大可能。

唯有萧孝穆，建筑此城，在沈括使辽时（北宋神宗熙宁八年即辽道宗大康元年1075年），城池已废，是大有可能。

萧孝穆，在圣宗朝，“太平三年（1023年）受封为燕王，南京留守，兵马都总管。太平九年（1029年）九月，因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僭位，号其国为兴辽，年号为天庆。十年（1030年）十一月，南京留守、燕王萧孝穆，以东征将士凯还，戎服见上，上大加宴劳。”<sup>①</sup> 萧孝穆在此时建燕城，大有可能。到兴宗朝，重熙六年（1037年）三月，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又受封为吴王、楚王以及更为齐王。其时，其弟孝先为南京留守。<sup>②</sup>

萧孝穆的为人，史载“与人交往，始终如一，时称‘国宝臣’”。但是其后，即他的三个弟弟以及子侄们则不然。如其弟孝先，在法天皇后弑仁德皇后一事，孝先等出谋居多。在废立重元一事，他与法天后有谋。他以椒房亲，太后所重。在枢府，好恶自恣，权倾人主。其弟孝友，也曾受封过燕王。由于在伐夏战争中失利，兴宗欲诛之，太后救免。后因其子胡睹与重元谋而伏诛<sup>③</sup>。其侄（孝友之子）胡睹。清宁中为北、南院枢密副使。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与重元子涅鲁古谋逆，胁弩手军犯行宫。同党立重元僭号，他自立为枢密使。既战，涅鲁古中流失而薨。重元亡入大漠，自杀。胡睹投水死，其五子同日谋之<sup>④</sup>。如果我判断无误，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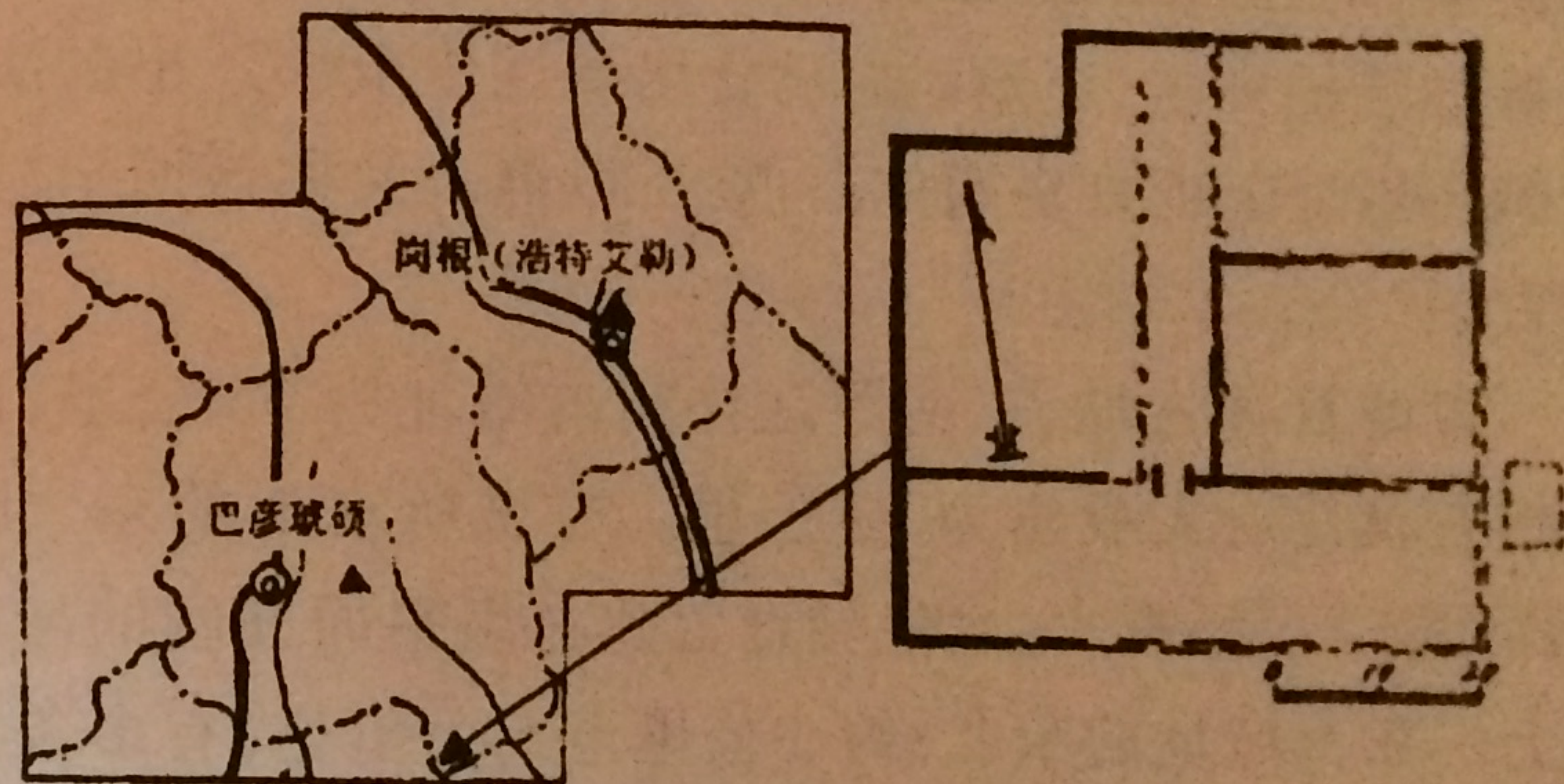
① 《辽史·本纪圣宗八》205页。  
② 《辽史·本纪兴宗一》218页。  
③ 《辽史·列传十七》1334页。  
④ 《辽史·列传四十四》1513页。

宗朝“清宁七年（1061年）五月，杀东京留守陈王萧阿剌”<sup>①</sup>，这位阿剌应是萧孝穆之子。

由于萧孝穆的弟弟和子侄们，多为败类，所以城池不保，又被废弃。上述推断仍属我见，冀以教正。

巴彦琥硕镇，达巴梁城址，是《辽史》未载，是未被收归朝廷管理而废弃的私城。就其地域分析，应属辽上京道，头下州条中为是。

附：达巴梁城址平面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 十、索博日嘎城址

索博日嘎城址，位于苏木治所的东北隅。

索博日嘎苏木，位于巴林右旗的北端，由于苏木治所附近有一古塔，因以为名。“索博日嘎”，就是蒙古语对“塔”的称谓。

① 《辽史·本纪道宗一》258页。

该苏木的东南与岗根苏木搭边,西南与朝阳乡接壤。正东与巴林左旗为邻。北和西北部依大兴安岭山脉,与锡盟的西乌珠穆沁旗毗邻为界;其代表性的山峰自东向西有:呼日格达坝、乌兰坝、二林达巴、萨如勒山、平顶山、瓦林辉特乌拉等等。

### (一)古城址的地理位置

索博日嘎古城,位于今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治所的东北隅。苏木机关、医院、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均建筑在古城的内城的西城墙以外,和外城的西城墙内外。多数民户的院落,均建筑在古城的内城墙外的西南角。古城内尚有一些零散的民居,当地政府已作出要逐步全部迁出的决定。又因古城址上的古塔通体白色,所以群众又称该城为“白塔子古城”。

索博日嘎古城,东南距辽怀州古城址为 35 公里,南距巴林右旗首府大板镇为 98 公里。古城所在地的东、北、西三面远方,多环有大山,但城址营建在坦平而开阔的冲积平原上。在古城址的东北,约 3 公里至 5 公里处,有多条源头不同,各有流向的小河在此汇合后,经古城的东边南流,在流经古城的南边后向西南直泻而去。这些河有东向西而流的源于赛汗罕乌拉(黑山)的“罕山沟河”。有由东北和北,流向西南的,源于呼日格大坝的“阿日山河”。源于乌兰坝的“辉腾河”。源于二林坝的“沙里乃河”。源于平顶山的“鸭子河”。有由西向东南而流的,源于瓦林辉特乌拉的“王坟沟河”和源于必图乌拉的“必图河”。这些河流的名称,《辽史》中未见有记载。或许其时本已有名,只是被简称为

“黑河”而概之。这条在古城东北 3 公里至 5 公里处合流后的河流,如今名为查干沐沦河,其实就是有辽一代的“黑河”。

### (二)古城的布局概况

索博日嘎古城址的平面,呈近正方形,因其周以郭郭,所以又似“回”字形。其方向为 349 度,地形略显北高南低。

古城址的外城墙,绝大部分地段,不是早已辟为牧场或者耕地,就是早已改建为居址和院落,东南两方有的则是被河水冲毁,几乎破坏殆尽。今只在外城的西北角以及其向东和向南的走向地段,尚可见有断断续续的外城墙的遗迹。

外城的北城墙,自城角西北起,有一段东西向长约 400 余米,较醒目的城墙遗迹。其后,其中间地段虽已被破坏,但在近东端处,仍有 30 余米清晰可见的外城墙遗迹。这一外城墙,距内城北城墙的间距为 120 米。

外城的西城墙,自西北城角起,只有一段南北走向长约 300 米的外城城墙遗址。这段西城墙与内城西城墙的间距,为 300 米。

尚存外城墙的残高,在 1-1.5 米,宽可见为 5-7 米。因破坏甚重,外城的城门等如何设置,已无从可考。本文《示意图》中,所用虚线表示外城的轮廓,只是依照外城西北角,城墙的分布规律勾划而成,并无实测数据。

古城内城的城墙遗址,保存尚好,其两个对边并不相等。北城墙宽为 937.51 米,南城墙宽为 929.38 米;东城墙

长为 1100.08 米,西城墙长为 1103.60 米。<sup>①</sup>

城墙均为用土板筑。夯层厚为 15 公分,夯窝宽为 13 公分。夯土纯净,未见有任何早期的遗物。内城的城墙残高为 4-4.25 米。

内城共设四门,分东南西北;门宽约 20 米。四门中唯北门未设瓮城,其余三门均有瓮城。

南北门,设在城址正中,虽为对称,但并不见有南北门直通的道路。如是由南门入城,其直通北方的道路,只能抵达内城中偏北约五分之三的地区。其地有一东西向的南北宽约 30 米的横向通达地带。再往北,不但不见此纵向通道,而且地形亦有明显的不同。横向地带的北面,其地平要高出南面近 1 米。其北门的功能,似只供横向地带北区内的某些建筑群专用。

东西二门的开设,并非在城址的正中;而是在城址的中略偏南部。即在南约占五分之二,北约占五分之三之处。该二门间,有平直的通道,只是在与南北向道路的交叉处,其地形略显漫高,原似有建筑。该平直的通道,由此分为左右两段横街。

内城的城墙,对边均设有均称的马面。东西各设 8 个,南北各设 6 个。马面间的距离为 100 米和 110 米。

在内城的横向地带以北,暂称为“北区”的东北隅,有一与“内城”很不协调的小城。其所筑的西和南两面城墙,其

<sup>①</sup> 我们在维修庆州白塔工程的同时,就邀请了内蒙古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对庆州城的地形做了科学的测绘。这一组内城墙的数据,即为 1992 年孙德龙先生等测绘的结果。

中有数段墙址是叠压在“内城”的原建筑基址上。该城的东和北两面城墙,又直接借用了“内城”的城墙。西城墙的北端和南城墙的东端,均为建筑在“内城”墙上,且矮小于“内城”墙许多。西城墙南北长为 380 米。南城墙东西宽为 265 米,其正中有一近 15 米的豁口,当为城门。该小城的城墙残高在 2 米左右,墙土中可见有辽代的砖瓦碎块。同时其南城墙,并未与“横向地带”取齐,而是向北亦可说是向后退了近 30 米。该小城显见要晚于索博日嘎古城,也不属古城原有的建筑布局。应为《金史·地理志》所载的“奉州”旧址,亦或还包括奉州所辖一县的“朔平县”址在内。

在内城“北区”近西北隅的城址上,即“横向地带”北面的近西端,有一外形为楼阁式的八角七层砖木结构古塔。古塔为营建在一处佛寺的门后和殿前的重要建筑物,这一现象在辽代的社会中是极其罕见的;也是唯一在此处才可见到的。

辽塔多为密檐式砖塔,就是在上京、中京、东京以及南京的多处古塔,基本如是。楼阁式塔,因其功能所在,虽对外宣传的口径仍为虔心礼佛,实则主要内涵是为了远眺或料敌,因而这类塔多建在边境地区。如呼市东郊的“万部华严经砖塔”和山西应县的“木塔”。这里则不然,这里是辽代的腹地,又是有辽一代秋捺钵的要地,还是圣宗、兴宗、道宗三陵的奉陵邑。这里没有“料敌”的问题,就是要登高远眺也没必要靠塔来完成,因为这里高山林立。那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在城池的西北隅,建外型为楼阁式,内中塔心室又不设梯道且互为封闭,这种品位极高,且又是塔前殿后和以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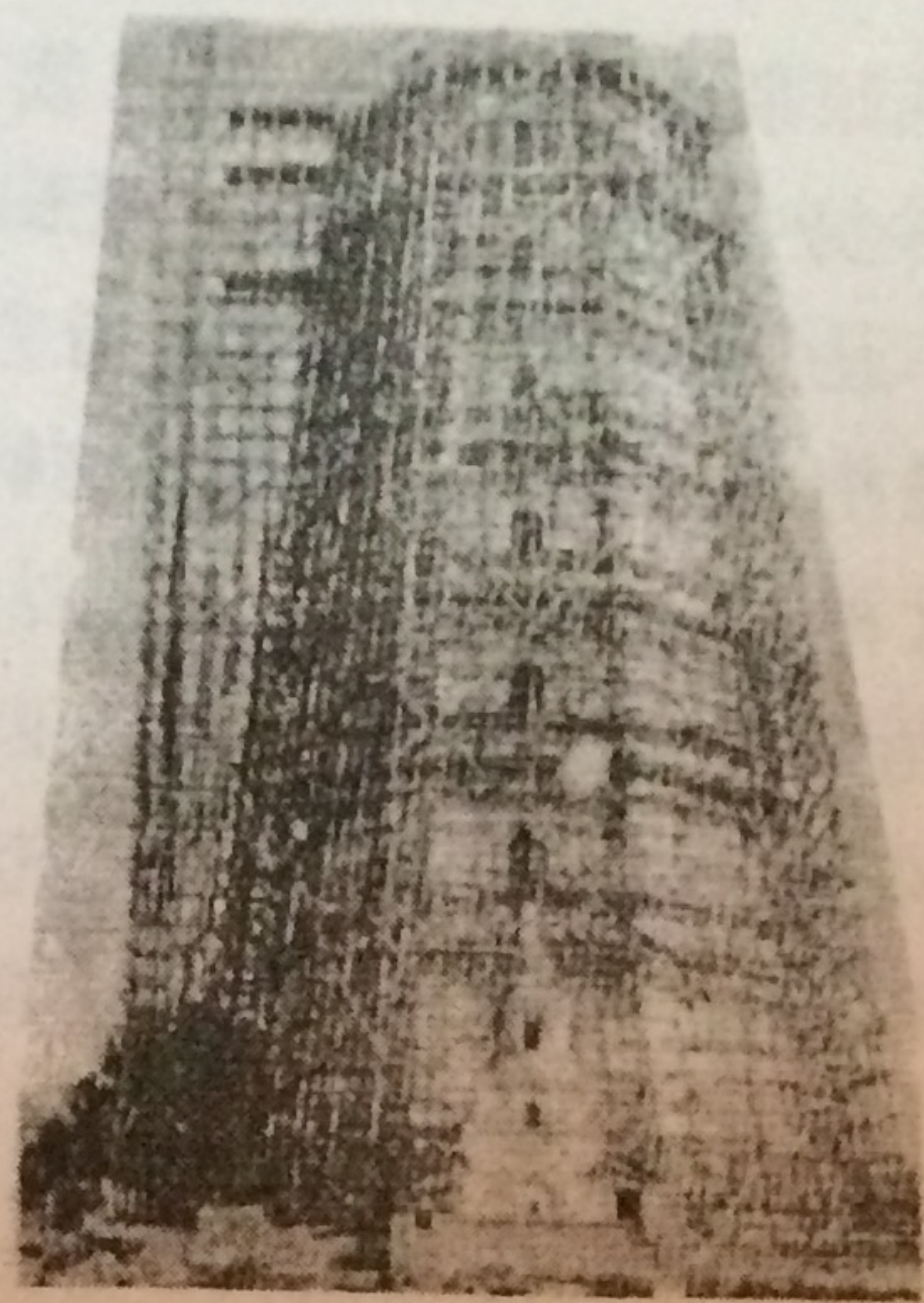
为中心的仿古的佛寺建筑。

为了弄清塔和寺的关系,为了做好对古塔的维修和对佛寺遗址的保护工作,甚至我还想在对古塔维修工作告竣后,有可能时再争取做好对古佛寺遗址的复建保护工作。因此,我们在维修古塔时,虽然对古塔的地宫和佛寺遗址,并未做发掘工作,只是对佛寺遗址做了一些踏查,由于在维修古塔的过程中,在塔刹中,发现了“建塔碑”等等文物,上述尘封千年的谜底,可谓昭然若揭。<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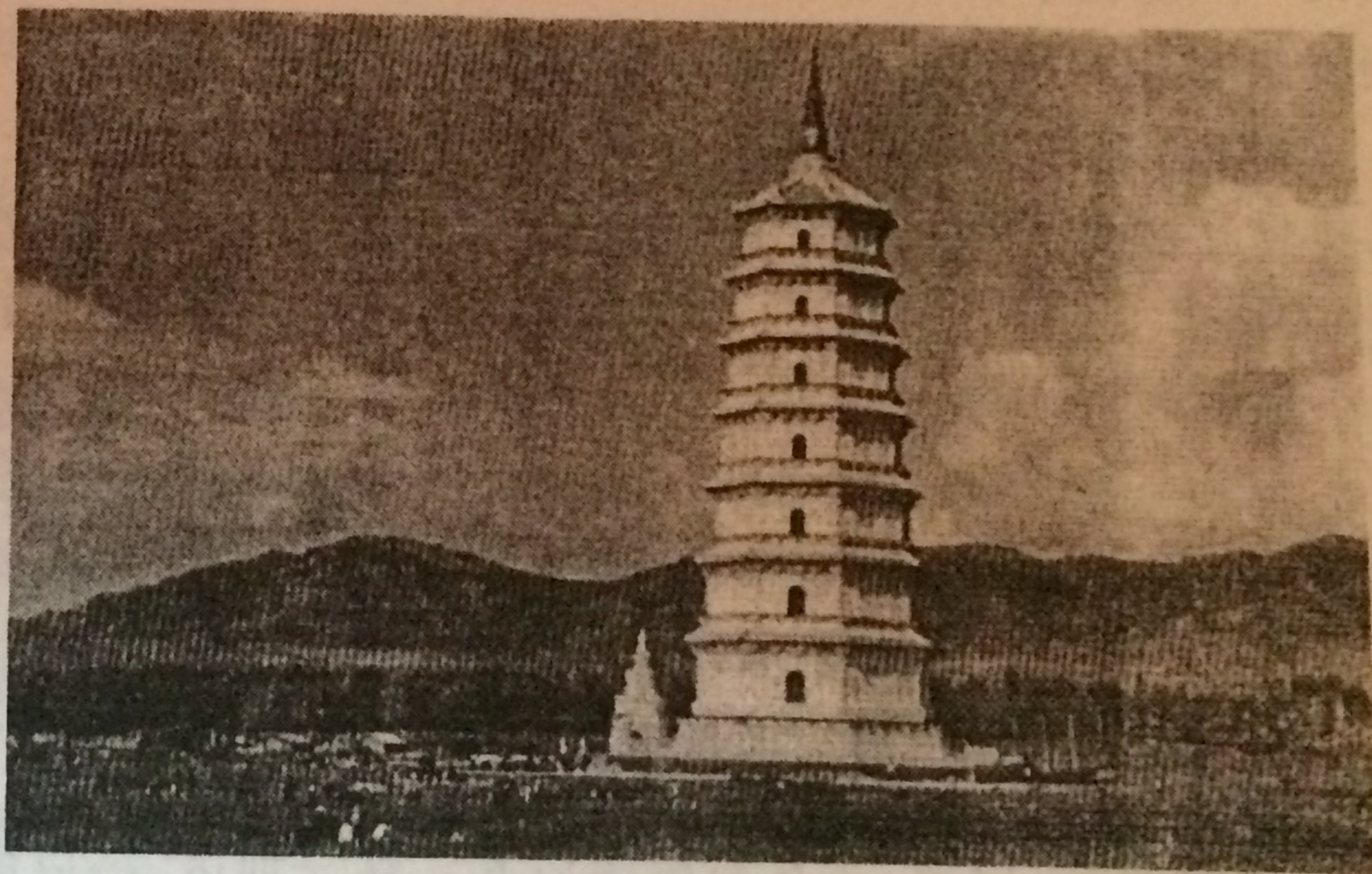
“塔在南北朝时期,是佛寺组群中的主要建筑。如北魏熙平元年(516年),在洛阳兴建的永宁寺,是由胡灵太后所建,前有寺门,门内建塔,塔后建佛寺。到了唐代,塔已不再是佛寺的中心建筑。佛寺的中心建筑,多以二或三层的楼阁建筑为中心”。<sup>②</sup>

这一前塔后殿的佛寺遗址,是有辽一代在其秋捺钵的要地上,或者说是在庆陵的奉陵邑中,兴建的皇家寺庙遗址。古塔虽不具备登高远眺的功能(而今塔心室间相通的洞口,均是人为的盗洞),但它是辽兴宗的生母“章圣皇太后特建”之塔,其品位之高实无与伦比。加之塔本身高耸挺拔的姿态,雪白圣洁的颜貌以及其富丽堂皇的装饰,映衬着碧绿如茵的草原,不仅使这一地区更加壮美,而且建塔者也格外地炫耀。(附:维修时和竣工后的两幅图版)

<sup>①</sup> 1994年《文物》第十二期中,刊发了以下两篇文章:A、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了辽代佛教文物。B、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营建历史及其物件。  
<sup>②</sup>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章寺和塔”。



维修过程中的辽庆州白塔



古塔重光

这一寺庙营建在城池中的上方右侧,这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右庙”的理念相合。城池中是否也有“左宗”所在。沈括在他到达道宗的夏捺钵所在地,即永安山的“顿程帐”,

临近“单于庭”时，亲眼所见中有如下的记载：“……中书密院客省，又东毡庐一旁，驻毡车六，前植蠹曰太庙。”<sup>①</sup>这里有两个关键词语，一是“东毡庐”，这里确指方位在东方；一是“毡车六”，这里确指的是东毡庐旁的“六辆车”。道宗在位时，除辽国的创世祖，太祖早已去世而外，先后又有六位皇帝去世，即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和兴宗。这些先祖们的灵位或者说是宗祠，并不同于农耕地区（文化），宗祠一定要建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首先要有能游动形式，随着游动的皇帝，行动的国家，岁无宁居，四时捺钵各有行在之所，当然在都城也兼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古城内东北隅的“小城”处，可见的建筑基址并不多。我以为这里很可能就是专门的宗祠庐车来此时，安置的地方。

“横向地带”以北“北区”的中间地区。这里建筑遗址，不仅规模庞大排列有序，其所在地平以及已呈废墟的建筑遗址，也较其东西两厢显见隆起；而且其西侧又有与寺庙间隔的隔墙遗址。这里当为秋捺钵时皇帝来此临幸，或有事要在此驻蹕办理的固定的建筑群遗址，即皇帝的行宫所在。在此建筑群的东侧偏北的近北城门处，又有一组规模不很大，但建筑址为东西南北对称的建筑遗址。我以为这里很可能就是“菽涂殿”或“游仙殿”等的建筑遗址。

“横向地带”以南，至左右横街以北。这一地区，再以南北向通道为界，暂且称为中西区和中东区。在中西区内，尚有一些建筑遗址仍可分辨。尤其是其中有一无论从进深还

① 《永乐大典》

是从面阔的角度去看，其面积之大非比一般，而且其建筑遗址是处在一个硕大的高台上。其中轴线，不仅与古塔南北在一条直线上；且建筑高台址的四周，又有深浅宽窄不一的人为建造的湖池迹象。此当为古城中一大型的宫殿遗址，即“大安殿”遗址。中东区内遭破坏较为严重，以往有的方家学者，认同这里也是一些佛寺和道观等的建筑群所在。如今从地表上观察已无法分辨；不过在此地区里，曾先后两次共发现三件，属辽代尊崇道教的文物。<sup>①</sup>同时在这里，还发现一块汉白玉质，上镌刻汉字欧体是为“陀罗尼”的残损经幢。该残经幢石，因在此屡遭破坏，1981年秋，已运往巴林右旗博物馆保存。当然该残经幢石，原先是否就在这个地方，今尚不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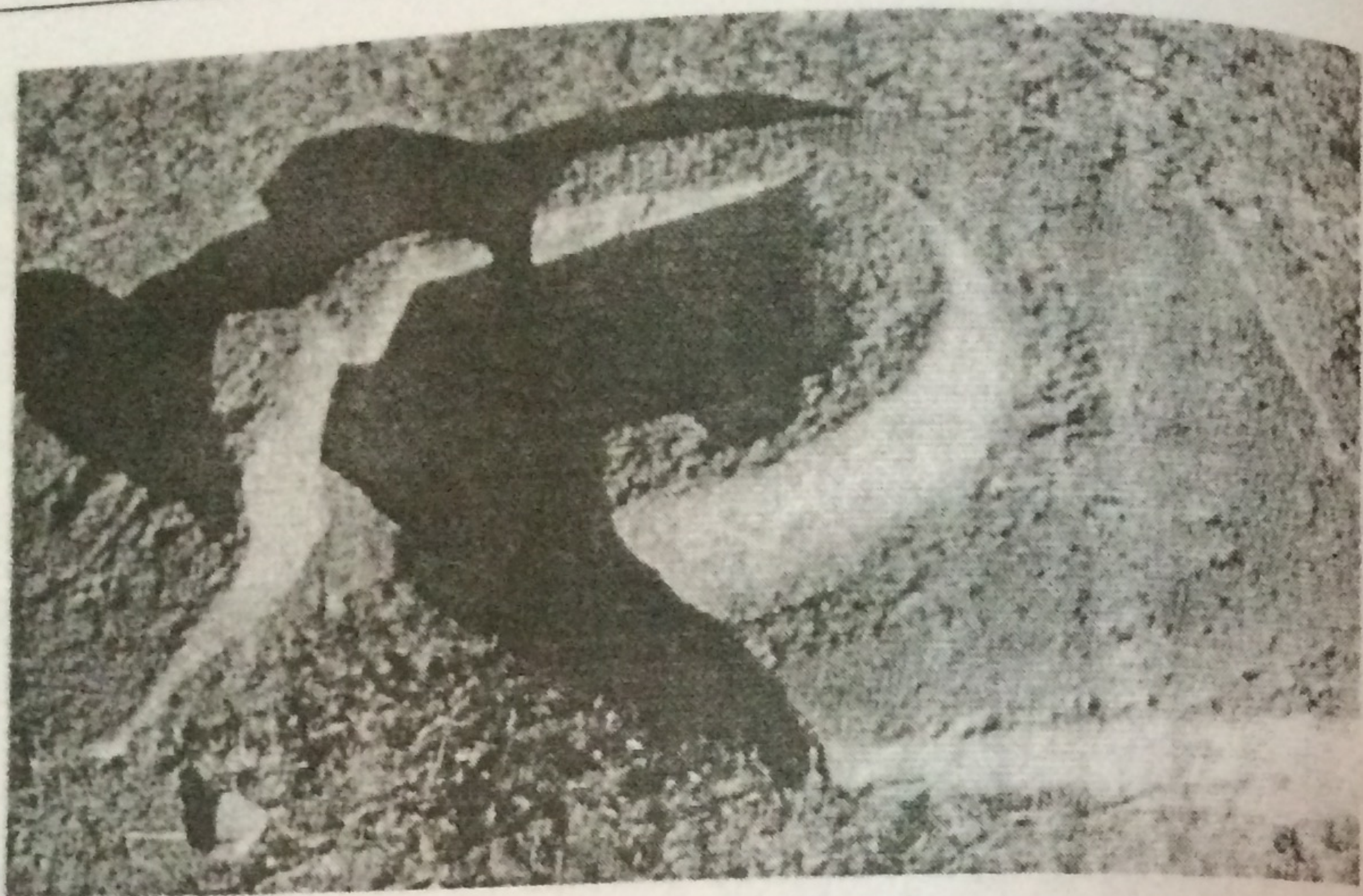
左右横街再往南，直至内城南城墙根，这里也暂称“西南区”和“东南区”。这里遭破坏更加严重，地表几乎见不到什么隆起的遗迹，或许这里原先就没什么大型建筑物。

在“西南区”里，有一些似遗址的地点，仔细观察早已无序。地表能见到陶瓷片既有限也极为细碎，偶而能见到应属辽代的加工粮食的石磨等器件，也为破损后的碎块。不过在西南区里，近南城墙的地表，有一板状的白色大理石构件。面积不为正方形，比一般井台较大，今已破损。此物件当为何物构件，原先是否就在此地，值得注意。

附图如下：

① 1958年出土一件八瓣菱花形铜镜，背面外圈分铸“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字，内铸花草纹，并铸有一“何”字。《内蒙古文物资料选集》。  
内蒙古巴林右旗出土辽代道教符篆铜牌和石印。《北方文物》1999年第二期。





在东南区的地表上未发现有什么建筑遗址,一些文化遗物也几乎不见。唯在其东南隅,有一似人工所为的大池塘,其周边未见有砖石等的修饰,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

外城至内城之间,虽均遭破坏殆尽,但是还是有一些遗物或遗迹。

如在北城区,该区地形为西高东低,在其西北角,尚有两处不很完整,但规模可观的建筑遗址。

西城区,在 1986 年时,曾在医院的院中,因大雨所致,发现一口塌陷的井壁用块石垒砌的古井,当即已做填埋处理。

南城区,因地势平坦,早已辟为耕地,再加河水的冲淤,未发现什么遗迹。

东城区,虽早已辟为耕地,但在地中或者地头,均可见一些辽宋时期常见的陶瓷碎片,残砖乱瓦在此并不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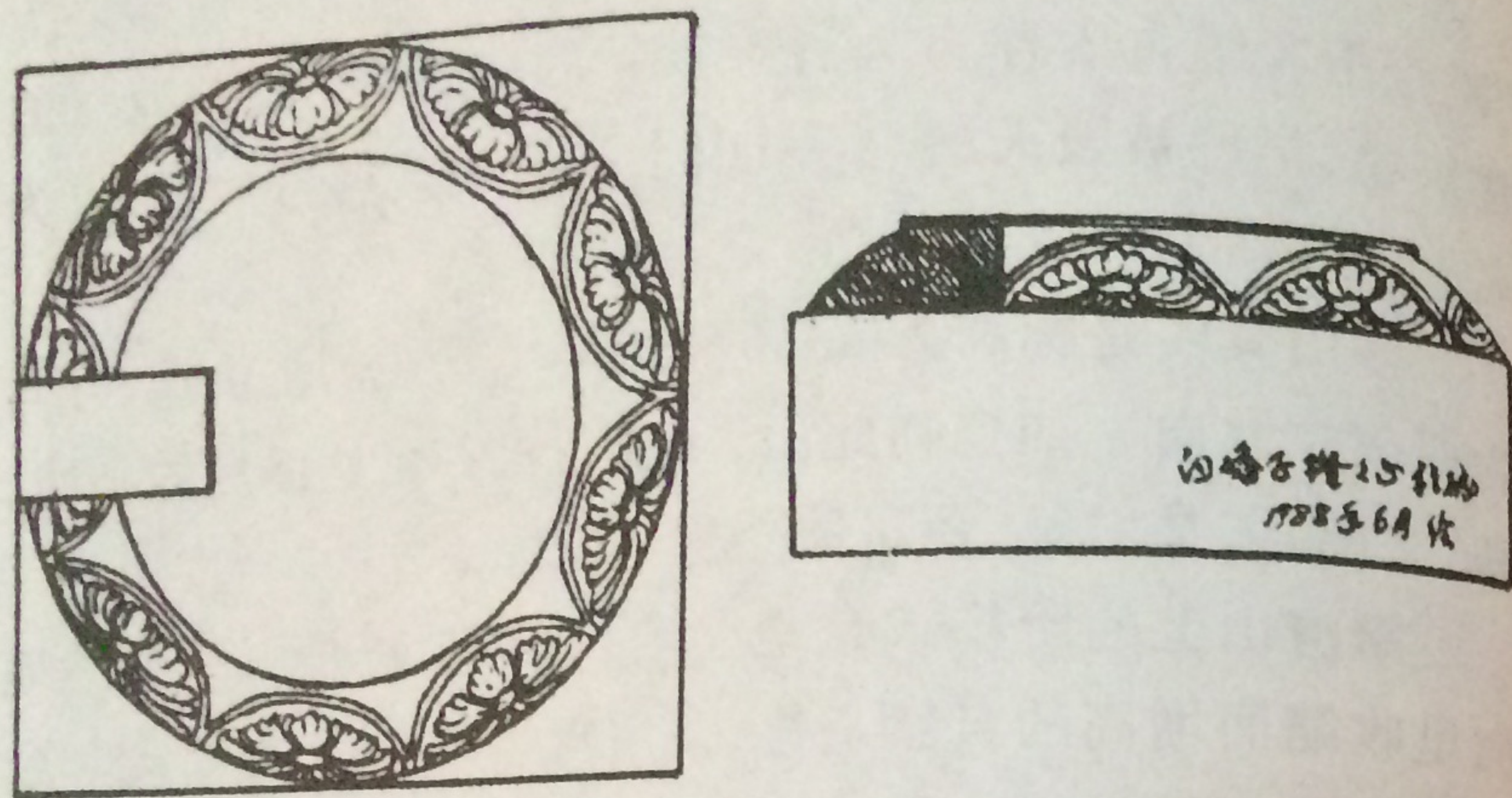
### (三)古城外的附属建筑

在古城之外,北小西的 2.5 公里处,有一群众称之为“蹬蹬山”,蒙古语称为“意德尔图”的山。其山坡前原有的建筑物,早已被毁灭,今只剩山上有阶梯式的台地,因以为名。

该山其实是标高为 1316 米的毕图乌拉东山嘴,方向为西南东北向。如登临此山,不仅可见亦可达山后的小城,即“玄德县”县城址,还可眺望“庆陵”。

蹬蹬山上的阶梯式台地是自山根起,顺着山体渐进地向里收缩而增高的自然走势,采用自然形石块,先垒砌起台地垂直的直壁墙体。然后再通过摊掘山坡的土石加以填充整平;并以此类推向上砌筑。每层台地垂直墙的高度为 2-2.5 米,共为五层。因山势收缩度的多变,台地最宽处为 63 米,最长者为 114 米;中间最窄者也有 30 米。台阶之间,在两侧均设有人行“踏步”,便于上下行走。台地的西边为大山体,贴山开拓为平台。东边临近沟壑,用块石垒砌出石墙。墙外有一条不很醒目的小道,可以循路上山。

台地上的建筑遗址,今已无从辨认;每层上均不见有高出地平的杂土堆等现象。不过每层的地表,均有一些散碎的饰以绿釉的和陶质素灰色的瓦饰残片。只在第四层的台地上,发现一方花岗岩质,牡丹花纹柱础。柱础石为方形,边长近 91 公分,厚约 40 公分。柱础石的上面,正中为一圆形的鼓镜平面。鼓镜直径为 64 公分,圆形外圈刻饰一周单方连续的牡丹浮雕花纹。此外,柱础石上面的一侧,自右边起,至圆形刻饰图案约四分之一处,凿刻出一条长方体的凹槽。(附:柱础石线图)



该遗址上,有一口水井。我初次调查时曾亲眼所见,只因当时未做笔录,今时间长久忘却是在第二层还是在第三层。后来调查时没有发现,或许是有人采取了封盖措施,以免牲畜落井受害。

这里发现的瓦饰残片,与古城中所见的瓦饰构件,完全一致。这组建筑与索博日嘎古城中的建筑应同为一个时段,当属古城所辖的附属建筑。这是一处什么建筑物,为什么要建在这里,今尚不得而知。是否为“七括宫”? 圣宗元妃,自立为皇太后,号为法天。摄政后,结党营私,残害忠良。重熙三年(1034年),兴宗收回太后符玺,将其迁于庆州七括宫<sup>①</sup>,今且存此说。

此外,在古城外西侧3公里的“水泉沟”地带,发现有大面积的烧制砖瓦的窑址群,其时代与营建古城中的建筑群,

<sup>①</sup> 《辽史·列传一·后记》

应为同步。我们在1989年维修古塔时,对这里的土质做了认真地调查,因发现其可开发利用土质的地段几乎殆尽,只好选土质与此地相同的地点,即距水泉沟东北约8公里的“巴根吐”,建窑烧造青砖。

#### (四)“庆州条”中应讨论的问题

索博日嘎古城址,是有辽一代的庆州城城址,这是多年来同仁们已考证的共识。然而因为《辽史》的粗简,至今仍有许多方面的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考证和解决。尤其是《辽史》在“庆州条”中的似是而非的载录,以及一些本应见载的内容,反而阙如。这对进一步考证庆州城的规制及其建设始末进一步研究它特有的文化积淀,更为复杂也更加艰难。

《辽史》载:“庆州,玄宁军,上、节度。本太保山黑河之地、严谷险峻。穆宗建城,号黑河州,每岁出幸,射虎障鹰,军国之事多委大臣;后遇弑于此。以地苦寒,统和八年(990年),州废。圣宗秋畋,爱其奇秀,建号庆州。辽国五代祖勃突,貌异常,有武略力敌百人,众推为王。生于勃突山,因其名,没,葬山下,在州二百里。庆云山,本黑岭也。圣宗驻蹕,爱羨曰:“吾万岁后,当葬此。”兴宗遵命,建永庆陵。有望仙殿、御容殿。置蕃、汉守陵三千户,并隶大内都总管司。在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老翁岭、馒头山、兴国湖、辖失泺、黑河。景福元年(1031年)复置,更隶兴圣宫统县三<sup>①</sup>,其中“孝安县”条,只此三字,别无任何注释。

<sup>①</sup> 《辽史·地理志一》444页。

上述“庆州条”的记载中,有两个问题,首先应加以讨论。

一是,庆州城的营建问题。

庆州城的营建,是在圣宗去世(太平十一年六月崩,十一月安葬庆陵)时,在营造庆陵的同时,因一定得有奉陵邑,所以才开始营建。其时兴宗即位,将太平十一年(1031年)改为景福元年。“以观察姚居信为上将军。建庆州于庆陵之南,徙民实之,充奉陵邑。”<sup>①</sup>庆州城,是始建于景福元年(1031年),由上将军姚居信负责,位在庆陵之南。

庆州城,绝不是 在穆宗所建的黑河州的废址上,经圣宗发愿,于景福元年“复建”。

甲,在庆州城的城墙夯土中,从未发现有任何早晚时段文化的夹杂物。就是在城内,除发现东北隅的金代小城,存在着叠压和打破地层关系的现象,此外,再未有其他的发现。

乙,穆宗所建的黑河州,虽为废城但遗址仍在,并不曾改为他用。庆州与黑河州两城间的直线距离为7公里。此黑河州,笔者将另文考述。

丙,圣宗秋畋,爱其奇秀,建号庆州。这段话语似有偏颇。圣宗朝曾有过两次“增置”和“分置”地县的举措。一次是统和八年(990年),一次是在开泰二年(1013年)<sup>②</sup>,这些均有记载。唯不见有“建号庆州”的载录。此外,圣宗朝统和八年,因“以地苦寒”而废。还是在圣宗朝又以地“奇秀”,

<sup>①</sup> 《辽史·本纪兴宗一》212页。

<sup>②</sup> 《辽史·本纪兴宗四、六》140页、173页。

要在这里建庆州。我以为,这段话语纯属《辽史》的作者们,是为自己设计的“在黑河州的废址上,复建庆州”的虚构在做托词。圣宗爱羨奇秀,是指“庆云山”,并不是“黑河州”。

二是,辽国五代祖勃突王的传略,为什么要在“庆州条”中出现的问题。

“庆州条”中,出现勃突王的记载,其一用意不明,其二“在州二百里”中,又缺少方位词语。如同方家们的考识,应为“在州南二百里”。不过这又和建庆州城有什么关系,令人费解。

如果说庆州与勃突王没关系,而黑河州与勃突王有着什么关系,只是《辽史》中未有明确记载。《辽史》的作者们,在编撰此条时,在黑河州的记述之后,把勃突王的内容,用浓重的一笔写进去。我以为,其时的作者们,手中尚未掌握足够的牒记,但是一些重要的材料或重要的耳闻依然存在。所以,既没在《辽史》中单列条款论述另一个黑河州,又不忍将五代祖的重要材料凭空舍弃,这样就有如此蹊跷又费解的一笔。

在有辽一代,尤其是在契丹腹地,有的州城并没完全收归国家。所以当沈括出使辽国时,在渡过潢水石桥后又从保和馆北上,路见一城址为“黑河州”。其时是道宗大康元年(1075年)，“塼瓦屋相半,筑垣周之”。<sup>①</sup>《辽史》作者们的用意是否与此有关,不得而知;只是勃突王与庆州城的营建,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sup>①</sup> 笔者已在“友爱古遗址”一文中,介绍了该黑河州的情况。

## (五)“庆州条”中应纠正的问题

我以为,“庆州条”中,还有一些不实之处,亦应加以纠正。

如“庆州条”在表述庆州城的地望时,用“严谷险峻”来定位。其实庆州城是营建在坦平而开阔的冲积平原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严谷”,当然也就没有“险峻”。只有穆宗所建的黑河州,才有这一特征,因它是营建在靠近大山的山间谷地之上。说庆州城的地望为“严谷险峻”,应加以纠正。

再如“庆州条”为论证庆州城的方位,用了许多的山名、湖水,但是均定位在“州西二十里”。当然其中有一些山名,至今尚不能确指,但就黑河、黑山、赤山等等均不在州西,也应予以纠正。

黑河,我已在前文,将其源头和流向大体说清,在此不再赘述,无论黑河的源头还是流向,均和“州西二十里”没丝毫瓜葛。

黑山,《辽史》中多有记载:“黑山在庆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莲”<sup>①</sup>。这一记载,两地间的距离基本正确,但方向仍然不对,只是把西方又错改为北方。为什么一处“非祭不敢近山,国人谓之魂魄”的祖山,《辽史》的作者们,竟然连方位都定不准,这里似可窥见其作者在编撰时的苦衷。《辽史》载:“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称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

① 《辽史·营卫志中》

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sup>①</sup>这里所指的黑山,就是如今巴林右旗境内的“赛汗罕乌拉”。其标高为1951米的主峰,西小北距庆州古城的正中心,直线为17公里。如从古城的内城东城墙算起,直线东距黑山的山脚,约为7公里。

为考证和确指黑山的位置,1981年,我们在黑山前的“黄花沟”,发现一通已被倒损的辽碑,因残碑在此地仍要继续遭受破坏,同年秋天,已搬运回旗文物馆保存。<sup>②</sup>1983年,对石碑所在地的遗址,又进行了650平方米,分四座建筑遗址的正式发掘工作,进一步确认石碑所在处,是一处辽代的大型祭祀活动遗址。<sup>③</sup>其间,也弄清了黑山(赛汗罕乌拉)突兀坦平的山顶,有两处湖泊,面积约为1000多平方米,是因冰川运动而形成的冰融凹地。夏秋之季,在湖泊的周边,多有属毛茛科的旱金莲黄光闪烁。

关于“赤山”。也不在“州西二十里”。《辽史》中有如下的记载:穆宗应历十二年秋,如黑山、赤山射鹿。应历十七年九月,猎于黑山、赤山至月终。圣宗朝,太平三年七月,赐緬山名曰,永安山。是月猎赤山。<sup>④</sup>由此可知,黑山与赤山间的距离不会很远。

如今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境内的北端略偏东的边境处,有一段东西长约12公里的大兴安岭山脉,其中有三处山峰的名称,分别为乌兰坝、乌兰坝敖包、乌兰绍荣。这一组冠以“乌兰”头衔的山脉,又是在索博日嘎苏木境内的大

① 《辽史·礼志吕》

② 黑山辽碑发现记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集。

③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年》

④ 《辽史·本纪穆宗·圣宗七》77、85、192页。

山,我认为这就是辽代的赤山。赤山在庆州城东北约 26 公里,南距黑山约 15 公里。

从巴林右旗的乌兰坝开始,沿着大兴安岭山脉的走向,再往东北约 60 公里,即巴林左旗的浩尔吐乡的西北,约 30 公里处,也有一座山峰称为乌兰坝。它位在巴林左旗的近东北端并与阿鲁科尔沁旗搭边,这一绵亘在巴林左、右二旗的北端和阿旗西北隅的,冠以“乌兰”名称的山脉,是否就是乌桓退居时的“赤山”,即公元前 200 年,东胡被匈奴打败后,其东胡联盟中的部族之一,乌桓族退居在此。

辽代的赤山,并不能说就完全代表了乌桓的赤山,但是它与乌桓的赤山,应有某些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乌桓是因山而名还是因名而山。但就《魏书》中记述乌桓族的丧葬仪式时,是这样。乌桓人死后,其亲属要“肥养一犬,以彩绳纓牵,并取死者所乘之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意即托付于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中原人)死者魂神归岱山(泰山)也。”这与其后,在此地勃兴起来并建立国家政权的契丹族,丧葬和祭祀黑山的活动,全然一脉相承。可否这样认识,乌桓族虽然自汉武帝时就开始南迁,到了曹魏时期已步入中原。但是这并不能说乌桓族已全部南迁或全部迁至中原。随着乌桓族的南迁和鲜卑族的向南接踵推进,原来留在退居时居住地的乌桓人,很自然地要融合和演变成为鲜卑人。所以契丹族,虽然说自己的先民为鲜卑,但其丧葬与祭山仪式中,确承袭了乌桓族的礼仪。至于辽代的黑山,当乌桓族退居在此时,是否也包括在赤山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耐人

寻味和有待探考的问题,不过我以为大有可能。

#### (六)古城与山陵的情况

《辽史》在记载庆州与庆陵的情况时,除在“庆州条”中阐明了庆州是庆陵的奉陵邑,位在庆陵之南而外,尚有如下记载:

甲,“太平十一年即景福元年(1031年)六月圣宗崩,兴宗遵照圣宗的发愿,十一月葬圣宗于庆陵,名其山曰,庆云山。”<sup>①</sup>

乙,“重熙二十四年即清宁元年(1055年)八月兴宗崩,道宗择地十月葬兴宗于庆陵,名其山曰,永兴。”<sup>②</sup>

丙,“寿隆七年即乾统元年(1101年)五月道宗崩,六月天祚帝过长福岗葬道宗于庆陵。”<sup>③</sup>

上述记载,虽已说明庆陵是自圣宗始又经有兴宗和道宗三位皇帝及其后妃的陵园的总称。但具体在庆州城的方位以及三陵的序次等等,均未明载。

由于圣宗、兴宗和道宗,三位皇帝在位长达 118 年,经历了辽代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段,又是专为这三位皇帝而营建的庆州与庆陵,很自然的分外惹人关注;也令居心叵测的人倍加觊觎。因为庆陵不仅毁于女真灭辽时的兵燹,而且又几经遭受中外人士的盗掘和掠夺性的破坏。地上的建筑等文物,早已变为废墟,地下的墓葬布局、构筑装饰以及殉葬物品等等,也已被破坏殆尽和被洗劫一空。上述惨

① 《辽史·本纪兴宗一》212 页。

② 《辽史·本纪道宗一一》252 页。

③ 《辽史·本纪天祚皇帝一》318 页。

剧,以往已有一些文章加以发表或刊布。如日本人:村田治郎和岛田正郎的《庆陵》一书。鸟居龙藏的《从考古学上所看到的辽代文化图谱》。法国人天主教神甫牟里(闵宣化)的《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等等。因为在许多珍贵文物被盗运出国的同时,也有一些弥足珍贵的文物,因某种原因未能如期盗运出境,而流落他乡,如契丹文石刻哀册就流落至沈阳。为此国人罗福颐先生,曾用宏论《契丹国书管窥》不仅研究了哀册,而且也公布了这批不可多得的文物的来龙去脉。<sup>①</sup>

笔者在此,仅就庆陵陵区的概况以及庆陵与庆州间的距离方位做一点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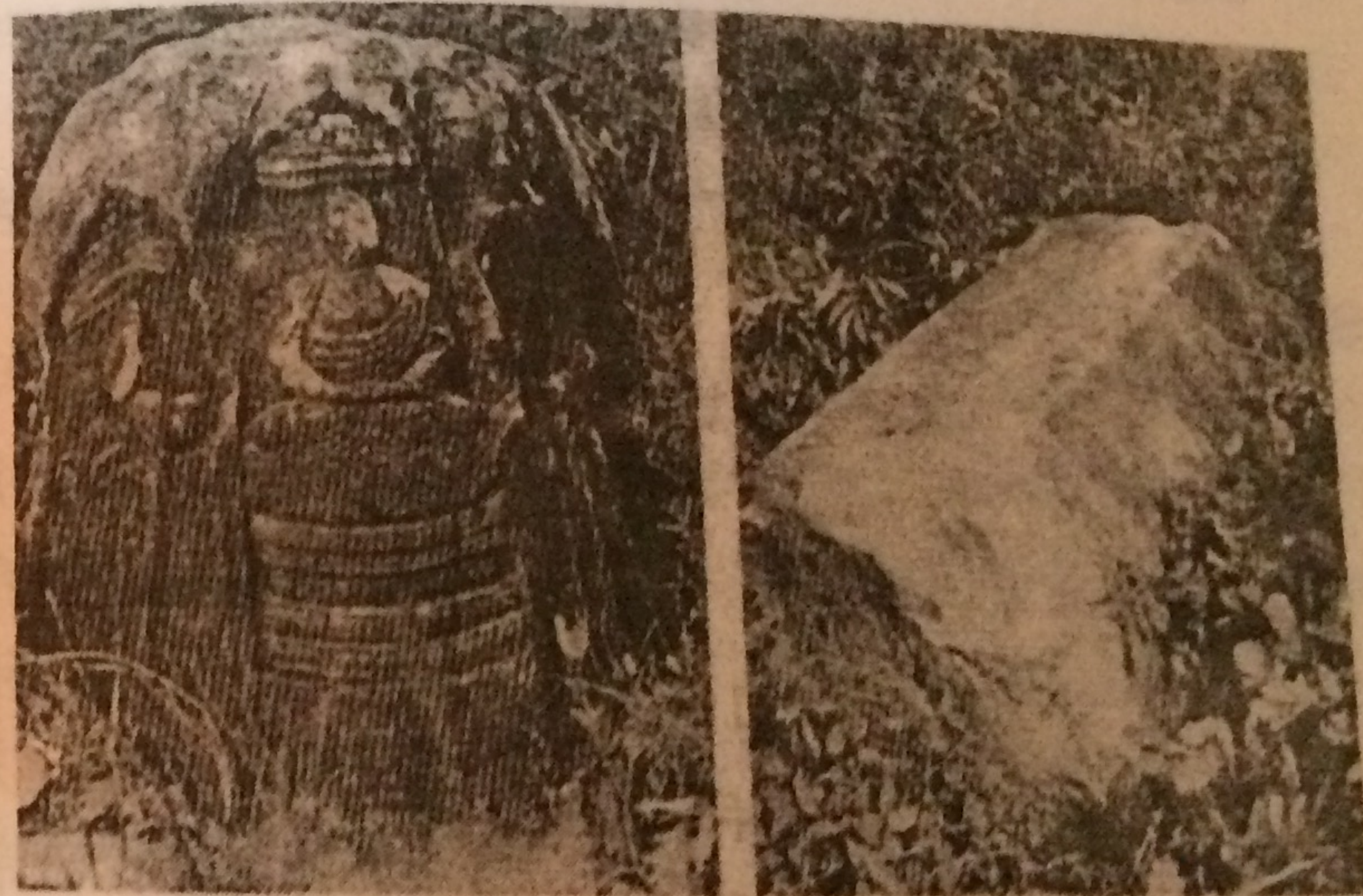
庆陵,东南距庆州城直线为12公里。如沿着道路从陵区的门户出入,二者的间距为14公里。整个陵区,除东南方的山谷川口,未被大山绕隔堵塞,有一段由两个山峦相距约400米的敞口,为陵区的门户外,其余方位均由大山自然环抱。椭圆形的陵区,南北宽近4公里,东西长约6.5公里。清澈见底的王坟沟河,在陵区的中略偏南部的山谷川地上,为由西向东的流向。

庆陵的方向,随大山的走向为东南向。三组陵墓,均葬在同一座大山“瓦林辉特乌拉”的山腰、坡顶的山腰中。该山为大兴安岭山脉,主脉中的近乎独立的一段大山,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5公里。圣宗的永庆陵,就在该山的近正中。陵墓背靠的山峰,峰顶上有高耸而硕大的山石崖,

<sup>①</sup> 《辽史汇编·第八册》75-624页。

峰标高为1755米。兴宗的永兴陵,在庆陵的东端,陵墓背靠的大山上,仍有较大的独立峰顶。道宗的永福陵,在庆陵的西端,山上也有独立的峰顶。

三组陵墓的营建,均为依山就势,在坡顶处的山腰中建造寝宫。隆起在寝宫前山坡上的山梁或山岗为神道,在其上建筑殿宇门阙。陵墓之间,因有天然的山涧以隔,所以泾渭分明。其中,尤其是圣宗永庆陵的神道,其神道近前端的两旁,各有一天成的孤峰山峦,成为绝佳的神门。今其上,仍有大量的饰以绿釉的砖瓦的构件残块。其神道旁尚有两座侧卧而残损的汉白玉佛幢和经幢器件。(附图版如下)



庆陵所在的大山“瓦林辉特乌拉”,其东端与平顶山和鸭子河大山相连,只是在相连的两山之间有山谷和小溪以分;同时鸭子河山,还有一西北东南走向的山峰,横挡在陵

山之东。该山的前端,即标高为 1266.7 米的鸭子河高山,亦即陵区门户的北端。陵山的西端;相连的大山为希拉哈达,这两山间亦为山谷和小溪以分;且希拉哈达为西北东南走向,它又挡在陵山之西。这一东一西,同一走向的山峰,挡在陵山的两侧,使整个陵山呈宽敞的椅靠之形。

希拉哈达往西南,相连的山峰有葱根图乌拉和哈达巴山,再往南又有石匠山相连。石匠山有一山峰为由西南向东北的走向,该山的前端,即标高为 1278.5 米的哈日呼舒,亦即陵区门户的南端。

庆陵所在的“瓦林辉特乌拉”,就是《辽史》中所说的“庆云山”。“瓦林辉特乌拉”,是蒙古语,意即有砖瓦的山,与“庆云”语意无关。

此外,庆陵东南距金界壕为 7 公里,金界壕南距庆州古城址为 5 公里。

### (七)尾语

索博日嘎苏木的索博日嘎古城址,是辽代上京道的庆州城城址。它自景福元年(1031 年)始建,历经兴宗皇帝在位的 25 年,道宗皇帝在位的 46 年以及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 年)为下限〕的 12 年,共为 83 年的发展和建设。庆州做为有辽一代的秋捺钵要地和辽代全盛时期的三个皇帝及后妃陵园的奉陵邑,肯定会是非比一般。大科学家沈括,从庆州城东路过时,有如下的记载:“道西一里许,庆州塔庙廛庐,略以燕中。”<sup>①</sup>此时庆州城才创建 44 年,即景福元年

<sup>①</sup> 《永乐大典》

(1031 年)到大康元年(1075 年)。

《辽史》中,未有如何建设庆城的记载,但是就《本纪》和《游幸表》中,所记述的诸皇帝如庆州的一些举动,似可窥见庆州城在不断变化的端倪。

如兴宗“重熙十六年(1047 年),六月清暑永安山,七月幸庆州。自是至九月”。“重熙十九年(1050 年)六月幸庆州,谒大安殿,御金鸾殿试进士”。“重熙二十一年(1052 年)七月,观市幸圣济寺”<sup>①</sup>。

道宗“清宁六年(1060 年)五月清暑拖古烈,六月御永安殿放进士赵廷睦等百三十八人。”大康十年(1084 年),冬十二月,改庆州大安军曰兴平。<sup>②</sup>

天祚皇帝“天庆四年(1114 年),八月,如庆州射鹿于秋山。”<sup>③</sup>

此外,我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维修庆州白塔时,在“天宫”中发现的“建塔碑”,明确记载“释迦佛舍利塔”是重熙十八年(1049 年)建成。同时,在塔门券壁内发现的墨书题记,“乾统五年,灵德寺习经沙门德崇,共梁秀才、曹秀才上来。”<sup>④</sup> 此类墨书,不仅说明庆州城的建筑物,此时仍在养护维修,而且也表明了,当时的士子们,只有来此参加皇帝的御试,才能实现平生的夙愿。

辽代御试进士,始于兴宗朝的重熙五年(1036 年)。此后,因皇帝的秋捺钵,基本上是在怀、庆二州处的秋山。所

<sup>①</sup> 《辽史·本纪兴宗三及游幸表》237、241、1069 页。

<sup>②</sup> 《辽史·本纪道宗二、四》269、290 页。

<sup>③</sup> 《辽史·游幸表》、《本纪 328 页》为“七月。”

<sup>④</sup>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 年二期。释迦佛舍利塔历次修葺概述。

以,先是在怀州西山上的清凉殿中进行御试,后来随着庆州的营建,皇帝也多如庆州临幸,因而又在庆州进行御试。“墨记”中的梁、曹二秀才,应是来此参加御试时,恰逢大塔维修,因而才有些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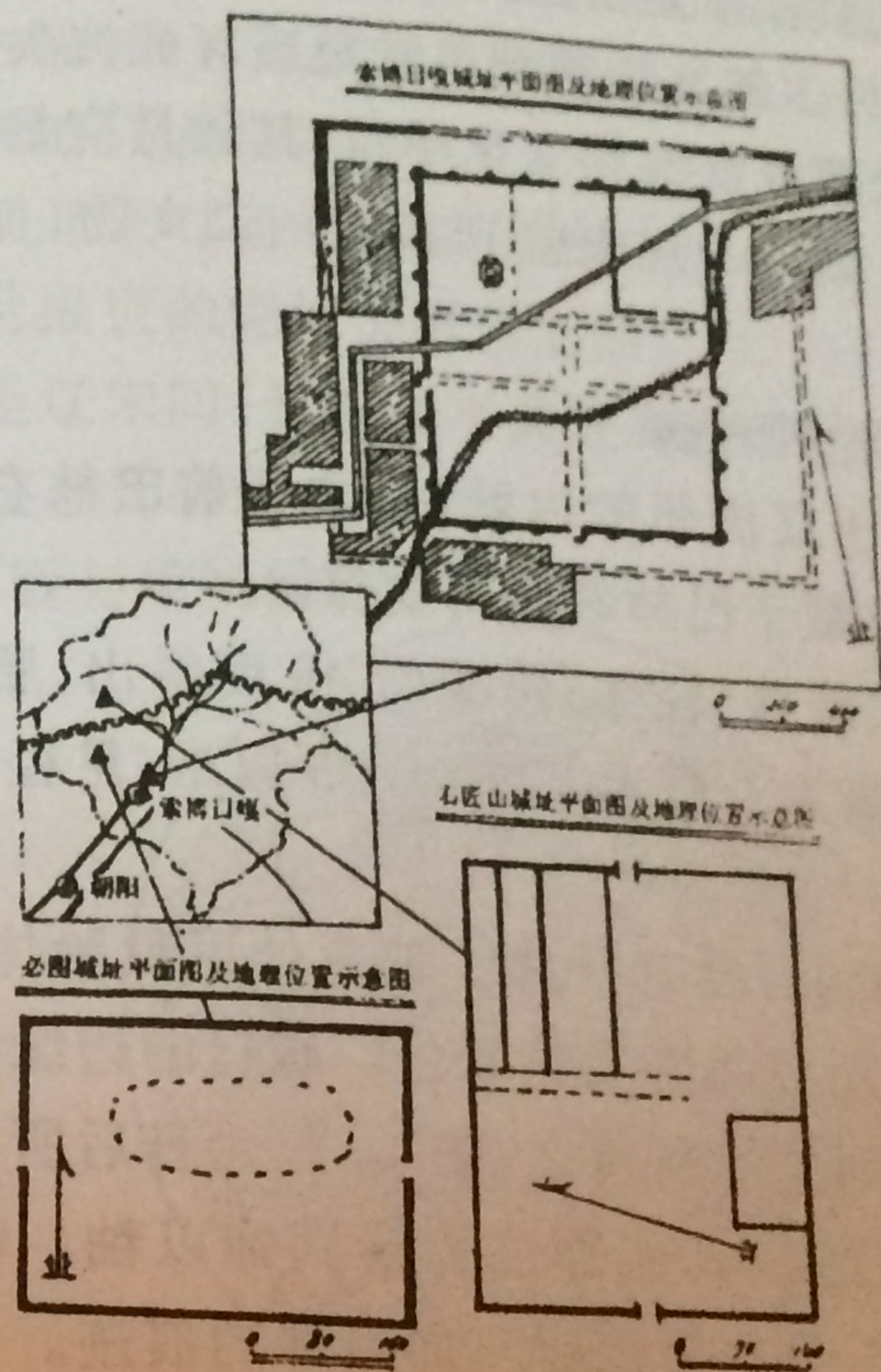
随着辽代社会,自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年)始,外侵内乱,国势日下,甬说庆州城的建设,就连皇帝本身都自顾不暇。所以盛极一时的庆州城,至此开始衰败。

如:“天庆五年(1115年)二月饶州渤海古欲等反,自称大王。”<sup>①</sup> 同年“九月,耶律章奴反,率麾下掠庆、饶、怀、祖等州,结渤海群盗,众至数万,趋广平淀犯行宫。”<sup>②</sup> “天庆九年(1119年)夏,金国攻陷上京路,祖州、怀州、庆州等诸殿并陵堂,焚烧掠尽,发掘金银珠玉。”<sup>③</sup> “天庆十年(1120年)五月金主亲攻上京,克外郭,留守挾不也率众出降。”<sup>④</sup>

此时,辽国虽尚未亡国,但庆州城,经残酷的兵燹和匪患,已渐渐地被夷为一片废墟。

附:索博日嘎城址平面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① 《辽史·本纪天祚帝二》333页。  
② 《辽史·本纪天祚帝二》336页。  
③ 《契丹国志》卷十一。  
④ 《辽史·本纪天祚帝二》339页。



(八)附录:文物图说

辽庆州古城中,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苏木政府、学校、粮站、供销社等企事业单位及机关,先后兴工动土设置在城里。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大炼钢铁之风,在这里也刮了起来。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但是散见或是埋藏在建筑遗址中的绿釉瓦饰等残好件,就变成了“耐火材料”,人们便不择手段地去攫取。其后,又在城内挖沟开渠,引河水从城内自东北向西南通过,为浇灌城外的



农田。此时,这里的文化层,就又一次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期间,有许多的文物遭到愚昧地破坏或流失。后来,虽然有一些被收藏或征集到文化单位,其数量应是微乎其微。我这里仅选入藏后一直未曾刊布的一二文物,加以图说如下。

1、酱釉莲池四鱼碗

该碗出土于辽庆州的内城,为文革前巴林右旗文化馆的旧藏,而今收藏于巴林右旗博物馆。

碗为圆唇、薄壁、轻体,碗身做45度斜出,胎骨在纯白中闪黄。碗通高为6厘米,口径16.5厘米,足径5.6厘米,壁厚0.2厘米。

釉质晶莹柔润,没有开片。釉薄处可见胎体上的旋轮痕迹,积釉处有泪痕并隐现黄绿色。碗口的边缘处,未做釉饰为“紫口”,即覆烧时所留之“芒”。是为日后所拥有者,镶嵌贵金属边缘之处。其他部位皆余满饰以釉。釉为酱色,酱色中闪现红斑,并有覆烧时流向足部的痕迹。

碗的外壁,光素无纹。碗内,在口沿稍下,施有两道与口沿平行的印弦纹。其下,饰以工整素雅的印莲鱼主体纹,并饰以辅纹压印水波纹。印纹线条流畅,纤细柔和,绝大部分显现为凸起的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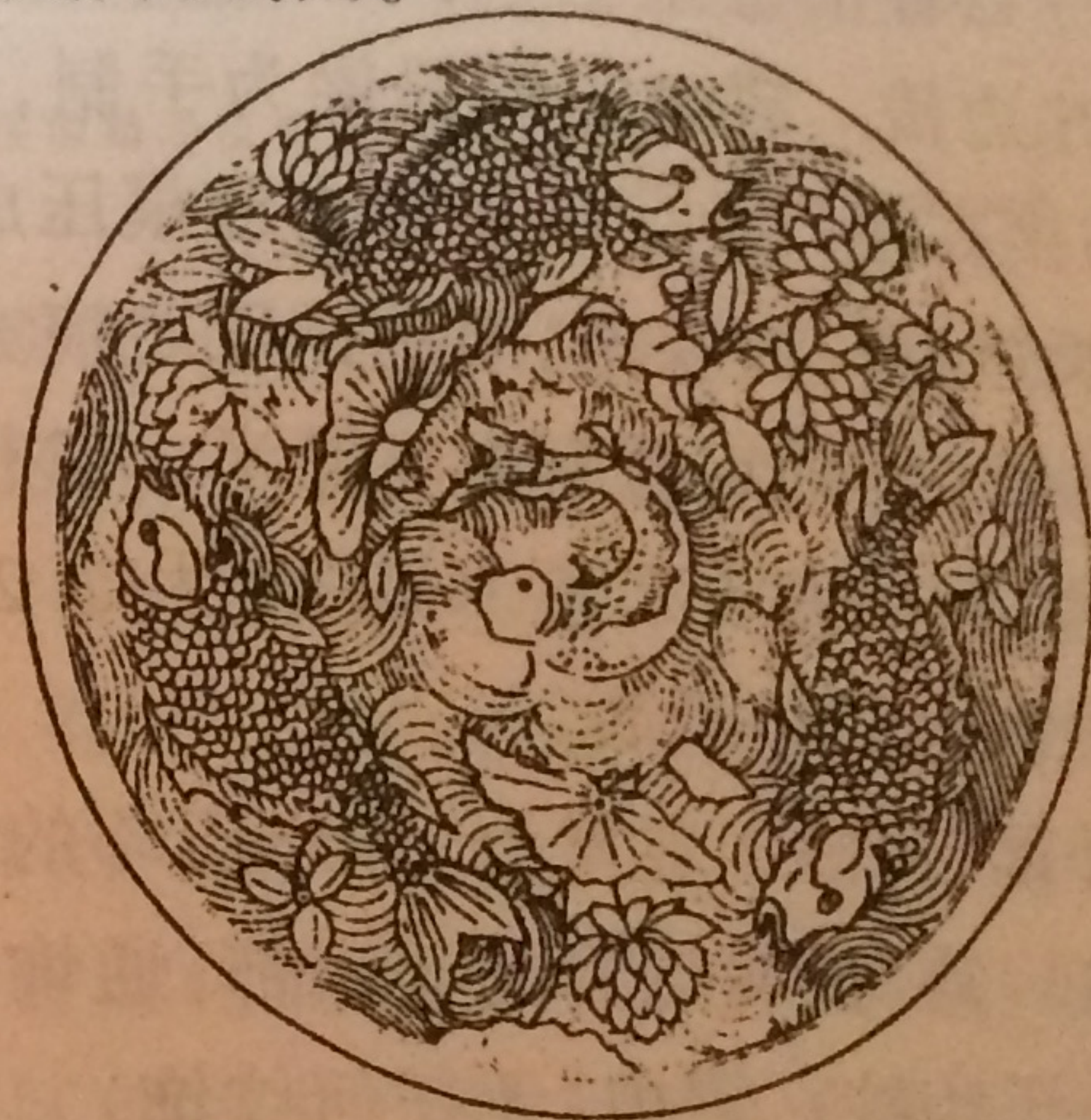
整幅图案为:盛开的莲花,翻卷的荷叶,蔓茎相绕;又有三叶三花似互生于莲茎,间以飘荡的浮萍;在翻滚的水波中,莲鱼相融,三鱼溯水而上顺向嬉戏,在波浪中莲花下游弋;一鱼潜入水底,悠闲的在荷莲下碧波中静息。图案布局充实,层次分明,密而不乱,静中有动。

此碗,无论是造型还是饰釉,无论是图案的设计还是入窑烧制的方法,均可见寓意有佳和颇具匠心,实为中国陶瓷业高度发展的代表之作。

此碗是北宋时期的名窑,定窑中的名品“紫定”;是紫定系列中仅见报道的完好的稀世之品。

此碗是辽宋间,长期和平共处和友好往来的写实之果,是永世不应忘怀的纪念之品。

附:图版与俯视线图。



紫定、莲池四鱼碗俯视图



## 2、柳罐形摆件

柳罐形摆件,出土于辽庆州城内。1990年4月4日,巴林右旗大板一中的那森老师,无偿的将该器件,献给巴林右旗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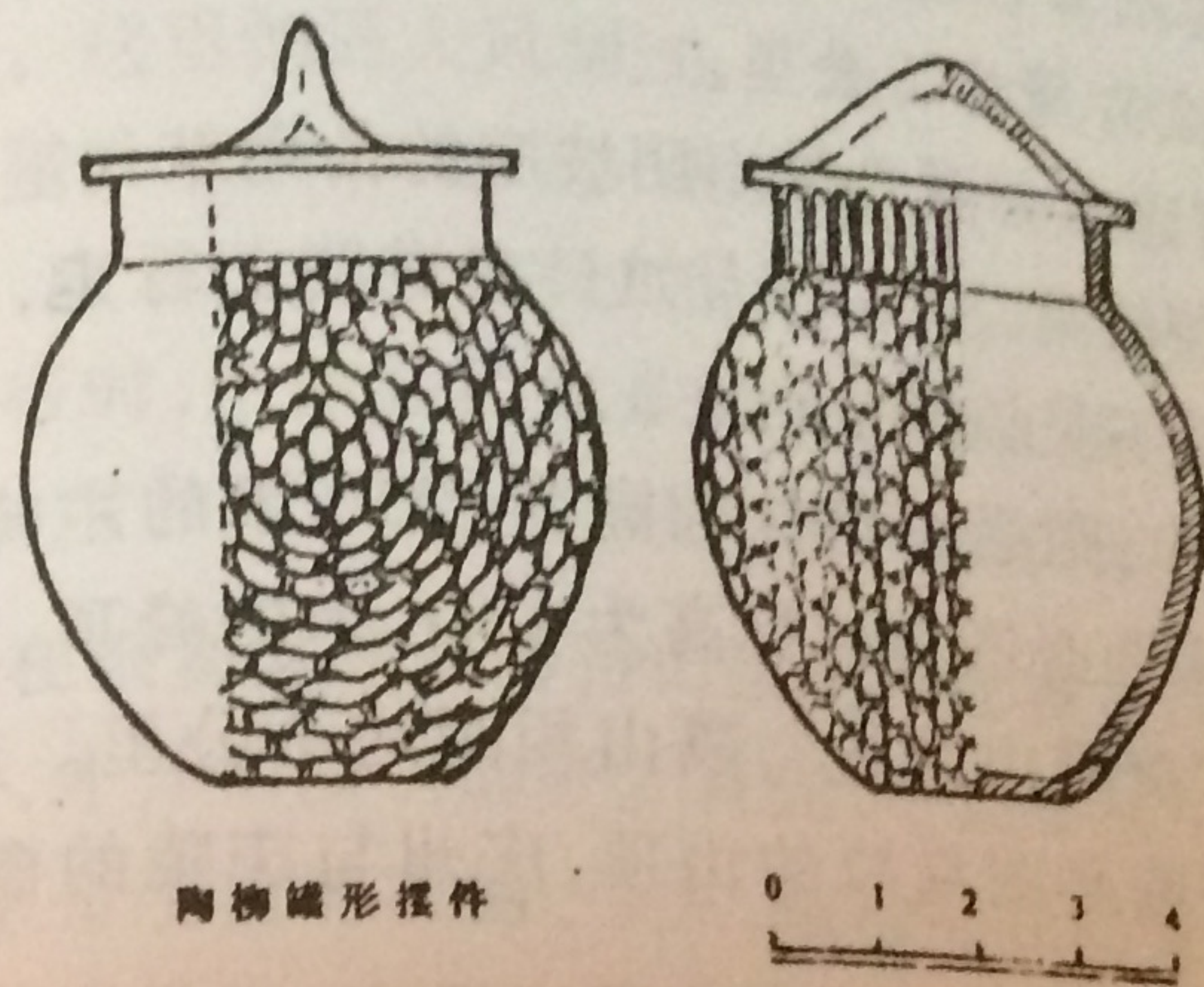
柳罐形摆件为陶制,火候较高,色泽为辽代中后期常见的灰中显黑的泥质灰陶的颜色。

罐体的制作为模制,先分左右两半模压成型后,再加以对好粘接。今器件的外壁上,仍可见有对接后未加修饰好的微凸的薄片边棱。罐口上的提梁为手制,先将泥条制成桥形后,再贴接在罐口上。因提梁未经模压成型,在贴接处显见有两端长短不一的现象,用手抹压之痕亦不规整。

罐身高为5.8厘米,通高为7厘米。口径为4厘米,脖径为3.4厘米,腹径为5.2厘米,底径为2.2厘米。平唇、直口、斜肩、深鼓腹和小平底。

罐体的外部,口沿的直壁上,饰以压印的双勾似木板条成形的竖线纹。罐身、自罐肩起至底部,通饰以似柳条经绳索编缀成型的压印纹。罐内,无任何纹饰。

柳罐,原本是农耕文化地区,人们习用的汲水工具。它不仅易于生产,而且又较经久耐用,深受人们的喜爱。而庆州城内出土的这件“柳罐”,它既不是实用品,只是仿柳罐形的陶制品;同时器型又很小,只是一种赏玩中的摆件,当然这也是人们对它喜爱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一种在农耕文化地区,广受人们喜爱的器具,当它传播到游牧文化地区时,不仅同样受到这里人们对它的喜爱,而且还增加了另一种喜爱的形式,即“摆件”。这似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有辽一代在治国安邦的策略方面,虽说始终坚持了“因俗而治”,换句话说就是“一国两制”的方针,但是契丹民族对农耕文化的吸纳,并不小气和吝刻。其二,开始在农耕文化地区使用并广受人们喜爱的汲水器具,或许早已传播到契丹的腹地为人们使用和喜爱。因辽代社会特有的“捺钵”制度和“行国”文化,这里的人们,就将喜爱之物,又增加了一种形式,通过模制加工,烧制成陶质的摆件,便可随时随地的赏玩。

辽庆州城内出土的陶制柳罐形摆件,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又一极细微之亮点。

## 十一、必图城址

必图古城址,位于索博日嘎苏木的西南端。古城址,东

南距庆州古城为5公里,西北距穆宗所建黑河州古城2公里,西北距金界壕为1公里。

古城营建在必图乌拉山阴坡底的山坳草甸上。因其离山较近,地势较高,所以行人如只在道路上行走,不去登高眺望,根本看不见该城址所在。

古城西南,距必图乌拉标高为1710米的主峰,直线为3.5公里。南距必图乌拉标高为1316米的峰顶,为1.5公里。东南与“磴磴山遗址”,隔山相距约2公里。如从古城出发,就近登临必图乌拉的山顶,庆州与庆陵的概况,可尽收眼底。

必图古城址,为扁方形。东西的城墙宽为440米,南北的城墙长为335米,方向为南北方。古城只在东西两侧城墙的正中,辟有城门,门宽为18米。古城址未见有瓮城和马面。城墙为土筑,不含任何夹杂物。今残高为1.7米,底宽为15.5米,顶宽近4米。

古城内的建筑遗址,似多集中在东西城门平行线的北部。因这里的植被很好,所以地表呈现为微平凸的土丘,且基本上都在城中的北部,未见有裸露的砖石等建筑材料。虽然在城址内,也采集到一些属辽宋时期的陶瓷碎片。如有饰以绿釉的鸡冠壶残片、印花白瓷似定瓷的碗碟残片等等,但未发现有晚于辽代的遗物。

在古城址的东大北小的5公里处,有数片不连贯的蒲草丛,生长在沙丘与湿地之中。长势良好,叶茎均很粗壮。这里以往在被沙化之前,似乎应是一处较大的水潭或湖泽;或许庆州境内所辖的“兴国湖”就在这里。

在古城址的北大东小的约5公里处,有一面积较大的沙丘地带。这里如遇大风刮过,当地的牧民,常在其间拾得应属辽代鞍具或服饰上的,一些缀饰等碎小器件。我以为这一地带,应是辽代自圣宗去世和兴宗以后,往山陵(庆陵)里安葬皇帝时,中途必经也是必有的祭祀场所。因为辽代的圣宗、兴宗和道宗死后,先是停尸在庆州城里的“葦涂殿”,一边在祭奠其实是等待山陵中营造寝宫的完工。待工程告竣后,才开始发引起葬。首先,中途要有一个祭祀的场所,先将皇帝生前的衣物、弓矢,鞍勒等在此焚烧祭祀后,其次,才向山陵进发,直至安葬完毕。

从必图古城址采集到的遗物来分析,它应属于辽代的城址。但是什么城,为什么要建在离庆州如此之近的山阴地带。对于这些问题,不仅史志从未见载,而且以往也未曾出土或发现过刻石等有文字的证明。不过《辽史》在“庆州条”中,有如下记载:“玄德县,本黑山黑河之地,景福元年(1013年),括落帐人户,从便居之,户六千”。<sup>①</sup>

这一记载,阐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玄德县是因营建庆陵和庆州,而于景福元年(1013年)同期始建的县城。它的名称有别于许多县的冠名。“以俘户置县,多用旧居名之”。比如庆州所辖的另外两个县,即孝安县和富义县应即如此。而它是以庆州“玄宁军”的“玄”字冠名。换句话说,就是突出了一个“黑”字,即“黑山黑河之地”的“黑”字。“黑”即“玄”的用意。这正是必图古城址的地望。二是,“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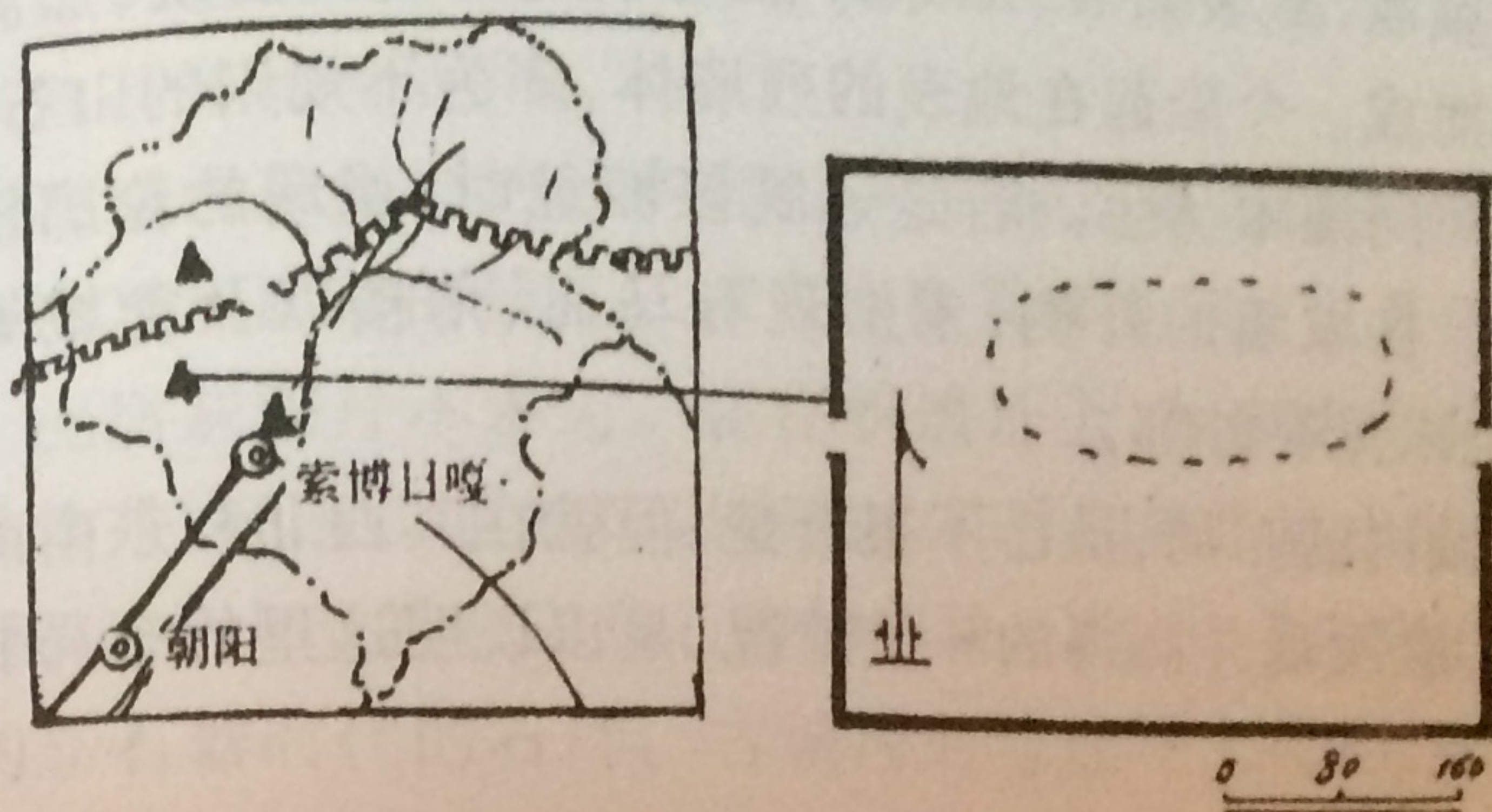
<sup>①</sup> 《辽史·地理志一》444页。

千户”均由“括落帐人户,从便居之”而组建的奉陵县。

终辽一代有个“辽内四部族”,即遥辇九帐族,横帐三父房族,国舅帐拔里、己宝己族和国舅别部。这四部族,是辽朝行宫部落的帐族,是辽朝政治舞台活动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契丹本户,又多隶属于宫帐。由此可见,玄德县这个奉陵县组建和设置的要意所在;由此亦可知,必图古城址,为什么会营建在看来很闭塞,其实距庆陵与庆州很近,稍加登高,即北可望庆陵南可观庆州的绝佳之地。

至于城址的规模,似容纳不下六千户人口。这里就又反映出了辽代“行国”文化和游牧经济的自身特点。城内的居住者,只能是衙署机构和一定的管理人员,而众多的民户,如没有特殊情况需要参加争战时,就要常年散居在城外一定的牧场,逐水草而居,随畜群而牧,为解决租赋和生活等项费用而劳作;同时,还有一部人户要扈从“斡鲁朵”,四时捺钵。

索博日嘎苏木的必图古城址,为辽庆州所辖的三县之一的玄德县县城遗址。其余二县,因如今辖区在林西县境内。林西文博单位尚且未刊布具体材料,笔者在此不应抢先披露信息。附:必图古城平面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 十二、石匠山城址

石匠山古城址,位于索博日嘎苏木的西南端。古城址,东南距庆州古城为7公里,东南距玄德县古城址为2公里;南距金界壕为1公里;东距王坟沟河为3公里;西北距庆陵的山陵,直线约为5公里。

古城址的西侧和北侧,距离石匠山并不甚远。正西距石匠山标高为1531米的主峰为3公里,西北距石匠山东北走向的山峰,峰顶为1.5公里。古城的西和北,意在依靠大山遮风挡寒。古城的东和南显见开阔,但地平与地形,均高于城址所在之地,呈缓坡或是漫梁。古城址,就营建在大山坡旁,低洼的山窝谷地,草甸之中。

石匠山城址的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北偏西75度顺山川向。南北城墙,东西宽为362米。东西城墙,南北长为450米。城门仅在南北两侧可见,且均开设在城墙的正中,门址残宽为10米。

城墙,从表面看,原来好似用不规则的山石块,加泥土垒砌而成。今隆起在地表的残墙体,多为不规则的山石块,其缝隙间灌木丛生。若是远眺该城址时,城墙的轮廓较为醒目。在城墙的外侧,未发现马面、角楼以及瓮城等设置,也未见有外郭。

城内的布局,虽已不很清楚,但就在其西北和东南两个区域,能发现并测得的一些情况,足以说明这里的布局非常之罕见。

在城内的西北方,即北城门的西边。又用墙体围出一个南北长 220 米,东西宽约 171 米的城中之城。此城中城内,又用两道南北通长的墙体,将城内分为三个间距和宽窄都不等的地块。自西向东为:宽 33 米、宽 47 米和宽为 82 米。墙的北端,接筑在外城墙上。墙的南端,除用一堵通连的墙体与西城墙接筑外;南横墙外往南,又空出南北宽为 18 米的,东西向似通道的地带。开设门的情况,未能分辨出来。

在城内的东南方,即南城门的东边。又筑有一南距南城为 92 米的间距,东西宽为 75 米,南北长为 108 米的小城,其东墙直接借用大城之东城墙。

城内的两处小城的墙体,与大城的城墙用料和做法完全一致,只是而今隆起在地表的用不规则石块掺土的堆积,较大城墙显见低一些窄一点。

城内的建筑遗址,今多呈微高出地表的漫土丘,其上显见有被践压后成碎块的,辽代通用的沟纹砖和布纹瓦的残件。由于这里的草木繁盛,我几次去考查,均未能做翔实的

城内建筑遗址的测量,所以虽可说这里的建筑遗址不少,但仍未知其布局与规则。

在城内采集到的标本有:茶叶沫釉辽瓷鸡腿瓶的器底、器口和其深腹部的残片。宋辽白瓷及青瓷碎片以及碗的圈足。泥质灰陶片不多见。在建筑遗址上,除多为青砖灰瓦的碎块外,还有少量的饰以绿釉的仰瓦和条形滴水的残块;同时,还有小型的石臼和石磨的碎块。此外,还发现有极少量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叶。古城内的遗址等文化层,似尚未遭到过彻底地破坏。

由于石匠山古城址所在地的特殊环境,不仅是在低洼的山窝谷地之中,而且草木繁盛植被很好;加之古城址早在统和八年(990年)就已被明令废用,所以这里似乎历来就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

尤其是《辽史》的编撰者们,在“庆州条”中,虚构了庆州城是在穆宗所建的黑河州的废址上复置。在“史笔乃天下之大信,一书当出百世从之”这一中华传统理念的影响下,似乎历来还没有人对这一虚构有过质疑,更谈不上会有多少人来此实地考察了。

笔者因工作之便,于 1977 年夏就已发现和开始考察了石匠山古城。当时,根本想不到它就是穆宗所建的黑河州古城。当时只是依据它在金界壕以北,城址内所见到的遗物,均属辽代文化内涵。可以认定它不属金代的城址,而是辽代的城址。又只因它与一般的辽代州县城址,有着明显的不同,当属头下州一类的私城,还是什么,很长时间里思绪无头。

随着友爱村的辽代银器窖藏和遗址的发现,不久又阅读了沈括的“使契丹图抄”,并理清了友爱村的遗址,是直到道宗朝,仍完好沿用的“黑河州”州城址。其后,又在黑山前发现了辽碑,碑铭中也有黑河州名称的载录。该碑的镌立时间,经考古发掘考证,其年代的下限在道宗时期。

既然辽道宗朝黑河州仍然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么《辽史》载统和八年州废后又在其上复置庆州。这里不只是显见有抵牾,而且也存有可质疑的蹊跷。

此时,石匠山城址,在辽代时是什么城址再读《辽史》,其实《辽史》在“庆州条”中,早已做了较清楚的载录。

《辽史》在“庆州条”中,开始用了八个字,“庆州玄宁军、上、节度”。阐明庆州城的级别后,就开宗明意地点了石匠山古城。“本太保山,黑河之地,严谷险峻。穆宗建城号黑河州,每岁来幸,射虎障鹰军国之事,多委大臣,后遇弑于此。以地苦寒,统和八年(990年)州废”。《辽史》中上述的一段记载,完全是石匠山古城址所在地的,地形、地貌等的真实写照;因为庆州城是营建在开阔坦平的冲积平地上。至于“庆州条”中的“爱其奇秀”是圣宗亲口所说。如其为真,这应是圣宗在庆云山发愿时,对庆云山的赞美之词。绝不会是圣宗自己则做出“以地苦寒”而废城的决定,忽然又突发奇想“爱其奇秀”,要在其上建城号为庆州。此前我已在索博日嘎古城一文中,做过阐述,在此不加赘述。

石匠山古城址,既然是穆宗所建的黑河州,于圣宗统和八年废弃。那么,该城址应始建于什么时候,《辽史》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依照辽代的规定“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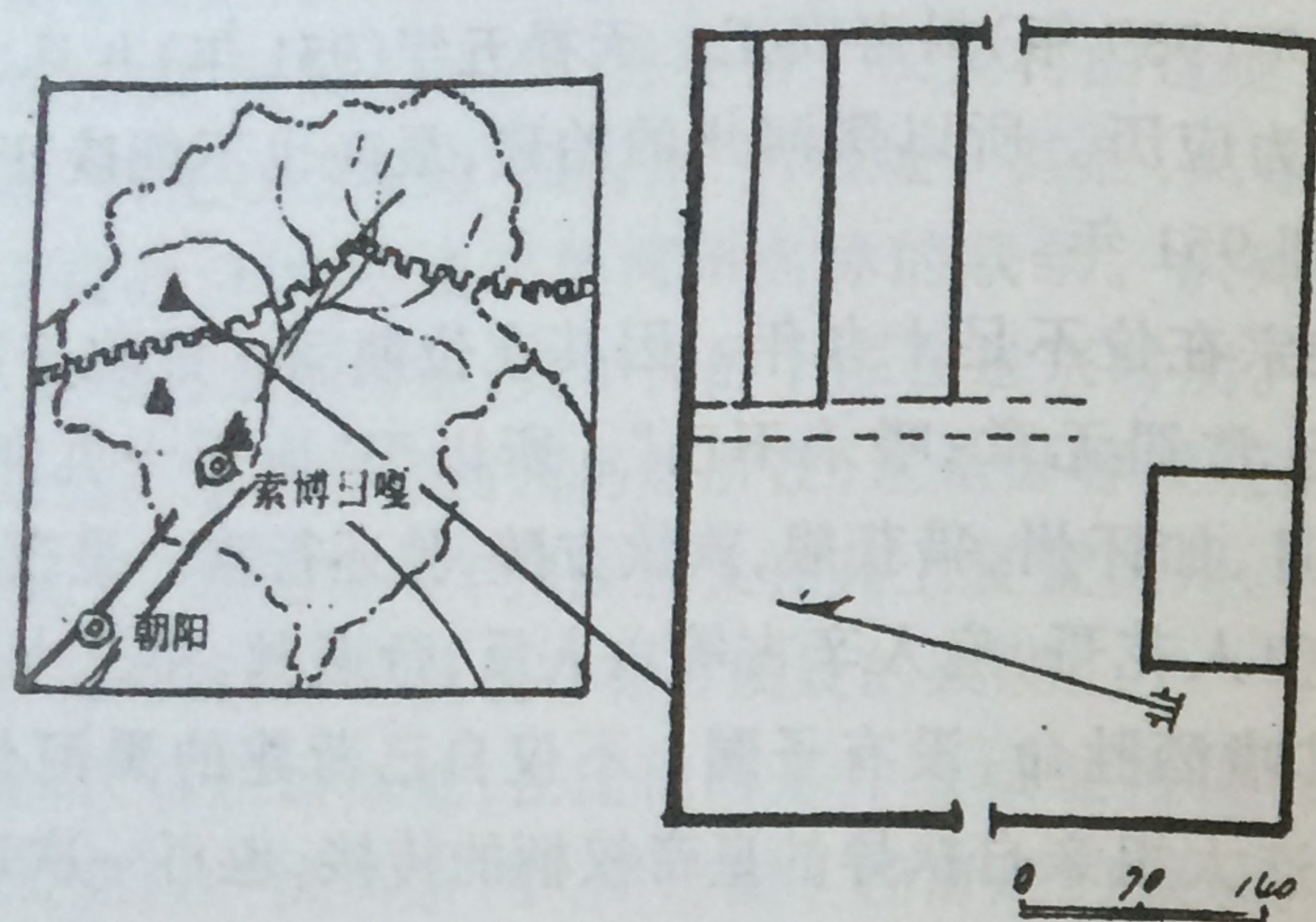
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和穆宗本太宗长子,会同二年(939年)封寿安王。天禄五年(951年)九月,即位并改元为应历。所以黑河州的始建,最晚也不能晚于应历初年,即951年。

穆宗在位不足十九年。因其在位期间,“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嗜杀不已”。所以于“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如怀州,猎获熊,欢饮方醉,驰还行宫。是夜,近侍小哥、盃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年三十九。”<sup>①</sup>也因其嗜酒胜命,没有子嗣。不仅自己营建的黑河州被废弃,就连太祖亲自执导的皇帝权柄的传接,也再一次改弦易辙;又归太祖的长子,让国皇帝耶律倍的嫡系子孙执掌,一直到终辽一代。

索博日嘎苏木的石匠山古城址,为穆宗所建的黑河州州城遗址。

附:石匠山城址平面图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sup>①</sup> 《辽史·本纪穆宗下》87页。



### 十三、聚落遗址及尾语

前文,笔者对今巴林右旗所辖境内辽代的五个州、五个县、一个城和二个馆,做了一些探考并加以直陈我见。除此之外,在今巴林右旗辖境之内,还有不少不为城址,规模也较城更小;但是明显有建筑遗迹或建筑遗物的一些辽代的聚落遗址。如上石匠山出土辽代古钱窖藏遗址等等。

这些聚落遗址,有没有名目,归属那个州县管辖,而今仍无从稽考。

沈括在他出使辽国,进入如今巴林右旗的版图,经黑河州(友爱村遗址)北上,直至抵达当时辽道宗的夏捺钵所在地“单于庭”时。在此途中,又记述有七处帐址:牛山帐、锅窑帐、大河帐、牛心山帐、黑河帐、新添帐、顿程帐。同时,还记有燕王城和黑水镇。

此外,1981年在黑山前所发现的“辽碑”,在其已残损

的碑铭中,仍有如下不为州城的名称。

A、庄类:宜州庄、瞿州庄、南新庄子。

B、寨类:中作寨、长坐寨、营作寨、教坊寨、桦皮寨、果园寨、苏家寨、赵家寨、五家寨、金家寨、沙岚寨、上后妃寨、下后妃寨、下三家寨、上杨家寨、杨墨里寨、西陡岭寨。

C、务类:上麦务、下麦务、南灰务、杵作务、粮谷务。

该残碑碑铭中的上述这些不为州城的名称,是否应这样认识。它们不可能都在巴林右旗的辖境之内,但是也不能说如今巴林右旗的辖区之内,就没有它们之中的一些聚落的所在之地。当然推论只能是推论,望日后能有具体的,令人信服的考古学等材料来加以论证。

至于沈括所记述的七处帐址,当为季节性的或是临时性可移动的食宿等营地。如若帐址为毡包布帐所为,那么即便是仍可留下安营扎寨时的痕迹,但它不似坚固的砖石砌筑遗迹,不可能千年不变。近些年来,我从里程、路线以及地望等方面大概去推测,并赴实地考察时,并未发现这些应设帐址的地方,均有什么建筑遗迹。

关于“黑水镇”,沈括在其“图抄”中,仅做如下的记载“辽庆州东北十里,经黑水镇济黑河至大河帐”。

如今索博日嘎苏木治所东北,约4公里处,在查干沐沦河(黑河)南岸的平地上,有一始建于1935年的村落,名为“呼热艾勒”。当地的一种“志书”,对这一村名,做了如下两种定义并存的诠释。(一)“呼热”即“库伦”,为“圈栏”,“艾勒”为营子之意。(二)最初居住者由哲盟库伦旗搬来定居而得名。此外,近年来在当地的群众中,个别人又开始称这

个营子,为“狐狸营子”。

我认为,第一层诠释较为可信。因为索博日嘎苏木政府的辖区内,共有12个嘎查村,48个独贵龙(村民小组)和25个自然村。无论其建治早晚,除呼热艾勒诠释中,有因居民是从库伦旗搬迁至此定居,建村因名而外。“志书”中,再没有一处居民是从哲盟搬迁而来的诠释。第二层诠释之意,有牵强附会之嫌。

此外,我猜测这里就应该是沈括所言的黑水镇的所在地。或许在这里设村建治之时,这里的地面上,可能还有一些辽代时的残墙断壁遗迹,虽已圯废由于还可呈现为圆形或圆形的围墙,或是围堰,因以为名。

有辽一代在其腹地,尤其是在其早期,以至到中期稍偏早的时段,或者说是“澶渊之盟”以前,所建的州城,一般多为私城。因其居民,多为在战争中俘获的人口,或者说是战争中强迫迁移至此居住的人户。后来这些私城已收归朝廷管理;但是也有一些私城并未被收回。

这些私城中,尤其是冠以“头下”的私城,不仅其规模可大可小,且一直没有什么规制。只要得到了皇帝的认同,朝廷就可赐予州县之额。再依据其州城之级别的不同,凡属军州的城池或者说是够得上派节度使以上官吏,都要由朝廷来任命委派。如其不然,只是可派刺使以下官吏的城池。这样的私城,就由头下主在本部曲中自行选任,朝廷不再委派。同时这些私城在管理方面,凡属军政要事,均由朝廷掌管;凡属行政事务,则由头下主处置。在经济方面,凡是酒税,必定要向朝廷设在上京的管理机构课纳;如是属于

市井之赋等等收入,则全入头下主的腰囊。正因如此,这里的州县城池,才出现大小不等,规制不一的杂乱局面。其所辖的民户,又因其身份的不同,有的只可散居在城外指定地域,有的则可居住在城内或是聚居在城外固定的地方。他们既要解决自家的生计问题,还要为主子们承担各种不同的劳作,更要为主子们创造财富;有的甚至还要扈从皇家的四时捺钵等等。

前文中已提及的诸多不为州城的地名和已发现而仍无从稽考的聚落遗址以及更多的散居遗迹。似可这样认识,这正是辽代社会“因俗而治”的另一个侧面的真实写照。

要探考辽代的城址,特别是西拉沐沦河(潢水)以北的城址,我认为仍有许多的工作应该去做。笔者为此虽说已做了一定的工作,也提出了一些前所未闻的管窥之见,但这并不是也不应该是最最终和定论。我以为这只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进一步加以展开的深化,有所促进和裨益而已。



## 辽代城址探源附录

### 一、潢水石桥考辨

潢水石桥,是内蒙古自治区历史最古老的石桥,也是中国北方地区时代最久远,史志有著录,早已蜚声中外的古老名桥之一。它显赫的地理位置,它承载着的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史的身价,早已远远地超越了它的历史年代。然而,也只因它的年代久远,几经沧桑,古老的石桥早已是今非昔比。加之朝代的更迭,相继修建,特别是1963年新建要取代潢水石桥的巴林桥时,它的处境就更加凄惨。这次建桥,不只是采取了要潢水石桥退出历史舞台的一般做法;而是把古老石桥视为“障碍”,从桥基到桥梁以及处在原石桥两桥中间,由玄武岩自成基岩的河中小岛,一起加以清除扫荡。

古老的石桥,自此已被人为的湮没,然而由于人们对它的钟爱,并未放弃对它的探索和关注。当然也正是因为它的外形已不存,甚至连张它在被扫荡前的照片,至今仍未与世人见过面。所以自1978年始,对它的考识已不再只是以往已有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一种认同,而是又起新的说法。笔者也很关注对石桥的考证,近来喜获两帧极为难觅的,摄

于1963年关于石桥的照片。今在此公诸于世,供大家研究利用,同时就此也谈谈我对石桥的看法。

#### (一)一个载体出现两个称谓

“潢水”与“西拉沐沦”似乎应是两条河流的名称,其实不然,它们纯属是一条河流,是在不同的时段所出现的不同称谓。潢水一名,自唐代中晚期才出现。五代十国时契丹族已建立国家,其族语中称潢水为“泉罗个没里”,但是在史籍中还是统称为潢水。这条古老的河流最早出现在史籍中的记载,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只是随着时段的更替,它也随之冠以附有时段烙印的不同称谓。如西汉时期它被称为“作乐水”,东汉时期称为“饶乐水”,南北朝时期称为“洛环水”、“弱洛水”。到了唐朝初期,又改称为“饶乐水”。如史载“契丹居饶乐水北,奚居饶乐水南”。到了唐朝的中晚期,《新唐书·地理志》载“营州北四百里至潢水”。潢水这一名称,后经辽、金、元、明直到清初的四个多朝代,大体一直未曾改变。

潢水石桥,是契丹族立国后,在潢水上营建的。桥因水而冠名“潢水”,桥又因用材为石料,故又名桥为“石桥”,全称为“潢水石桥”<sup>①</sup>。

清朝初期,清政府分封蒙古部族的牧地。巴林部的封地,“东至阿鲁科尔沁旗界,西至克什克腾旗,南至翁牛特界,北至乌珠穆沁界,辽上京临潢府地。”<sup>②</sup>到了天聪八年

① 《辞海》1999年版的1175页中,有潢水与潢水石桥的词条。  
② 《蒙古游牧记·巴林8页》

(1634年),巴林部开始分为左翼和右翼二旗。<sup>①</sup>

这时,居住在这里的人民,是蒙古族为主体,所以对潢水的称谓,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开始改称为如:“什里木河”、“失烈母林”、“什拉磨楞”、“西拉沐沦”等等。其实这是“潢水”一词的意译的蒙古之称,也是契丹族语的“朶罗个没里”称谓的同源别称。

清朝建立后,清政府切望居住在这里的蒙古族,能心悦诚服地顺从清廷的统治。他们遵照“北不断亲”的祖训韬晦,先后将三代满族的皇家公主:淑慧公主(康熙的姑姑)、荣宪公主(康熙的女儿)、和婉公主(康熙的孙女),下嫁给巴林右旗的蒙古族,并随之赐爵封王。同时在巴林草原上又大兴土木,其中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营建的“康熙行宫”。<sup>②</sup>由于这组建筑有别于寺庙的重檐歇山式的建筑,而它所有的房屋,均为硬山、单檐、卷棚式建筑。就其中个体房屋而言,如几进院落中的堂屋,不但进深宽敞而且开间又多,这较草原上人们所住的毡包布帐,不但新颖别致而规模宏大。牧民们,原来称有山墙,前后出檐的砖瓦房为“板身”房子。今康熙行宫的房屋,较一般民宅的“板身”房子更大,所以就被称之为“益和板身”。后来人们就将康熙行宫所在的地方,约定俗成的称做益和板身;进而又渐渐地演变成为蒙汉合璧语“大板上”;再后来,又变成了如今巴林右旗政府所在地的称谓“大板”。

巴林右旗的蒙古族王公们,在浩荡的皇恩感召下(皇姑

<sup>①</sup> 《巴林右旗志》2页。

<sup>②</sup> 《巴林右旗志》4页。

的下嫁,皇帝又来此驻蹕和临幸;更何况王爷们也要不时地进京省亲拜望。),解决好西拉沐沦河上的桥涵事宜,已为首当其冲。

此时,辽代所建的潢水石桥,虽然弥久沧桑,凋敝颓圮,但是巴林旗的人畜车马,要想南去北归,只能由此桥渡过,舍此再无他择。西拉沐沦湍急的水流下,涣散漩陷的泥沙,实实令人不寒而栗,因徒步或骑马涉水过河者,稍有不慎,常常是有去无回。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淑慧公主,在潢水石桥的旧址上,主修桥涵<sup>①</sup>。至此,潢水石桥改称为“公主桥”,也称之为“巴林桥”。

## (二)天赐条件成为绝佳选择

潢水石桥始建于辽代,是毋庸置疑之实;但是具体是在什么时间所建史志不载。今人们知晓中国北方草原上,有座遐迩闻名的潢水石桥,还应归功于北宋时期,遣辽的使者们。

宋辽两国自“澶渊之盟”和好后,两国频繁地互派使节往来不断。北宋的使者在返回开封后,要向朝廷做书面汇报,如什么“行程录”等等。就是在这些语录中,才明确的记录下和披露了契丹族所建的,辽国国都上京附近有座潢水石桥。如北宋朝的枢密直学士薛映,他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即辽圣宗开泰五年(1016年),奉命出使辽国回国后,在他所做的汇报“薛映记”中,第一次出现了潢水石桥的名称;

<sup>①</sup> 《巴林右旗志》2页。  
《辽海丛书·巴林纪程》2168页。

由此潢水石桥也就载入了史册<sup>①</sup>。还有北宋朝的右正言知制造富弼(有的材料中写成富郑公实为一人),他于北宋康定元年即辽兴宗重熙九年(1042年),奉命使辽后,在他所做的汇报“富弼行程录”里,也记录了潢水石桥。<sup>②</sup>再如此宋朝的河北西路察访使沈括,他于北宋熙宁八年即辽道宗大康元年(1075年),出使辽国返开封后做的“使契丹图抄”<sup>③</sup>,更为翔实地记录了潢水石桥。这里要问,为什么不见辽国的使者或者是契丹族人,对潢水石桥的记录?或许是“只因身在此山中”而淡忘,亦或是辽国“书禁”甚严之故,今已无从稽考。

考潢水石桥所建的年代,宋朝使者薛映使辽的时间最早,他所做的实录,足已说明在他发现石桥时,石桥已经建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石桥建成时间的下限,也就是石桥已建成的最晚时间,起码可定在薛映发现和记录石桥的前一年,即辽圣宗朝开泰四年(1015年)。那么潢水石桥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营建。对此,以往已有几说,但至今仍属一个未能彻底解决之谜。

持“石桥建于太宗会同十一年”说者,他们是认同了《契丹国志》中的孤证。“会同十一年太宗崩,兀欲(世宗)即皇帝位,归途中被述律太后(太祖皇后)发兵拒之,相遇潢水石桥”。其实这一记载不仅仅只是孤证,这与《辽史》中的记载“太后、李胡整兵拒于潢渡”;这里的“潢渡”与“石桥”明显不

① 《辽史·地理志一》441页。

② 《契丹国志·卷二十四》236页。

③ 《永乐大典》。

同。另,“会同十一年”的记载,也显然有误。“会同”是太宗朝所用的第二个元号。太宗崩于大同元年四月,也就是会同九年末,即下一年的改元初年。同年九月即大同元年九月,世宗安葬好太宗后,即改元为天禄元年。太宗朝的“会同”只有九年。从第十年开始就改元为大同元年,况且大同元年因故由世宗又改为天禄元年。太宗朝并没有会同十年;有辽一代的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会同十一年”的问题。

说“潢水石桥,在太祖时就开始兴建”。此说我亦不能苟同。太祖时为辽国初创,本尚不固邦亦不宁。诸多方面,如社会尚未发展到急需修建潢水石桥的要求,技术力量也未储备到位等等,当时尚未到达这一地步。

说潢水石桥是始建于圣宗朝者,其中还有说是始建于圣宗朝建中京的同时之说。这一推论性的假说,我以为圣宗朝说较为可信。在尚未发现确切的实证之前,为探究潢水石桥始建的上限,存此说可为借鉴,愿能有些裨益。

潢水(西拉沐沦),发源于克什克腾旗境内的七老图山和大兴安岭交界的三角地带,当地人称“百尔赫贺尔洪”,古时又称之为“平地松林”。<sup>①</sup>它自西向东流经克旗、林西县、巴林右旗、阿旗和翁牛特旗。至翁旗的大兴地区在与开鲁、奈曼三旗的结合处,与土河(老哈河)合流汇为西辽河,全长为378公里。

在这全长约400公里的潢水上,要选择可往来上京的

① 《克什克腾旗文物志》175页。

桥涵基址,绝非是一件随意之事。我以为首先就要考虑桥址距上京的里程,一定是以近为佳,不可能舍近求远。其次要参照往来上京的道路,是否通达便捷,不可能选择艰难险阻。再次要考察河道与河床,是否具有较好的建桥条件。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史籍,今仍无考,只在桥的形制方面,沈括在《使契丹图抄》中有所记载。如果我们从潢水的实际流程情况分析,似可看清一些端倪。

从潢水源开始到百岔河汇入处,这一段潢水,基本上是在高山窄谷中穿行,河床较窄,河道也多有弯曲。河之两岸也显见陡立,河底由河卵石和泥沙组成。这里的河床较窄,河底也较由涣散的泥沙组合为好;但这里不仅距上京的里程较远,而且要为行车道路走上京亦不通达。

从百岔河入河口到少冷河汇入潢水处。这一段河流,河谷已变的开阔,两岸出现了台地或是河漫滩地。河槽也显见平直和宽浅;有些地段的河床还出现了不太大的摆动现象。河底多为涣散的泥沙组合。不过在个别地段,河流经过处,是由沙丘或漫沙覆盖着的或是完全裸露着的玄武岩地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地段,就是1963年被扫荡后的石桥处和如今的“巴林桥”所在处。如今在河道的两岸,仍可见有裸露着黑色而坚实的玄武岩。此外,这里的河道分外见窄,酷似我们习见的酒瓶的瓶口处,但是河床陡然变的特深。上游来的河水,由于受到两岸天然生成的岩石的管束,在此变窄加深,流过此处即恢复原样,并平直地向下游流淌。

这里不是在辽上京中轴线的正南方,有点偏西也稍见

远些;但这里有往来上京便捷的河谷台地、河漫滩地或者是平川,可为行车大道。如这里离潢水石桥北岸的不远处,就有从北往南流的黑水(查干沐沦)河宽阔的河谷。沿此河谷北行在此河向西的拐弯处,又有汇入该河的古力古台河平川。沿此河川向北再向东北,又有敖尔盖河平川;再往东行,又有流向上京南的沙里河台地和平川。

从少冷河汇入潢水,到潢土二河合流处。这一段潢水,两岸似有一些台地,但多为流动和半流动沙丘,绝大多数地段又为冲积平原。河床在这里更为开阔,河槽也变得更宽更浅。摆动的河床不时要发生变化,主河道在这里已不太明显。河道间多有沙盘或是滩汀,河底均为涣散的泥沙。这里虽说直线距上京较近,但是这里的河道摆动不定,河床较宽,河底与河岸又缺少基岩。所以这里如为渡口,人行马过较为方便。在这段河道上,近年来已建起了“海日苏引水枢纽工程”,人车均可通过。北岸紧接海金山角,南边建有数百米长的堤坝做为引桥。

辽代潢水石桥的建设,我以为是七分天成三分人为。真可谓虽由人做,宛若天成,实为天作之合。

### (三)保和馆址潢水石桥位置的主证

潢水石桥到底建在什么地方,以往的方家学者,均以北宋遣辽使者,在“语录”中的里程或是桥的形制加以考证。在诸多的论述中,除1978年的新说而外,大体上的看法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偏颇之见,但基本相近。

首先,从潢水石桥的形制来考证石桥的位置。《辽史》和《契丹国志》等史籍中,不见有关潢水石桥的形制等记载。

只有科学家沈括在他的《使契丹图抄》中,对潢水石桥才有较翔实的记载。“至潢水迎河行数里,以乘桥济河。至中顿河广数百步,今其流广数丈而已。俯中顿有[潭],<sup>①</sup> [潭]南沙固,[潭]北流广四丈,岸皆密石峻立如壁,长数十步,虽回曲数折而广狭如一,疑为人为为之。河出峡中有声如雷,桁沟以桥”<sup>②</sup>。这是历史上对潢水石桥最早的描述记载,也是辽宋时期唯一的记载。这段极其珍贵而又无可取代的史料,已把石桥的轮廓勾画的较为清楚。潢水石桥,当时是在一条河上桥分南北两段。他先过南边的桥后在河中发现了[潭](应为河心岛成者是复盖在岩石上的沙汀),再过北边的桥时,又发现河道两岸“密石如壁广狭如一”。桥就是利用河心岛和岸壁而架建的,所以他又记之为“桁沟以桥”。

沈括对潢水石桥的记述,是在公元1075年。到清咸丰七年(1857年),也即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修桥后又二百年时,清廷派员抵巴林草原,使者在返回后的呈文中,对当时的巴林桥,也有一段记载。“过沙岭二里余,抵巴林桥。河名色伦木伦,水面甚宽,独近桥处仅二丈余。水与桥平,桥下之水深至十余丈。据土人云,夏间甚涨,上下游水均泛溢出岸,唯桥下宽深如故,传为神异。岸北有碑亭,碑兼蒙满文镌刻”。<sup>③</sup>因记述者是在“十二月廿七日”过的桥,或许是天气太冷之故,没记述桥的形制,但就其“独近桥处仅二

① 我见到的资料中的这个字[潭],还有一个为(潭),一个为(禅)。我实不知那个字正确。又苦于无处可查。只好用[潭]代之。请见谅和教正。

② 《永乐大典》。

③ 《辽海丛书·巴林纪程》2618页。

丈余”和“桥下宽深如故”等的描述,已可知石桥特征之一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位迁徙至台湾的巴林人,<sup>①</sup>对石桥的形制也有很翔实和不可多得的记载。桥“架于河床狭处,一系列连贯三个小石山上,石质坚实,堪称理想桥基。桥面全铺粉白色长方型条石。南石山至中石山段(即石桥南段),下设涵洞,上设石栏,石栏上镌刻着荷叶花纹。衔接中石山至北石山段(即石桥北段),下设涵洞,上无石栏。此段适当中流,大水可以漫桥,故无桥栏。南石山之南,地面低于桥面,每逢冬季涵洞冰封,河水向桥南。冰封解冻季节,上游冰块涌至,涵洞容量不够,亦必往桥南。桥之北端石山上,建有石碑一幢,为清乾隆年所建”<sup>②</sup>。这段记述,与前两段特别是沈括的记载,虽然二者相隔八百多年,但是南北二桥一致的吻合,足可证明“公主桥”(巴林桥),就是在潢水石桥的基础上修建的。

此外,我在这篇拙文里刊布的摄于1963年,尚未被扫荡时的巴林桥的实照,以及始建于1963年的六孔巴林桥的实照。从老桥的照片上看,仍可清晰地分出老桥为南北两段桥,南为单孔,北为双孔。这座桥又是在什么时候是否有过维修,我实不知晓,但是我有幸曾几次,以步当车从它上面走过。也曾在个别的桥面条石上,见到过有人工凿刻的,且为等距的深约5厘米,边宽约12厘米的方形石坑。这座

① 《辽史汇编九·契丹上京临潢府》76-563页。马真吾自述:民国十五年初到林东,十六年曾在林东垦务局担任丈地绘图工会。在林东居住近20年。

② 《辽史汇编九·契丹上京临潢府》76-563页。

老桥在新建六孔巴林桥的上游,方向为西北,相距约30米。在照片上,新桥的孔洞下,仍可见老桥的容貌。(图版一、二附后)

其次,依据史籍中所记载的关于过潢水石桥后的馆驿及里程,来考证石桥的位置。

如薛映使辽后的记载。“渡潢水石桥旁有饶州,唐于契丹赏置饶乐州,今渤海人居之。五十里保和馆,七十里宣化馆,五十里长泰馆”。<sup>①</sup>富弼使辽后的记载。“渡潢水石桥旁有饶州,盖唐朝赏于契丹置饶乐州也,今渤海人居之。又五十里至保和馆,渡黑水,七十里至宣化馆,又五十里至长泰馆”。<sup>②</sup>其实上述两条雷同的“语录”傅乐焕先生早有明晰的清算,<sup>③</sup>笔者在此不再赘述是非。正是由于这些语录只有里程而毫无方位,不仅对考证潢水石桥的位置,难以起到确指的证据,反而使个别的方家在探考时走了错路,进而还引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结论。如法国人闵宣化,在考证保和馆时,走的是与现在的公路“大巴线”(大板至巴林桥)相同的路线。他从石桥往北走“毛胡卢沟山谷”即骆驼井子东侧,再向东拐入“赛洛木沟”并一直到达“察罕木伦”河边。因找不到保和馆址,但又要不虚此行,只好在他的大作中结论为“保和馆的位置,应该在黑河之南”。<sup>④</sup>

过潢水石桥北行,并非只有一条通道可行,实际上应有三条道路。

① 《辽史·地理志》442页。

② 《契丹国志·富郑公行程录》。

③ 《辽史丛考》8页。

④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23页。

一是现代的公路,又称之为“大巴线”。公路修通前,为人行小道,即“乃令道”。自桥北行,公路由“乌德哈达”的东山峰的东侧通过,在骆驼井子东侧的山坡上北行。直到近“阿德尔嘎山”的东南时,公路向东南拐入赛力漠沟。先东行再北行,到达“白音和硕山”的东侧,过山渡河达大板。

二是巴林路。以往多为骑马走的路“木里道”,即自清朝开始迎候皇帝、公主以及朝廷命官而北上的道路。自桥北行,经过“乌德哈达”(阙门峰)天然生成的两个对称的山峰。巴林路从门中穿过然后北行。经骆驼井子、必鲁台,在“阿德尔嘎山”的西侧继续北上,到浩饶钦渡查干沐沦,稍东行即到“大板上”。清咸丰七年,清廷派员抵巴林走这段路时,有如下的记载“由色伦木伦(笔者注:应为西拉沐沦)行过沙岭无数,平地亦皆深沙,沙漠之名不虚。六十里渡索伦木河(笔者注:实为查干沐沦),不知此水因何未冻(笔者注:原大板西庙即圆会寺西南,紧贴河边的山根有暖泉)。又五六里至板身”。<sup>①</sup>

三是老道。当地老百姓又称之为“帖里干道”,因为是走车的道。即北宋使节薛映等北上之路。这条道不仅在辽代时走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双林线”(林西至林东)修通以前,林东往来赤峰的大车,也走这条路。时至今日,百姓们还常驾驭着自家的“驴吉普”(由一头驴或一匹马套着的小胶轮车),驰骋在这条古道上。

关于保和馆的探考,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搞重点地

① 《辽海丛书·巴林纪程》2618页。

区的文物调查,以及不久开展的文物普查时,已弄清了具体的方位及情况。因有另文记述,在此只说明,它不在“黑水之南”,而在黑水河(查干沐沦)的中间及西岸,即巴林右旗前进村的东南。

如要按薛映“五十里”的说法,在桥北的这个半径范围内去找,根本找不见,法国人闵宣化已尝试了一次。但是如确定不了保和馆的方位,只凭石桥的形制来考证石桥的位置,证据仍较单薄,因为北宋的遣辽使者,凡达上京者,都提及保和馆为桥北的第一馆驿。只有弄清保和馆的确切位置,考证潢水石桥时,才属全方位即形制加方位的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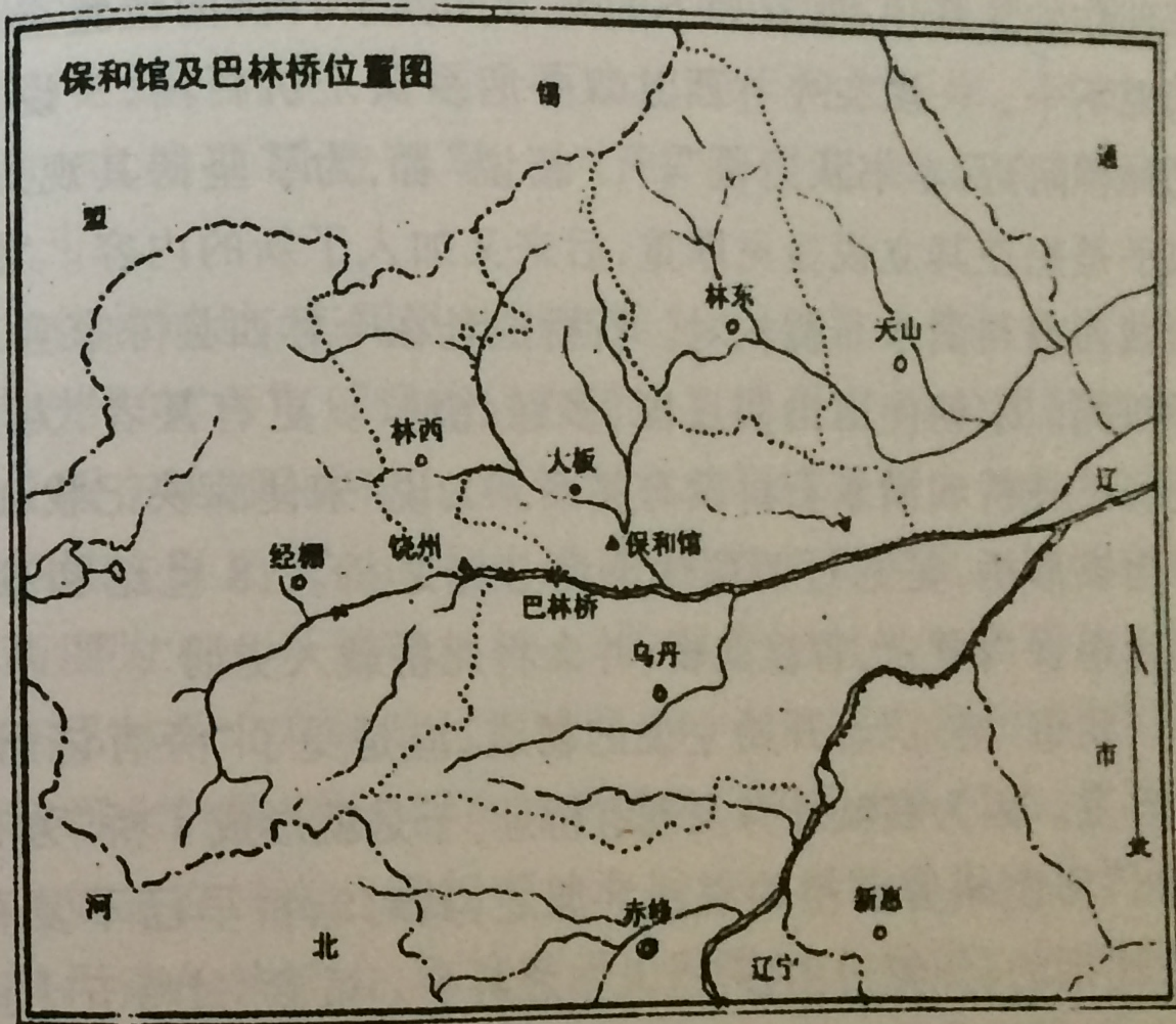
沈括抵达保和馆时,不再是只记述五十里,而是按行走的路线及方向,分段具体的加以记载:过石桥“循河东南行又二十里乃北行,稍东北十许里,复正北,又三十里至保和馆。皆行碛,其曲直如此,趋河桥与避大山之阻也”。<sup>①</sup>照此记载与今日之村落道路对比,应是这样。过石桥后,沿河北岸偏东南行,在近至狐狸井子(乌额根图)南边的小山西侧北行,到前大冷。再向稍东北又正北到后大冷(草籽繁殖场),再北行过那斯台而后到前进。沈括在这里所指的“避大山之阻”的大山,就是他走的老道西边的大山;亦即是人们在桥南尚未过巴林桥以前,就早已映入眼帘的大山,就是绵亘在巴林草原上的独腊寒山、大青山、白音汗山和查斯台等山。

这条老道,1976年时因机关在前大冷买好了柳编片

<sup>①</sup> 《永乐大典》。

笆,我坐着雇用的一辆由三匹马套驾的大轱辘车,还往返走了一趟。

尘封的古道,千年的车辙,在这里并未消失殆尽,甚至仍能感到,昔日辽宋两国和好,各族人民亲密团结的景象。(图一,保和馆及巴林桥位置图)



#### (四)“旁有饶州”应做诠释不为主证

考潢水石桥位置的“新说”,始于发现了“辽代饶州城遗址”。“饶州城址,在昭乌达盟林西县南六十公里之西拉沐沦河北岸。城西南三百公尺处,在西拉沐沦河南岸有乱石堆积,乱石北在水下有粗大的桥桩木柱,上有卯榫,卯榫长方形为 $13 \times 26$ 公分深40公分。这个城址应是唐代的饶乐

都督府城址。桥址应是潢水石桥”。<sup>①</sup> 此时,潢水石桥已被扫荡了十五个年头,然而人们并没把它忘却;因为时至今日,它周围故有的环境,山在、水在、岸石在,老桥不在新桥在。人们不能不见景生情追昔忆往。“新说”提出后,业内的许多人并不认可和苟同。比如在赤峰地区很有影响的一部佳作的注释中,就有如下的文字,“潢水石桥的位置至今其说不一。一说在今林西县双井店乡黄土坑村南,一说在巴林桥附近,本书从后说”。<sup>②</sup> “新说”者,为了坚持其观点,似乎是想使其立说显见厚重,后来又加入了新的内容。“饶州城西南与潢水石桥相对。石桥遗址在今林西县陈家营子桥西侧。宋朝使臣出使辽国,多经此地”。更有甚者,为了说明巴林桥和潢水石桥没有关系。又说“宋使薛映记载,此桥为拱形桥,是通过西拉沐沦河必经之桥。18世纪初,康熙帝巡视内蒙古,曾渡此桥,并命将此桥载入史册”。<sup>③</sup>

我想“新说”者开始立说的初衷,应是受了“旁有饶州”的启发。因为在城址旁发现有桥址,于是就形成了桥“旁有饶州”和饶州旁有桥的说法。加之,其时老桥早已不复存在,沈括的《使契丹图抄》世人知之甚少。虽然“过桥五十里保和馆”仍是要证明潢水石桥所在急待解决的问题,或许因《辽史》粗简,薛映记载是否有误等等为由,姑且立此新说,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此时的“新说”,仍有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

① 《昭乌达盟文物通讯·七期》23页。

② 《昭乌达风情》148页。

③ 《赤峰市志(下)·卷十八文化》3791页。

潢水石桥,既然是石桥为什么在水下用粗大木柱为桥桩,且历经千年木桩上的卯榫为什么还能清晰有度;这些卯榫如是用来承接桥梁或是桥面石板或石条的,为什么不见压损的现象?其实这些木桩,即便是桥桩,也绝不会是石桥的桥桩,更不会近千年的辽代的桥桩。我在前文已提到过的“巴林人”有一段记载,我以为可为木柱桥桩的笺证。“石桥之西,恰巧又有两个石山出现于河之两岸。民初(民国初年)林西国防部军,为行军便利起见,架有木质浮桥”。<sup>①</sup>

饶州城址,东距巴林桥直线为34公里。换句话说,“旁有饶州”的“旁”,就是指远在潢水石桥西边34公里的地方。城址所在地,四面有山,城址所在地海拔高度为744米。潢水经过这里又多在山谷中通过,河道多有弯曲。如站在海拔高度为606米的巴林桥上,往西看饶州根本看不见。如站在巴林桥北乌德哈达海拔为745米的东山顶上,往西看,又被河北的雷劈山,河南的羊踩沟山和黑山头挡住,仍看不见。如站在桥南公路拐弯处海拔651米的最高处往西看,又被河南的铁杆山,骆驼鞍子山和黑山头所挡。可以肯定的说,薛映使辽时不但没经过饶州,而且也没见过饶州。他“语录”中的“旁有饶州”,只能是路言而知,不然沈括的“图抄”以及“梦溪笔谈”中,不会连一个字迹都没有。

关于“宋朝使臣出使辽国多经此地”之说,也显见偏颇。北宋太祖建国称帝时,辽国已建国称帝四十四年。宋

① 《辽史汇编九·契丹上京临潢府》76-573页。



太祖建隆元年,恰好是辽穆宗应历一年,同为960年。辽宋使臣相互往来,是辽宋“澶渊之盟”(1005年)后,才出现的现象。

由于使臣的名目不同,职秩不一,还有季节等制约。尤其是辽代的最高统治集团,并不常在都城居住,而是随着“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sup>①</sup>的“四时捺钵”不断地行动,辽国又被人称为“行国”。所以北宋遣辽使臣,从史籍的记载中,到过中京者只有七人。

这七人中,一个人的终点就是中京。一个人是通过中京到长泊。一个人是通过中京到神恩泊。一个人是通过中京到东京。其中通过中京北上过潢水石桥者只有二人。一是薛映过潢水石桥到上京。一是沈括过潢水石桥后,到单于庭。因为沈括使辽时为夏季,只可在夏捺钵地参见辽道宗。由此可见,这七人中根本就没有经过饶州的使臣,就是真正经过潢水石桥者,也只有二人,完全够不成“多经此地”之说。(图二,北宋遣辽使臣通过中京到达目的地路线图)

至于“这个城址应是唐代饶乐都督府城址”之说,我不准备在这里加以讨论,只提点看法请指正。

这个城址是“太祖完葺故垒”的辽代饶州。关于“唐饶乐府地”,我以为并不能等于唐代的饶乐都督府城址。是否应是唐代松漠都督府城址,或许做些工作可以弄清。

至于“薛映记载,此桥为拱形桥”,纯属子虚乌有不驳自

<sup>①</sup> 《辽史营卫志中》373页。

破。就不用再提北宋使臣记载了清朝的桥形。

至于“18世纪初,康熙帝巡视内蒙古”等等,就更为荒谬。康熙名为爱新觉罗·玄烨,是顺治帝的第三子。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生于景仁宫。八岁嗣位,在位六十一年,享年69岁。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死于畅春园。一个在17世纪初,就已作古的人,“18世纪初”还能在人世巡查吗?

#### (五)结语

潢水石桥的位置,就是在今六孔巴林桥的上游,西北约30米处,1963年炸毁老桥的地方。公主桥(巴林桥)是在潢水石桥凋敝颓圯的基础上修建的。潢水石桥始建于辽代,公主桥(巴林桥)后建于清代。这是一座两代一体,或者说是一体数名的古老石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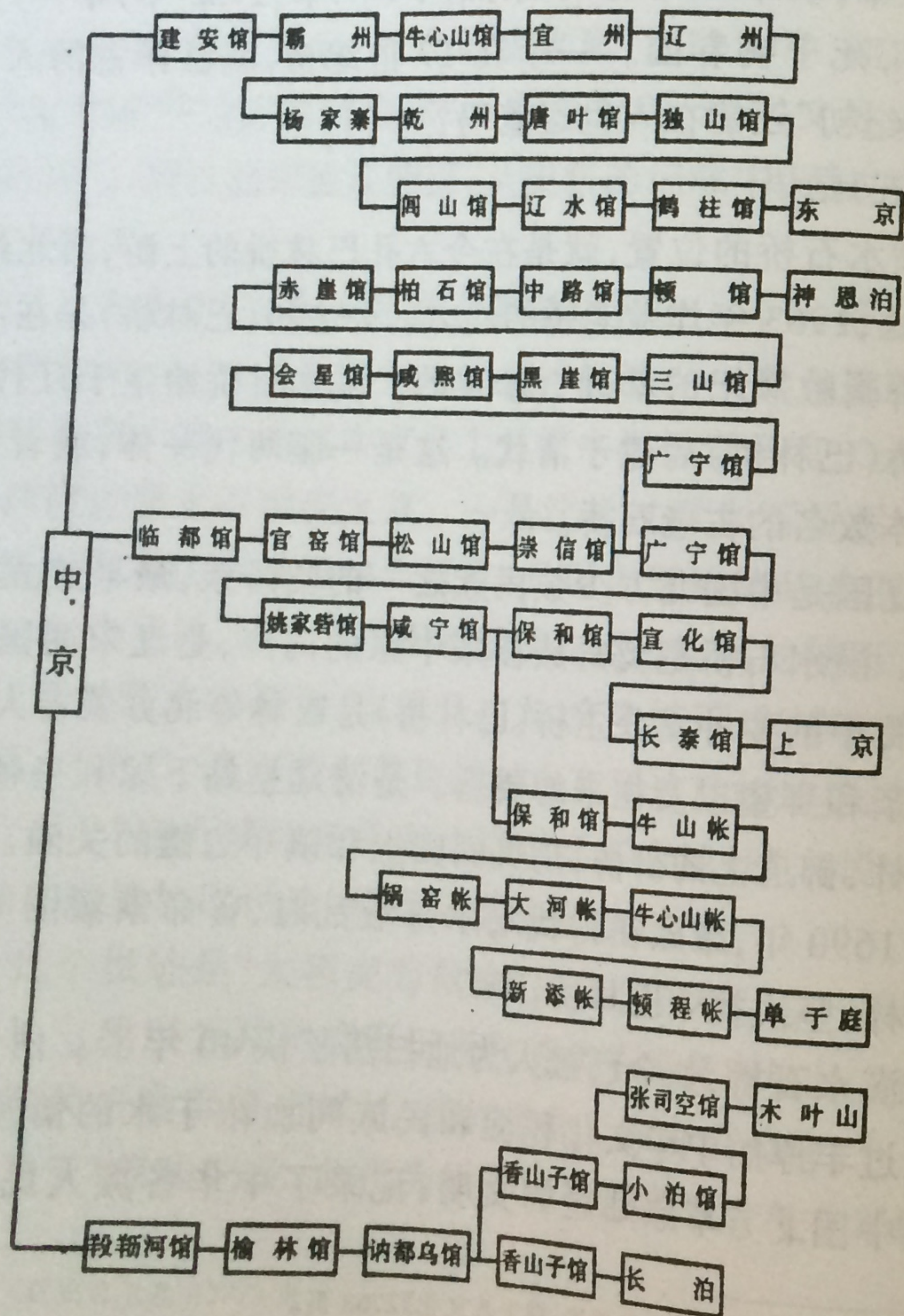
辽国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的契丹族,最早建立的国家。潢水石桥是契丹族往来中原的门户,是辽宋两国友好通衢中的要冲。公主桥(巴林桥)是巴林等北方蒙古人进京省亲和拜望以及往来的要塞。是清廷皇姑下嫁和皇帝临幸巴林,御道上的御桥,是巩固国土和镇守边疆的关隘。如公元1690年,康熙在讨伐噶尔丹叛乱时,曾命索额图等驻守巴林,坚决扼守巴林桥。<sup>①</sup>

潢水石桥,如今已被人为地扫荡了快40年了。由于它承载过丰厚的中华文化积淀和民族间血浓于水的情感;证明着中国北方草原灿烂的文明;记录了中华各族人民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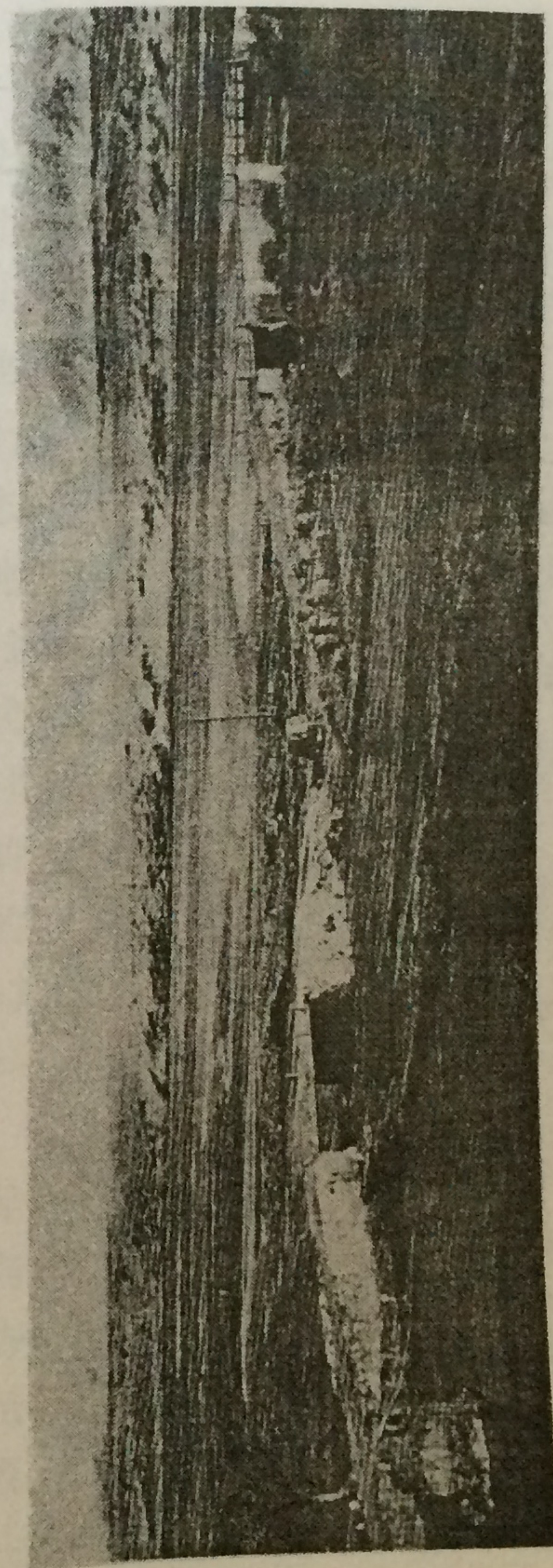
<sup>①</sup> 《赤峰市志·乌兰布通之战·卷十八文化》2768页。

创建美好的家园。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它的外形也被人为地湮没了;但是人们对它的记忆,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抹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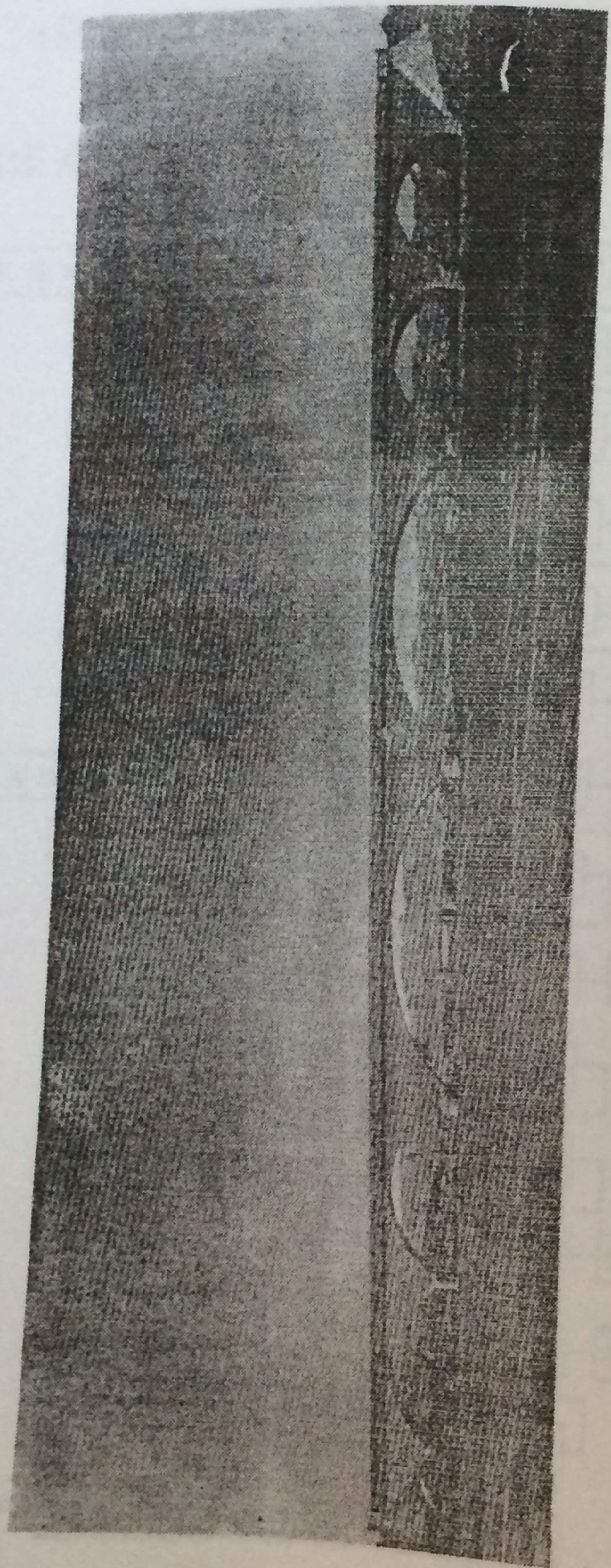
附:北宋遣辽使臣通过中京到达目的地路线图



图版一:老巴林桥



图版二：新六孔巴林桥



## 二、从辽代御试进士的相关记述探考辽代怀州西山的位置之所在

《辽史》中，关于怀州西山的记载，虽然显见是为重要，然而可见之处并不为多，且存有错载和误记的现象。

笔者经过多年来，对辽代怀州城址与怀陵的调查与寻觅；对沈括使辽时，过潢水石桥后，北上而到达辽道宗当时秋捺钵所在地、行程与路线等的勘察；对巴林右旗境内，几处山崖石壁上和辽庆州白塔上的墨书题记的发现与考察；以及翻阅史志中关于辽代科举制度的演化，逐渐的对辽代怀州西山的地理位置确认，已从感悟的层面，升华到了认识的地步，现赘述如下，愿与同仁们共同钩沉。

### （一）辽代科举制度的管窥及浏览概略。

科举制，原本是时兴于中国农耕文化的区域，或者说是汉民族聚居的地区而形成的一种制度。是为拔擢人才，是为获取功名的一种大典。自汉、隋以来，就已出现策贤纳士的举措，只是其时还轻于文学，而重在选举。到了唐、宋时期，不仅重于考试，且在考试中又分科取士；并专以进士为贵。

辽代本是以畜牧文化为主的国度，后来随着燕云等地区农耕文化与非契丹民族的并入，因国情不同，所以就有了独特的治国方略。“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sup>①</sup>

科举制既为汉制，那么辽代开展科举首先就是东平渤

<sup>①</sup> 《辽史·百官志一》685页。

海,南并燕云之后,在这一地区,为这一地区的非契丹民族而开设。这是“以汉制待汉人”顺理成章之事,实是广为吸纳,汉民等族中有贤智才干的人,使其步入仕途,为辽代的朝政服务。

辽代早期时,虽然也有非契丹族人,是汉族人在辽朝中为官僚权贵,其子嗣亦可受到荫补的恩崇。但这只是极少的数家,根本满足不了“因俗而治”巩固政权的人才需求。同时,这也是众多的非契丹民族之人,无依攀附之路。他们只有经过科举而步入仕途,获得功名利禄,进而光宗耀祖和荫及子孙。至于辽代社会的主体民族契丹族,他们的入仕之途会有多种,尤其是属于贵族阶层的族民,他们可以世选,根本用不着科考。史志中虽然没有具体地记载,契丹族民是否可以参加科考。但是直到有辽一代的中期,即兴宗的重熙年间,仍不准契丹部族子弟参加科举例如:耶律蒲鲁,横帐季父房耶律庶箴之子。“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重熙中中进士第。主文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sup>①</sup> 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向前,辽代社会和契丹民族,对农耕方明、对汉族文化逐渐的了解,不断地吸收,以至演进到仰慕和崇尚的时候,契丹部族的子弟中,也以获取科举功名为荣。如“耶律大石者,世号为西辽。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1115年)进士第”<sup>②</sup>,就是最好的代表。这足可说明,有辽一代的后期,辽

① 《辽史·列传第十九》1351页。

② 《辽史末纪·天祚皇帝四》355页。

代的科举制度,已不再是纯粹的汉制,而是辽代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一种政治制度。

契丹民族建立辽国后,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科举,《辽史》中有如下两则记载。景宗朝的保宁八年(976年)十二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sup>①</sup> 圣宗朝统和六年(998年)“是岁,诏开贡举放高举一人及第”。<sup>②</sup> 这两则记述,当否就是有辽一代科举的发端。从近年来已刊布的一些材料中看,这两侧记载,并不是有辽一代开始科举的发端,只能是在某个地区或在某个时间里,进行了与科举有关的记述。对这一问题的探究,笔者在此不想多加讨论。只从年代与时间的关连,推断这两则记载不为辽代开始科举的发端。辽太宗朝的会同元年(938年),燕云十六州已并入了辽国的版图,幽州也晋升为辽国的陪都南京。这里不可能阔别三十八年后,到景宗朝的保宁八年才又开始科举。保宁八年的记载,应是指在南京京都建全主管科考的机构礼部和科举的场所贡院。如果说,一直到圣宗朝的统和六年,时年已过去五十年后,皇帝才下令贡举,我理解这则记载,并不是指在南京,而应是在辽国的腹地。

有辽一代的科举,开始启自南京,毋庸置疑。但并非是一成不变,始终在南京地区或是在南京的贡院里进行。

辽国,有时又被人称之为“行国”,就是因为辽国的朝廷所在地,不同于唐、宋朝廷,始终是定居在都城之内。除遇有争战的要务而外,辽国的政治中心、最高的政权机构等

① 《辽史末纪·景宗上》96页。

② 《辽史末纪·圣宗三》133页。

等,都得随着皇帝的车帐,在“四时捺钵”的行驻中而行动。“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sup>①</sup> 皇帝行驻在那里,那里就是辽国的政治中心,就是朝廷所在之处。

到圣宗朝时,西夏王请婚,愿“永作藩辅”。“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义成公主下嫁西夏”。<sup>②</sup> 宋辽澶渊好和,弟兄相敬。辽国的版图上,除西京的定位尚待确指外,其五京中上、中、东、南四京均已落定。其时,辽国的世道虽然还够不上海晏河清,但是国泰民安的盛世,已开始显露。

自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诏开贡举”,并“放高举一人及第”<sup>③</sup> 开始。到天祚帝保大二年(1121年),被金人所俘,耶律淳自称帝,并改元号为“建福”,“放进士李宝信等十九人”<sup>④</sup> 为止。此间,共为135年,先后经由圣宗44年、兴宗24年、道宗46年和天祚帝在位的21年。《辽史》在〈本纪〉中,其间共记载放进士人数为2321人。即圣宗朝652人、兴宗朝293人、道宗朝884人和天祚帝时期的492人。这里是否存有漏载等现象,应该说是有的。如前文中所引耶律大石为天庆五年进士,〈本纪〉在天庆五年中,并不见有科举的记载。

随着辽代科举制度的日臻完善,科举制已由“汉制”演进为“国制”。科举的地点,已不只是在南京,而更多的时

① 《辽史·营卫志中》373页。  
② 《辽史末纪·圣宗二》127页。  
③ 《辽史本纪·圣宗三》133页。  
④ 《辽史末纪·兴宗一》220页。

候,是在皇帝夏秋捺钵时的辽代腹地。考试的科目,也由开始时只设常科,而增设了特科“贤良科”。考试的形式,也由开始时为一年一次,放及第人数也很少。渐渐地改为两年一次和四年一次,及第人数也大大增加;并开始“御前引试”和“御试”<sup>①</sup>。

科举考试中的最高形式或者说是最高阶段,就是皇帝在殿廷之内,亲自对士子们进行考试。唐宋时期的史志中,称这一考试为廷试,更多称为殿试。而《辽史》的编修者们,对有辽一代皇帝亲自对士子们进行考试,不称殿试,而名为御试。因为辽代放进士,很多时候并不在都城或者是宏大的殿廷之内;而是在皇帝的行宫,捺钵驻地的殿宇或是毡包布帐之内。足可见,编修者们的严谨灼见。

自圣宗朝开泰九年(1020年),清暑緬山放进士,兴宗朝清暑永安山放进士,道宗朝清暑拖古烈和撒里乃山放进士。

上述诸山,均在辽庆州城的北部和东北部,其距离庆州城的直线距离,约15公里至30公里。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的北端,是与锡林郭勒盟为界山的大兴安岭中的几段山峰或山脉的名称。“緬山”后来改称“永安山”,有时又泛称为“黑岭”。即辽庆陵后靠的“庆云山””,如今地图上称名为“瓦林辉特乌拉”和上骆驼井村西方的“平顶山”和“昂格图山”。“撒里乃”和“拖古烈”二山的位置,在“黑岭”的东侧偏北,即辽代“赤山”的南部。“撒里

① 圣宗统和十九年(1001年)以后,改为两年一次。兴宗重熙八年(1039年)开始,改为四年一次。御试进士为制,开始于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

乃”在西,如今当地的群众,仍称那里的山谷平淀为“沙那”。“拖古烈”又称为“犊山”,在今常兴村的北边。如今当地仍有一座山峰名为“呼日格大巴”这是否就是辽的“犊山”而今称“羔山”在此存疑;不过,我在实地考查时,已在常兴村北的山谷平淀上,发现了辽代的青砖灰瓦和白灰残迹的建筑遗址。

自兴宗朝重熙七年(1038年)六月,“御清凉殿试进士,赐邢彭年以下五十五人第”<sup>①</sup>始。其后,在清凉殿御试进士的记载有: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年),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兴宗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道宗清宁八年(1063年)。

此外,兴宗重熙十九年(1050年),在辽庆州金銮殿御试进士。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在辽庆州永安殿御试进士。咸雍六年(1070年),在永安殿放进士。在咸雍十年(1074年),在庆州永安殿放进士。

(二)《辽史》中对怀州西山的记述及笔者的释读管见

要讨论怀州西山的位置所在,关键的问题,不只是山要在怀州的西边,而是要弄清山上是否建有清凉殿,或者说是清凉殿的建筑遗址,或者是可以说明这里就是清凉殿建筑遗迹的所在。

有辽一代,关于清凉殿或是凉殿的记载,其可见有两处。一是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十月,升幽州为南京后。于会同三年(940年)“诏燕京皇城西南堞建凉殿”<sup>②</sup>。一是

① 《辽史末纪·兴宗一》220页。

② 《辽史末纪·太宗下》49页。

“怀州西山有清凉殿,亦为行幸避暑之所”<sup>①</sup>。虽然这两处凉殿的名称基本相同,且用意均为使人清凉爽快;但是一处在陪都南京城的西南堞上,一处在皇都上京道的怀州西山,相距千里,截然有别。

《辽史》中,对“西山”和“清凉殿”的记载,不仅没有明确指出其位置所在,而且又将“怀陵”与其混淆在一起。“太宗崩,葬西山,曰怀陵……有清凉殿,为行幸避暑之所。皆在州西二十里”<sup>②</sup>。

那么怀陵是在州西二十里的西山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以往有过一些中外的方家名人,特对怀州西边二十里范围内的诸山,如海苏沟山、小沙力嘎山、乌兰特勒盖山等等,做过调查;但并未闻听他们发现怀陵或是清凉殿遗址的信息。笔者因工作之便,也曾为“州西二十里”的记载,不知疲倦的徒步在漫山遍野里多次地奔波过。后来,还是经过走访当地的群众,我们才在怀州城东北约7公里的“床金沟”,发现了怀陵的陵园所在。<sup>③</sup>

怀州所在之地,原本为太宗在当皇帝以前,就在此行帐放牧的地方。后来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后,将争战中俘获的人口,遣来这里居住。如“太宗放牧于此,天赞中,从太祖破扶余城,下龙泉府,俘其人,筑寨居之。会同中,掠燕蓟所俘亦置此”<sup>④</sup>。至于怀州的称谓,应始于太宗朝。《辽史》

① 《辽史·营卫志中》374页。

② 《辽史·地理志一》443页。

③ 《内蒙古文物考古》总第三期 67页。张松柏(辽怀州怀陵调查记)。

④ 《辽史·地理志一》443页。

中关于“世宗置州以奉马”的记载,是指世宗即位并葬太宗后,将太宗的私城怀州收归朝廷,并充为怀陵的奉陵邑。太宗天显十年(935年)春正月,靖安皇后萧氏,小字湿,崩于行在。五月“上自制文,始制服行后丧。葬于奉陵……天显十二年(937年),秋七月,幸怀州,谒奉陵”。<sup>①</sup> 笔者以为靖安皇后的奉陵,也应在怀陵陵区的陵园之内。

自古国君之墓谓之陵。做为怀陵,是有辽一代的第二位皇帝太宗耶律德光的陵墓。绝不会允许后人来此游幸避暑甚至可以畋猎。怀陵既安排有人丁和州邑专门负责看护和祭扫,又依照陵区周边的山势,在山脊、隘口等处筑起封护陵园的石墙。怀陵所在处不是西山,是令人庄严肃穆,敬仰祭奠的处所。太宗的儿子,“穆宗应历五年(955年)九月,猎于西山”。<sup>②</sup> 这再一次说明,《辽史·地理志》中的“葬西山”说谬误。《辽史·本纪》中的“葬于凤山”可信。

那么怀州的西山,如今名为什么山,究竟在什么地方?

怀州的西山,不在州西二十里,而在怀州城址西南18公里处,如今的名称为“阿力木吐山”。

阿力木吐山,是一座与周边任何山丘都不连贯,在草原上显见突兀高耸的独立山峰。主峰标高1280.1米。东西宽直线约3公里,南北长直线约5公里。因其山中生长有繁茂的山梨树,所以蒙古语名其为“阿力木吐”,译成汉语为“梨树山”。

笔者认定“阿力木吐山”就是有辽一代的“怀州西山”,

① 《辽史末纪·太宗上》41页。

② 《辽史·游幸表》1043页。

有如下三方面的考据。

其一,阿力木吐山的山中山上,还是山下以及周围,有许多辽代的建筑遗址和建筑遗物与遗迹。笔者虽多次赴实地考察,均从未做过试掘也未能解决实测工作。就其可见已圯废的建筑形式以及建筑规模,似乎路人皆可认定其不为州域或堡寨遗址;也绝非是官宦豪富所能比附的宅邸。而是草原上,一处品级至上的高台建筑遗址。

在该山的南面,在距山根约二百米的平甸上,有一处面积约500平方米,其上堆积的封土并不甚厚,可见有沟纹砖和布纹瓦残块的辽代建筑遗址。在该遗址西南约50米处,有一硕大而完好用花岗岩刻饰的龟趺,碑石的下落,虽然一直关注仍不知其去向。(附:龟趺图的文后)

从开始入山,到向山里山上起脚登临,有一条平缓而宽绰的盘山道。道路依山势的陡变和峰谷溪涧的曲折,采用块石干砌而叠筑起道路外向的直壁。这条道路,虽经千年的风雨浸蚀以及人为的破坏,其支撑着路面平缓而宽绰的外向垂直壁面,许多地段仍完好齐整。叠筑垂直壁面的块石,大小不等;但大者居多,最大者近两米见方。

山顶的平缓处,有数处辽代建筑遗址,不过因遭受新老盗墓者的乱掘破坏,原来的形状与規制已面目不清。只在这些被破坏遗址的四周,以及尚有未遭受破坏的山顶古建遗址的山坡上以及山坡下,均可见到有辽一代,习用的青砖黛瓦以及白灰等的残碴碎块;甚至还有饰以绿釉的瓦饰碎块。

在距该山东南约2公里的自然村“下阿拉木吐”的北侧

草甸上,有约为数百平米,用不规则碗口大小的石块,摆出排列整齐,区划有序的很显见的阵地。我以为,此当为捺钵时,有关毡包布帐的行在营地。这一现象,我曾在黑山前的平淀,即今吉布吐村南,黑山东川以及巴林右旗东部的宝日勿苏苏木的吉林山前的草甸上,均见过。

其二,阿力木吐山所处的地域,是在怀州所及的区域之内。

就辽代上京道所辖的祖州、怀州和庆州等州城的区域划分情况,在已有的史志中,均不见只字的记载。但是,就其各自所辖的州城县址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再经多年来同仁们的孜孜求索,如今仍可看清,它们都有各自的区域所在,并非是无界可遵地混居在一起。

我以为大体上是,依照某条河流水系以及围绕着这一水系而布载的草场面积,而分区划域,大山的阻隔,就成了其区间的天然分界。

阿力木吐山,地处怀州的西南,虽然超出了《辽史》所指“二十里”的范围,但这里首先是它处在太宗的放牧区域之内。换句话说,它距怀州较近,确在怀州境内。其次,“二十里”的记述,应属不确的记载。

其三,阿力木吐山的峰谷或是溪涧的某些崖面的石壁上,有汉字墨书题记。

这一汉字墨书题记的发现,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那时我正心切地寻觅怀陵,在怀州西侧的山野间,不觉厌倦地调查时,一位家住当地,曾在师范和中学任教多年,离休还乡颐养天年的蒙古族老教师,叶喜桑布先生,领

着我从山下到山上,又下到梨树丛生溪涧沟谷,在一些很少接触风雨的石壁上,发现了多处的汉字墨书题记。然而因沧桑经久漫漶严重、众多处的题记,不仅已不为只言片语,就单个的字体,完好可识者也甚少。如当时实录的一些字有:姓氏张、王、李、赵、刘等。不成文的单个字有:处、来、此、好、草等等。书体均为行楷。

当时我的脑海中,除记有“均在州西二十里”外;还记有“是年,有骑十余,猎于祖州西五十里大山中,见太宗乘白马,独追白狐,射之,一发而毙,忽不见,但获狐与矢……后于其地建庙,又于凤凰门绘太宗驰骑贯狐之像”。<sup>①</sup>

此后不久,我又在阿力木吐山西南约3公里的山头村走访时,在村前不远的山崖石壁上,也发现了汉字墨书题记。汉字的书体,亦为行楷。文字的完好程度,此地漫漶更加严重,不仅没有草木的遮挡,还遭人们开山起石的破坏。

这些发现,本很重要。但在当时这与我想弄明白的怀陵,还没挂上钩,只好留存在笔记中,做为一种记忆来收藏,不过有时会感到迷惘。如今研读辽代御试进士的记载,这些汉字墨书题记,应是士子们来此参加皇帝的亲自考试期间,信手挥豪情流千古的证迹。如前文所引,兴、道二帝,在此共御试进士为五次。时间为重熙七年(1038年)至清宁8年(1063年),其间共有26年的岁月。在这里发现汉字墨书题记,既在情理之中,又是必然之事。士子们来此参加皇帝的亲自考试,虽然分科或特科中都没此说,但这确是士子

<sup>①</sup> 《辽史·地理志一》443页。



“石记”。

(三)过潢水石桥北上,到达辽代皇帝捺钵要地的途中,几处汉字墨书题记发现记。

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近20年的时间里,因工作需要徒步走遍了巴林右旗的山山水水和农村牧区。除前文已提到的发现两处汉字墨书题记而外,还在三个地方发现过雷同的汉字墨书题记。只因当时拨冗不力,联想不够,只好仍然是先做记忆收藏起来。后来,在挤时间考查沈括使辽期间,在巴林右旗境内的行程路线与所见所指时,对墨书题记似有所悟,但其时自感身体十分疲乏,不久就办理了退休手续。近年来,身体有所好转,才把一些迷惘和收藏的一些记忆,全盘托出加以思考。其中,沈括使辽途中,并未经由怀州或西山,所以就没有怀州西山的载录,而其他几处的墨书题记与沈括使辽时的行程路线完全吻合。如何理解阿力木吐山上的墨书题记,这就是我把“题记”与“御试”联想在一起,并认定阿力木吐山是怀州西山的切入点。

1978年8月,我在赴现场清理、收缴并调查巴林右旗友爱村出土辽代银器窖藏的情况时,<sup>①</sup>不仅发现了友爱村的辽代聚落遗址,弄清了窖藏的情况,而且在遗址西边约有400米远的小山的石崖壁面上,还发现了汉字墨书题记。这里发现的汉字墨书题记漫漶程度甚为严重,认真地看,影影约约可识别出是汉字墨书的字迹,单个字还能认出几个,但也极为有数。不过从小山的名称是“必其格图”,译成汉

① 《文物》1980年第5期45页。(内蒙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发现辽代银器窖藏)

语意即“字山”,由此可以想见,相当年前小山上的字迹一定很清晰其数量也会是不少,否则就不可能被冠以“必其格图”之名。其后不久,就已知道该遗址,就是沈括在《使契丹图抄》中,所确指的“黑河州”州城遗址。

1980年春,开始调查巴林右旗那斯台村出土玉器一事。此后在进一步做遗址调查工作<sup>①</sup>以及请中科院考古所的同志们来此考察并做了一点试掘工作时,又把探考工作,扩大到那斯台周边的一些地区。此时,又在那斯台村直对的东面,隔河距离为2公里的一座山峰,蒙古语名其为“图拉嘎”,汉语名其为“锅撑子”。在这座山峰西侧,距地面约1.5至2米的崖壁上,也发现了汉字墨书题记。这里受风剥水蚀的程度分外严重,但字型可识为汉字行楷,与友爱村西小山上所发现的字迹基本一致。其后,我在考察潢水石桥北50里的保和馆馆址时,再一次去了锅撑子山、进行调查。保和馆址,在今巴林右旗前进村的东南,遗址距锅撑子山为东南向也是二公里的距离。

1988—1992年,我们在维修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时。在塔体的外面以及附加在其上的铜镜等构件上,曾发现了多处汉字墨书题记和用金属工具刻划的图案和文字。其中第五层东门,在其券门南券壁上发现的汉字墨书题记是,“灵德寺习经沙门德崇,共梁秀才、曹秀才上来”。<sup>②</sup>

前文已提到的这五处有汉字墨书题记的地点,正是有

① 《考古》1987年第6期507页。(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  
②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2期67页。张汉君、张晓东(释迦佛舍利塔历次修葺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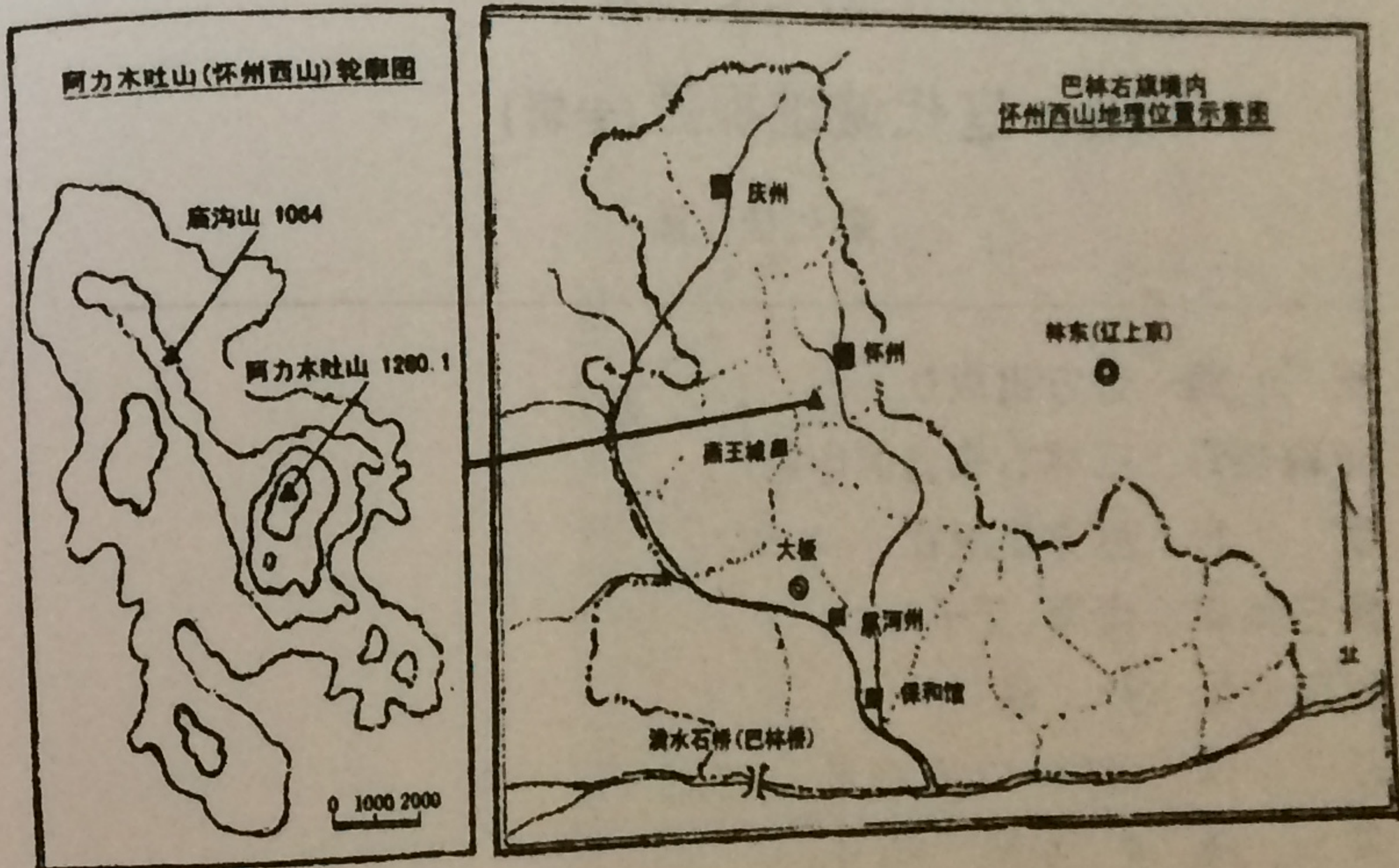
辽一代的科举活动,由南京开始,渐渐地发展到辽国的腹地,即皇帝的夏秋捺钵所在地的佐证,是士子们要接受皇帝的亲自考试,从潢水石桥北上后,到达皇帝所在地的最便捷的通道的标记。

沈括使辽时的时间是,北宋神宗熙宁八年,即辽道宗大康元年(1075年)的夏天。其时辽道宗在庆州北的永安山一带避暑,所以他所走的路线,也正是士子们要到有辽一代的秋山之地参加御试的同一道路。只因兴宗朝时庆州开始营建,所以御试之地多在怀州西山的清凉殿。道宗朝时,虽也有一次在清凉殿放进士的载录,但更多的地点是在庆州的永安殿放进士。

沈括渡过潢水石桥后,往北走的第一站就是保和馆,此地“锅撑子山”有汉字墨书题记。从此往北走,他没走去辽上京的路,而是走黑河州再过河,“必其格图”有题记为证。再往北走为避大山而转东北行到达“山头村”,西望看到了燕王城。只是燕王城是在山坡之上,山峰之下,不是在“山巅”。这里也有墨书题记。当时道宗不在怀州之地避暑,所以他的《使契丹图抄》中没有怀州西山和清凉殿的记载。再往前走,他行进的路线,虽然几经曲折,但大方向基本上是北行。其时道宗也不在庆州城内,所以他没进城,而做了如下的记载“道西一里许,庆州塔庙廛庐,略似燕中”。再往北行,抵达永安山道宗当时所在的“单于庭”,即如今常兴村北,罕山鹿场所在地的捺钵营地。其实早在沈括到此地的前六年,即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时,道宗就在此进行过特科御试。“五月甲辰,清暑拖古烈。甲寅,设贤良,诏应是

科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sup>①</sup> 这里的“拖古烈”是山峰之名,应属契丹语;有时也称该山峰名为“犊山”,这是汉语。

综上所述,《辽史》中关于怀州西山的定位,方向在怀州之西不误;只是二十里距离一说不确。至于怀州西山上建有清凉殿,为行幸避暑之所,是建成于什么时间。我认为最晚也应在重熙六年(1037年),即兴宗于重熙七年(1038年)六月,在清凉殿放进士邢彭年等五十五人的前一年。(附:辽代怀州西山地理位置示意图)



<sup>①</sup> 《辽史末纪·道宗二》269页。

03019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巴林文史丛书

辽代城址探源(专辑)

韩仁信 著

出版 远方出版社

印刷装订 巴林右旗鑫源印刷厂

发行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海鹰、艾子等

封面设计 丹 森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 字数 80 千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 - 2000 册

ISBN 7 - 80595 - 694 - 4/I·274

1 - 8 册(全套)定价:280.00 元